

Zhongguo Yuwen

5

1958

总第71期

1958年5月号(总第71期)目录

文風笔談

改进文風問題管見

丁声树

关于改进文風，我想談这么几点：

先談一下讀文章和做文章的关系。从前的人做古文，做旧詩，主要是通过諷誦一些古文旧詩学会做的。“熟讀唐詩三百首，不会吟詩也会吟。”这話实在有些道理。現在我們做的是白話文，話怎么說，就怎么写，当然自由多了。但是做文章究竟和說話还不完全相同。白話文也并不是容易做好的。我們也需要多讀一些用白話写的好文章，看看好文章是怎么写的，自己努力学習，才有可能写出好文章来。这里所說的好文章自然是指思想內容和語言形式都好的文章，也就是指又准确又鮮明又生动的文章。要是不讀文風好的文章，單靠語法修辞方面的書，恐怕是写不出来好文章的。因此我希望有关部門考慮一下，从典范的白話文著作中选出百把二百篇有代表性的好文章，編成一部模范文选，略加評注，广泛流通。有了这样一部好文章的选本，我們就可以拿来朝夕諷誦，子細推尋，再加上一些語法修辞上的輔助知識，久而久之，写作能力自然逐步提高，文風也就漸漸地改好了。

其次，关于写作，我希望我們大家經常把毛主席那篇«反对党八股»取出来，細讀几遍，鞭策自己。如果那里头所反对的我們都能改掉，所提倡的我們都能做到，那我們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好文章。这当然也需要刻苦的学習，長期的努力，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办到的。我在这里还想提出一个最低的要求，那就是，一篇文章起碼也要写得詞句通順。詞句通順就是文从字順，讀起来順口，听起来像話。我們写完一篇文稿之后，最好自己大声念它几遍，把不順口的，不像話的都改成順口的，像話的。我們今天的書刊里，詞句不通順的地方实在是很多的。

最后，談一談翻譯工作。我們的文風和近几十年的翻譯文字也有关系，这是大家都承認的。所以要改进文風，也需要不断地提高翻譯文字的質量。解放以来，翻譯工作已經有很显著的进步。特别可喜的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在俄文翻譯方面的努力。只要拿近几年这个編譯局新譯的經典著作和旧来的譯本对讀一下，就可以看出来新譯本的文字眞可以說是句斟字酌，后来居上了。这方面的翻譯經驗最好能总結一下，写成專著，供人参考。1957年12月出版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譯語彙編»已經是一部很好的参考書。如果能扩大范圍，分别門类，再編一部比較全面的俄語汉譯指南，那就更好了。其它各种外語的翻譯工作也应当随时总結經驗，不断提高。

以上是一时想到的，不知道是否妥当，提出来請大家批評討論。(1958年4月)

改进文風中的語言問題

王佐良

文風中的語言問題，有些偏見不可不破。例如瞧不起报章杂志文，尤其是社論体文，認为只有«紅楼夢»和«儒林外史»中所見的白話文才是純正的白話文，某些字必須照古体来写才見学問；又例如推崇外語的句子結構，認为非此不足以表示其为“新派”。有人專喜搜集四字成語，有人則爱用方言。究竟怎样才对？我想应該先确定主体，再談部分。

就主体而論，我們的新文風需要这样的語言：一是現代的，二是人民大众的，三是口語体的。現代的，因为語言是随着时代在变的，中国人民經历了大革命，又正在进行大建設，新人新事物不断涌現，思想感情起了空前未有的变化，生活本身就需要新詞彙和新的表現方式。人民大众的，因为語言原是人民所創造的，也只有劳动人民所慣用的語言才能表达我們这个偉大时代的精神，不过我們指的是不帶强烈的地方色彩、具有全国的普遍性的規范語；口語体的，因为只有口語是活

文風笔谈

改进文風問題管見

丁声树

关于改进文風，我想談这么几点:

先談一下讀文章和做文章的关系。从前的人做古文,做旧詩,主要是通过諷誦一些古文旧詩学会做的。“熟讀唐詩三百首,不会吟詩也会吟。”这話实在有些道理。現在我們做的是白話文,話怎么說，就怎么写,当然自由多了。但是做文章究竟和說話还不完全相同。白話文也幷不是容易做好的。我們也需要多讀一些用白話写的好文章,看看好文章是怎么写的,自己努力学習，才有可能写出好文章来。这里所說的好文章自然是指思想內容和語言形式都好的文章，也就是指又准确又鮮明又生动的文章。要是不讀文風好的文章，單靠語法修辞方面的書，恐怕是写不出来好文章的。因此我希望有关部門考虑一下，从典范的白話文著作中选出百把二百篇有代表性的好文章，編成一部模范文选，略加評注，广泛流通。有了这样一部好文章的选本,我們就可以拿来朝夕諷誦，子細推寻,再加上一些語法修辞上的輔助知識,久而久之,写作能力自然逐步提高,文風也就漸漸地改好了。

其次,关于写作,我希望我們大家經常把毛主席那篇《反对党八股》取出来,細讀几遍,鞭策自己。如果那里头所反对的我們都能改掉,所提倡的我們都能做到,那我們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好文章。这当然也需要刻苦的学習,長期的努力,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办到的。我在这里还想提出一个最低的要求,那就是,一篇文章起碼也要写得詞句通順。詞句通順就是文从字順，讀起来順口,听起来像話。我們写完一篇文稿之后,最好自己大声念它几遍，把不順口的，不像話的都改成順口的,像話的。我們今天的書刊里,詞句不通順的地方实在是很多的。

最后，談一談翻譯工作。我們的文風和近几十年的翻譯文字也有关系，这是大家都承認的。所以要改进文風，也需要不断地提高翻譯文字的質量。解放以来，翻譯工作已經有很显著的进步。特別可喜的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在俄文翻譯方面的努力。只要拿近几年这个編譯局新譯的經典著作和旧来的譯本对讀一下，就可以看出来新譯本的文字眞可以說是句斟字酌，后来居上了。这方面的翻譯經驗最好能总結一下，写成專著，供人参考。1957年12月出版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譯語彙編》已經是一部很好的参考書。如果能扩大范圍,分別門类,再編一部比較全面的俄語汉譯指南,那就更好了。其它各种外語的翻譯工作也应当随时总結經驗，不断提高。

以上是一时想到的,不知道是否妥当,提出来請大家批評討論。(1958年4月)

改进文風中的語言問題

王佐良

文風中的語言問題，有些偏見不可不破。例如瞧不起报章杂志文,尤其是社論体文,認为只有《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中所見的白話文才是純正的白話文，某些字必須照古体来写才見学問; 又例如推崇外語的句子結構，認为非此不足以表示其为“新派”。有人專喜搜集四字成語，有人則爱用方言。究竟怎样才对，我想应該先确定主体，再談部分。

就主体而論，我們的新文風需要这样的語言：一是現代的,二是人民大众的,三是口語体的。現代的,因为語言是随着时代在变的,中国人民經历了大革命,又正在进行大建設,新人新事物不断涌現,思想感情起了空前未有的变化，生活本身就需要新詞彙和新的表現方式。人民大众的,因为語言原是人民所創造的,也只有劳动人民所慣用的語言才能表达我們这个偉大时代的精神,不过我們指的是不帶强烈的地方色彩、具有全国的普遍性的規范語; 口語体的,因为只有口語是活

的語言，写起文章来虽然不免要做些紧縮、修整的功夫，但是只有使文字尽量接近口語，才能做到普及。

保証了主体，在部分上就可以而且应該有各种变化。成語用濫了的可以暫时休息一下，但也可以刷新或略加改变来用；許多成語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結晶，既簡練，又生动，叫人一見眼明，一听就懂，例如"乘風破浪"，"脫胎換骨"，"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重要的是必須注入新的內容，而且文章的主体必須是現代的白話；正因为主体如此，这些成語才能鮮明突出，得到强調的作用。同样，少量的方言可以給文章一种特色，但多了則易造成讀者的困难，能例外的是某些体裁，如描写某一特別地区的小說；可是主体仍然应該是全民規范語。适当地移植某些外国說法也是完全应該的，有些外国句子結構已經成为汉語的一部分，例如1958年4月27日人民日报的社論中便有这样的句法："更加令人信服地表明"，"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前面沒有"我們"字样，与此类似的是"必須看到…"，"应該了解…"），"如果說…，那末…"，等等，但是它們之所以能够順利地移植过来而且生存在活的語言之中，还是因为大体上是适合汉語的習慣的；即使有个別不甚适合的，由于处理得当，也可以用在一定的上下文中，这一定的上下文就是前面所說的主体；主体必須是現代的全民規范語。

部分的变化能大到什么程度，过此便要使主体变質？这是一个写文章而喜用成語、方言或外国說法的人必須注意的問題。这个限度也不是永远固定的，要隨讀者而变，隨題材而变，隨体裁而变，隨时間而变。例如某些題材的某些体裁（如边疆故事，向乡下农民作的报告等等）可以多用些方言；这些道理，不須多說。但从語言的發展来看，时間因素需要特別注意。今天是方言或外国說法的，明天不仅可能变成規范汉語，而且可能固定为新的成語。上面那些例子的性質，便是可以注意的。"令人信服地表明"一定是外国說法么？"治病救人"一定是成語么？汉語里难道真的沒有"如果說…，那末…"的句子結構么？我們又怎样来看党中央提出来的"引火燒身"（是成語还是新創的說法？）以及注入了新內容的"梁上君子"？

这一些也許不必爭辯，爭辯了也無法推翻事实，即它們是很好的現代汉語。我想要着重"現代"兩字，因为追求永恒的美丽典雅的風格只是厚古薄今的学院人士的痴夢，好的文章总是淸楚地打上作者所处时代的烙印的。要紧的是：必須言之有物，而要言之有物，必須尽快紅透專深。專門講究修詞是沒有用处的。

事实上，新的文風已在形成之中。从大字报和民歌中出現了多少新穎有力的說法！人民的語言永远是最宝貴的新詞新句的源泉，毛主席的文章一直是新文風的最好范例。試看下面这一段：

>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將来还需要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設强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長过程。
>
> 农民——这是中国工業市場的主体。只有他們能够供給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業品。
>
> 农民——这是中国軍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軍服的农民，他們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
> 农民——这是現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們就將一事無成。
>
> 农民——这是現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謂扫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众文艺，所謂国民衛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毛澤东选集，1101頁）

我們讀到这样的文章，首先感到的是毛主席的偉大：在这里，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对中国革命的無比信心、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三者合而为一了。文章吸引人的地方首先在这里。其次，我們才会靜下来發現文章風格的新穎：这里有連續几个并列短段，每段的起句是同一結構，使人淸楚地知道每段談农民問題的一个主要方面，然而談法不同：前三段全是正面的斷定，到了后兩段則加上了"如不依靠农民群众將發生什么后果"的反面論証，最后一段是在一系列的同样結構的短語（"所謂扫除文盲，所謂…，所謂…，所謂国民衛生"）之后，以一个挑战性的問句（只是形式上的問句）作了十分有力的一結。

这当然只是一个思想水平不高的讀者的初步分析，可能是完全錯誤的。但是这段引文应該还附帶証明一点：毛主席不仅善于創造新詞和旧詞新用，而且也是运用新的句型和新的段落的能手。新的，然而又是中国气派的。而这一切不是为了文章，而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內容。

剩下的一个問題便是語言学的研究怎样赶得上新文風的發展了。我們需要有人来研究毛主席、魯迅和其他重要作家的風格——科学地、全面地、系統地来研究，而不是只憑印象写些讀后感。我們需要全面了解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設大躍进对于文学語言所产生的历史性的影响。我們需要在大量搜集活的語言事实——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从《紅楼夢》等少数几本書摘引例句——之后重新編写語法教科書，重新审查我們对于汉語語法的結論。由于反右、大鳴大放，由于社会主义的大躍进，由于开会、討論、朗誦、广播，中国人民开口了——大大地开口了，到处都在說話，辯論着，歌唱着，欢天喜地地奔走相告，語句就像潮涌一般，一方面势必要淹沒某些語言学家根据外国語法和少数書本而获得的一些对中国語言的不科学的看法，另一方面又提供

了無比丰富的研究口語的第一手材料。这是史無前例的研究語言的大好机会，但要利用这个机会，語言学者必須改造思想，走出書齋。

讀　詩

老　舍

改变文風有許多問題，今天仅就文字上的問題說几句話，并以卞之琳同志的近作《十三陵水庫工地杂詩》为例。

卞之琳同志到十三陵去，并歌頌修建水庫，我向他致敬！可是，从文字上看，他的詩有严重的毛病，也願直言無隐地說出来，容或有益于新文風的树立。

(1) 因押韵，他往往用了旣不現成，又不明确的字眼兒。看这三行：

……鎬
别看我只是挖土，
我堵住山洪的咆哮！

因为要押"鎬"字的韵，所以他用了"咆哮"。"咆哮"不十分現成，更欠通俗，而且是堵不住的——它是怒号啊。他本想說：挖土是为堵住山洪的泛濫。可是，因为押韵，就忘了邏輯。我們修建了水庫之后，山洪还是要在往下奔流的时候咆哮的，沒人能堵住它，叫它一声不响。有了水庫之后，山洪虽然咆哮而来，可必定流入水庫，不再泛濫成灾。

詩須押韵与否，我無定見。我可是以为旣要押韵，就須苦心經营，不可随便拼凑。

(2) 随便造句，意思含糊不清，如：

我是养滿湖的活魚，

这一句可作几种不同的解釋：

1）我將要养魚滿湖。

2）湖中原来有魚，我去飼养。

3）湖中原来有魚，但是不多，所以我要养滿了湖。

4）我养活魚，不养死魚。

从这一节詩的全面来看，他的确是說："我將要养魚滿湖"。可是，他沒有順着这个意思去造句。还有：

这倒是自然的飞躍，
我們有革命的干勁：
打破千年的沉默，
一声"干"，山鳴谷应！

第一次讀，我不能确定：这是說某件事的自自然然的飞躍呢？还是大自然的飞躍呢？再讀一遍，我才猜到：这是說大自然的飞躍，因为末一句有"山鳴谷应，山与谷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可是，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山鳴谷应就算飞躍？山鳴谷应只是空洞的鳴与应，山与谷并不会动手修建水庫。是的，詩人也說："我們有革命的干勁"，这說明水庫是我們修的。可是，第一句偏偏有个"倒"字，又好像是說：我們虽有革命的干勁，水庫可到底是自然的自动飞躍了。这种說法实在有点"繞脖子"——用个北京土詞兒。当然，我也許沒能完全理解詩中的意思。再如：

墨守自然的成規，
等季节推移运轉，
調集来八方風雨，
就憑一声雷說幹！

这也"繞脖子"。据我了解，墨守成規总是說某某人反对改进，老按老經驗办事。那么，这里的第一句当然是說"自然"（人格化了）墨守自己的成規了，因为我們沒有法子代自然墨守成規，正像我不能代卞之琳同志墨守他自己的成規那样。可是第二句的"等"字，又彷彿說的是我們了！到底这都說的是誰跟誰呢？我弄不清楚。

第三句显然是轉笔，由从前的墨守成規改为現在的設法征服自然。可是，文字上并沒有轉折的痕迹，来了个硬轉弯兒。在作者想，这种笔法一定惊人。从我們讀者看来，我們不喜欢每讀兩句就吓一跳。我們願讀層次分明，轉折清楚的話語，不願飽受虛惊——这的确是虛惊，因为这几句并沒使我們受了任何眞正的感动。

末一句又是"一瓢水潑出你山溝"的怪調調，这种不自然，不像話的調調，我們已經听够了，不願再听。我們不敢干涉詩人的創作，但是我們有权告訴詩人：我們不喜欢这种故作惊奇，而实無可取的調調兒。

3）还有全段不知所云的，如：

晚了！晚了！等着看
二百万土方擱得住
六千万立方公尺
一場水变一片平湖！

对这几句，我沒的可說，因为完全不懂。我必須說，这也許完全由于我的低能，不能理解这样的詩；那么，請原諒我吧！

几首杂詩中还有許多不易懂，用字造句奇奇怪怪的地方，因忙，不多举例。总之，我以为这种古怪别扭的詩，对新詩的發展也許很不利。有不少青年，还不会写清順的散文，即想作詩，所以往往写出不通的或似通不通的句子来。他們看到卞之琳同志的不用現成話，不用大家所習慣的語法写成的詩，必会"有詩为証"地說：看，詩本来可以这样不明不白，高深莫測！

詩应当怎样运用文字，是詩人的事，我不便多說什么。我只以讀者之一的資格要求詩人写明白些，順当些，叫讀者看得出詩人怎么給普通語言加了工，而不是和普通語言完全脫了节。我想：我的要求或者也是广大人民的要求。詩用白話写，本来是为大家看得懂，絕不是叫大家看不懂。我沒有絲毫看不起卞之琳同志的意思。反之，我希望他多写，写得明白、順当，以便促进文風的改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文風偶記

呂叔湘

一

文風問題牵涉到許多方面，从思想方法到选詞、造句、使用标点符号，都有关系。(甚至原稿的清楚或潦草也未尝不可包括在文風之內。字迹潦草、錯字、落字好像也已經成为一种風气，一种要不得的歪風，不但給編輯、排字和校对工作者添麻煩，而且也容易在印件上出錯。)大問題我談不好，这里談的只是讀書看报的时候随手記下的一些小事情。本来想用"文風識小"做題目，一想，不对，这"識小"二字对好些讀者是费解的。白話和文言的斗爭好像已經过去了，可是文言这东西源远流長，积累了不少成語和典故，对于写文章的人还是具有極大的誘惑力，尤其在拟一个标題什么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說成語和典故用不得，是說得为現代的讀者設想，非必要不用，不是一般人所熟悉或者一看就懂的不用。最近在报上看到一条新聞的标題，就覚得大可斟酌。这条新聞的标題是"伊拉克山雨欲来/近二百名軍官被捕"。孤立起来看，"山雨欲来"这四个字在这里可說是形容恰当，可是如果作者不給讀者一点兒帮助，許多讀者是不会懂得这四个字的涵义的。但是这条新聞本身只說："伊拉克当局逮捕了伊拉克陆軍的192 名軍官，罪名是策划政变。正在繼續大批逮捕爱国人士。"讀者还是不懂标題里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如果能在最后加上一句"伊拉克政局大有'山雨欲来風滿楼'之势"，讀者就明白了；否則，最好不要在标題里边用上这四个字。

二

早些时候我写了一篇短文，說新聞报道必須注意数目、日期、地望的正确性(《新聞業务》五月号)，最近又看見一篇报道，那里边的地理方位沒交代清楚，会引起讀者的疑問。这篇文章是《旅行家》四月号里的《新兴的石油城——克拉瑪依》。作者描写这个城市的形狀，"是从西而北的長方形"，这句話很費解。"从西到东"，"从南到北"，都好懂，"从西而北"是怎么个方向呢？仔細揣摩之后，才知道是"从西南到东北"的意思。問題还沒完全解决。这个城市既然是長方形，这从西南到东北的方向是長边的方向呢，还是短边的方面呢？这一点作者始終沒交代。

作者接着描写这个城市的居民区："長方形的西北边是居民区，东南是工業区，中間留着几百公尺准备栽培綠化林帶的空地。在居民区，一条从西而北的寬闊主干馬路把居民区辟为兩半。……我从这条馬路上漫步到市中心。…… 我在市中心送别了一輛輛开往油田的汽車之后，沿着这条馬路向西边的居民区走去。"問題又来了。居民区在西北边，工業区在东南，那末，中間的空地是西南-东北走向。居民区的主干馬路又是"从西而北"，如果还是"从西南到东北"的意思，这条馬路就和作为居民区和工業区分界的空地平行，沿着这条馬路漫步就到不了市中心。按城市規划的一般情况来判断，这条主干馬路該是跟那空地垂直相交的，市中心就在这条馬路接近空地的一段，那末，它的走向該是西北-东南，就不可能还是"从西而北"。底下說从市中心往居民区走去是"向西"，也难于理解，因为照作者上文的描写，無論怎样解釋，这条馬路不是西北-东南向，就是西南-东北向，决不会是正东-正西向，"向西"的意义就很不明确。

另一个問題是成吉斯汗山的位置。作者住在招待所，"第二天清晨，当黎明的晨曦剛越过成吉斯汗山尖投射在窗戶上的时候……"，这只能理解为成吉斯汗山在招待所的东方。可是作者在下文再提到成吉斯汗山的时候，說是"綿延在市郊西北边"。把这兩处的叙述对照起来看，成吉斯汗山在城市的西北郊，招待所又在它的西方，那就到了遙远的郊外了。招待所設在郊外，不大近情理，而且作者在上文也說过，"走出招待所的門向四周望去，四面一片建筑物一直延伸到远方"，可見这招待所离市中心不远，决不在郊外。那末，这成吉斯汗山到底在克拉瑪依城的哪一边呢？

东南西北、上下左右，也許有人認为是小問題，搞錯点兒不算什么。我不敢苟同。

三

同一期的《旅行家》里还有一篇《金色的布拉格》，那里边也有些小問題，主要是詞句方面的。

在文章的第二段就有这么一句："沿途風景的特点就是果园、麦田和河谷上面都生長着茂密的森林，蒼翠可爱，草地上牛羊成群，看不到一亩未开恳的土地，眞是一片美好的国土。"河谷里有森林，这是很普通的。果园里有森林，就不大好講：果园里有果树，可是不会

"茂密"，一般也不称为森林。至于麦田里生長着茂密的森林，那就很难想象了。（这里的問題在于"上面"二字。捷克境內多山，山上有森林，山下有果园和麦田，有河谷。光用"上面"二字如何能把这情况說明白呢？）草地上牛羊成群，可見草地不少。草地能不能算开恳的土地呢？恐怕不能。那末，"看不到一亩未开恳的土地"的說法也还欠周到。

下面的一段有一句是："沿河兩岸峻峭的山壁，消失在列特林平原里。"这一句描写的山川形势不够清楚，"山壁"怎样"消失在平原里"，实在不大好懂。如果是山坡緩緩而下，以至于無，那就不能叫做"峻峭"。

底下的一句是："密密茂茂的花叢綠蔭襯托着巍峨壯丽的宮殿和尖塔，交織成一幅壯丽多姿的画面。""花叢"好懂，"綠蔭"也不难懂，可是連成一片，再加上形容詞"密密茂茂"，反而有点形象模糊起来了。不知道是"花叢的綠蔭"呢，还是"花叢和綠蔭"？前者不好講，后者則按汉語的習惯这四个字要鬧不团結，不比"花叢树底"、"繁花綠蔭"什么的。再說"壯丽"这个形容詞。作者所要刻划的画面的一个組成部分是宮殿和尖塔，它們的美学性質是"壯丽"。画面的另一个組成部分是花和树，用它們襯托宮殿和尖塔，交織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美学性質又是什么呢？还是"壯丽"！——不錯，底下还有一个形容詞"多姿"，可是这"多姿"也生疏得很，它究竟是怎么个意思，加在"壯丽"之后又該怎么講呢？

除了这一类詞句問題，也还有事实問題。"自从英勇的苏联紅軍解放了捷克以后，布拉格不再是封建帝王游玩享乐的地方……。"作者忘了奥匈帝国的瓦解是在1918年，这以后布拉格就"不再是封建帝王游玩享乐的地方"。虽然从1918年到1945年这二十七年中，捷克的政权操于資产阶級之手，可是名义上总算是一个共和国，已經只有总統，沒有皇帝了。

大家都有責任

朱德熙

改进文風，大家都有責任，下面四种人責任尤其大。

第一是語文工作者。对于青年学生和文化水平比較低的干部来說，改进文風实际上就是一个提高他們的語文修养的問題。在这方面語文工作者可以做許多事。譬如說，現在还沒有一部切合实用而且比較詳尽的詞典。談語法和修辞的書虽然也出了一些，但是眞能解决实际問題的可并不多。这兩年大家都在进行科学研究，对于普及工作重視不够。这也是一种脫离实际的傾向。今后我們应該多貢献一些力量，使这方面的工作大大地躍进一步。

第二是作家。文艺作品的讀者最多，影响也最大。一般人讀文艺作品，除了在思想內容上有所感受之外，語言上也必然会受到薰陶。就这一点說，作家不但是灵魂工程师，同时也是語文教师。可是有些文艺作品还不能满足这个要求，文字不够精煉，不够确切，矯揉造作，詰屈聱牙等等毛病不一而足。这种情形甚至在名作家的作品里也可以找到。随便举一个例子："战爭把一切时間、生活、經历变得轉眼一瞬，一支人民軍队苦战了几十年，年老的都不知道老干部的过去历史了。"这样的句子就是放在初中学生的作文里，也是通不过的，想不到居然会出現在負有盛名的作家笔下，这实在不能不令人吃惊。

第三是翻譯工作者。翻譯不容易，譯得好更难。这几年認眞、負責的好翻譯固然有，可是粗制濫造的也仍然不少，高尔基《我的童年》的一种譯本里竟然有这样的句子："这是一本短而厚的胖胖的書。""我的蒼白的而且几乎疲乏的舅母耐心地激怒我。"这根本談不上什么翻譯，簡直是在糟塌原著。一个人如果老讀这样的書，文章永远也不会写通的。

第四是編輯工作者。报紙杂志对于文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譬如《人民日报》的社論里偶然用了一兩个比較新鮮的詞語，立刻就会在群众口头或笔下流行起来。这几年編輯工作者对于文字比較注意，但是疏忽之处也不是沒有。就拿《人民日报》来說，标題及个别句子出毛病的事仍然常見。

目前文風不正的現象相当严重，别的不說，就連大学中文系的学生里，写不通文字的就大有人在。教师当然要負主要的責任，但是社会上的影响也确实不容忽視。他們每天看报，看杂志，看文艺作品，看翻譯作品。这些讀物給他們的影响决不会比教师在課堂上給他們的影响小。我希望今后出版社和报紙、杂志的編輯部审閱稿件时在文字方面要多多注意，再不要讓那些不通順的文章得到在广大的讀者中傳播的机会。

改变文風首先要改造思想

吳曉鈴

斯大林同志在《論馬克思主义在語言学中的問題》里有一段話說：

> 語言是工具、武器，人們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語言是直接与思惟联系的，它把人的思惟

活动的結果，認識活动的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的了。”①

这是很重要的一段話。联系到文風的問題来說，我認为“郭沫若同志关于文風問題答本刊記者問”②里談得很好：

文風不單純是語言問題，主要还是思想方法問題。写文章是表达思想，思想是“文”的骨干和核心。怎样才能使文章写的准确、鮮明、生动呢？首先要看写文章的人的思想、立場、作風怎样。你的思想正确、态度鮮明、作風正派，那么，你写的文章也就有一定的准确性和鮮明性。

这話非常恰当地說明了“語言是思想底直接現实”的道理。

从这兒說起，我覺得要想改变文風，首先得改造思想。这是个根本問題。在文風上所暴露出来的許許多多的不正常的現象，子細一分析，都能推究到思想上面去。有人的文章写得气势冲冲，張牙舞爪，态度粗暴而霸道，这恐怕就不是單純用“驕气”所能概括得了的。有人的文章写得哀哀怨怨，扭扭捏捏，感情不明朗，不健康，这恐怕也不是單純用“怨气”和“嬌气”所能說明得了的。有人的文章專好以艰深文淺陋，誠心不讓讀者看得懂；或者故意模稜兩可，故意要把讀者糊弄得莫名其妙；这当然是別有用“心”。就單說是屬于“驕气”、“怨气”、“嬌气”和“別有用‘心’”的表現吧，难道这就不能归結于思想問題上么？語言虽然沒有阶級性，但是思想是屬于阶級范疇的东西，而語言又是为任何阶級服务的。滿腦子資产阶級思想，說出話来就一定会表現或流露出来資产阶級思想里的骯髒的成分，尽管那个人怎么样在用力压抑或是收斂。压抑和收斂是不会产生效果的，我在这次整風运动中有深切的体驗，因为那只是屬于技术性的改变，不是根本的变化。因为那只是屬于暫时性的改变，是不可能巩固下去的。

改变文風肯定的是屬于全民整風的范圍之內的。在这里，我們也要求能够达到“东風压倒西風”，就是無产阶級之風来代替資产阶級之風。

漫談文風

陸志韦

自己写不好文章，也居然談文風，只能自己作为警惕吧。

文章的風格，至少一部分决定于写来給誰唸。例如过去很長一个时期里的“白話文”，多半是为知識分子写的，就不必計較文体是否接近口語，語言是否純潔。写“白話”和写口語，文風上的确有所不同。我以为这种分別，現在还存在着，并且不妨讓它存在着。最需要留意的，倒是像郭沫若院長已經提醒我們的，內容空洞；或是思想本不清楚，話自然也說不清楚。本沒有什么文章可写的，偏要写，就不免空洞，就会“淺入深出。”

其次，我想談談文章接近口語的問題。文学語言是人民日常口語的加工，这一点我看大家都会同意。加工到什么程度呢？这就难說。假如我說，“需要加工的就加工，不需要的就不加”，这等于說廢話。我以为越是主張多加工的人就越需要多听听人民的語言。文章和口語的分別，有的幷不是分別。例如“虽然”、“旣然”、“然而”等等連接詞，工农大众口头上不常說，但是确实需要說的时候，連文盲都会說，七、八岁的孩子也会說。理論性的文章必得用上这一类詞，那幷不是口語的加工，只是文体和語体不能也不必完全一致。文体的浮华出在另一方面（不在“虛字”上，是在“实字”上）。例如哪一个方言里，人民口头上都有極丰富的动詞和形容詞的詞彙，特別是單音的。在这上，方言的分別相当大，所以写下来看着不順眼，勉强学說也覺得太“寒碜”。这一类的詞还时常在發生。“务虛务实”的口号一提出，报上就載着“务虛务得好”之类的說法；这“务”字單用，乍一看覺得特別。五四以来的趋势好像是尽量避免这些口头詞，同时又从詩詞歌賦里找一些虛浮的字眼来替代它們，誰都不說的，直到現在，笔底下和口头上还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这矛盾不知怎么解决。

写文章为了什么

郑奠

写文章，为了要把自己所知道的知識（包括对自然界和对阶級社会的斗爭知識）告訴給人家，叫人家也同样地知道。写文章，也为了要把自己所有的感情（包括阶級情感和私人情感）反映給人家，叫人家也同样的感受。無論知識也好，感情也好，写文章在这当兒，一定起着人和人之間交流思想的作用，阶級斗爭的作用。要圓滿地达到这交流和斗爭的目的，必須很好地使用語言文字来表达（包括書面語和口語）。

写文章的人，对于他所要表达的思想內容，自己首先必須运用正确的观点，理解得清清楚楚，到了用語言

---

① 《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0年。

② 《新观察》第7期，1958年4月。

表达的时候，才能写得明明白白，准确到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写文章的人，对于用来表达思想內容的語言形式(或語言技巧)，也必須掌握得头头是道，到了使用它的时候，才能左右咸宜。

把心中所想說的眞理实情，事事物物都十分显明地也同时十分生动地表达出来。使得讀这文章的人們很快地就懂，懂了之后，又永久地感到意味深長，百讀不厭。因而对于社会的进步，起着推动的作用，發生良好的影响。

但是，現时有些文章似乎不太一样，从这些文章表現出来的一般現象来看：

有些文章叫人不容易看得懂。——这一类文章，由于写作的人，自己对于他所要說的思想內容本来不很清楚，或者根本不清楚，又怎么能通过語言就叫人看懂了呢？也有的，他所說的道理原来也很膚浅，而他故意說得艰深，造成晦澀。此外，由于用些与語言習慣距离过远的欧化句式，用些比較冷僻的文言詞彙，用些極不普通的方言詞，等等，都会妨害到对于文章的全面理解。

又有些文章，叫人"不願意讀完"或者叫人"不乐意再讀"。——这类文章，有的篇幅很長，而內容空洞；有的言不由衷，而空話連篇；有的陈陈相因，了無新意；有的平鋪直叙，絕不生动。这种种現象，都使得讀者有費力多而收获少甚至有讀了等于不讀的感想，又怎么能够鼓舞讀者爱不釋手呢！

如果我們前面所談的叫人不容易讀或者叫人不乐意讀这兩种情形，相当广泛，而且有形成"文風"的趋势；那末，改革这不良的"文風"，应該成为語文工作者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毛主席所指示的写文章要 1) 准确 2)鮮明 3)生动这三点，应該作为今后改进"文風"的指标。

談文風的改进

胡裕树

人民日报發表过兩篇社論，① 号召我們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語言，積極地为汉語規范化而努力。毛主席在《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前边所加的按語里，对写文章作了重要的指示。广大的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下，对文風問題已經开始注意，并且作了一些改进；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方面存在的問題还是很多的。

我們經常在报章杂志上發現一些用詞不当和語法錯誤的句子，或者語法上勉强通得过但在修辞上非常笨拙的句子，看起来很吃力，很头疼。有些文章用詞造句方面沒有什么毛病，但篇章結構有問題，条理不清，段落不明，看的人也感到很討厭。有些文章运用語言的技巧比較高明，但又流于空話連篇，言之無物，浪費了讀者的时間。标点符号的錯誤尤其常見了，一篇文章里用錯几个标点好像不算什么似的。混乱的現象当然不止表現在这几个方面，但就拿这几点来看，已經足够說明問題的严重性了。

語言文字是人們交流思想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斗爭和社会發展的工具。目前我們国家在各个战綫上出現了空前的、全面的大躍进。在各項工作中創造了不少的奇迹，积累了很多宝貴的經驗。很可惜，有些先进人物和事例，被作者写得不生动，不形象化；有些可貴的工作經驗，被作者用晦澀难懂的文字写成了党八股。这就减低了教育意义，应該說是一个很大的損失，必須大力改进这种不健康的文風。

語言和文字是全民使用的，要促进我們語言文字的純潔和健康，必須全民参与这个工作。但是語文工作者，包括从事研究工作的和从事教学工作的，对于这个工作更負担着特別重大的責任。目前，我認为有几件事可以先做起来：

第一，組織和开展有关文風問題的大辯論。最近郭沫若院長發表了有关写文章的一些意見，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視，有些报紙、刊物已經組織笔談，这是很对的。我看不妨把辯論的范圍扩大一点，辯論的方式增加一点，比方說在学校、机关、团体、学会以及社会上普遍地組織一些座談会、辯論会。通过座談和辯論，使党的語言政策和毛主席关于文風問題的指示为群众所正确地掌握，使群众能够自覺地把改进文風、实現汉語規范化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

第二，开展批評工作。目前报章杂志上的文章以及出版的書籍，質量虽有提高，但如前所說，粗制濫造的情况仍然存在。甚至有些談語法的文章里也有語法的錯誤，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諷刺。对于这种不負責任的資产阶級作風，应当予以严厉的批判。从 1956 年 8 月起，《中国語文》增設"語文短評"一欄，把一些在詞彙或語法方面有問題的詞句提出来討論和改正，这样做也貫徹了批評的精神，对汉語規范化是起着促进作用的，应該得到語文工作者的支持。此外，报紙和刊物的編輯同志必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順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②

---

① 人民日报 1951 年 6 月 6 日社論《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語言，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1955 年 10 月 26 日社論《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話、实現汉語規范化而努力》

② 見《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前边所加的按語。

第三，加强現代汉語的研究工作。我們現在还沒有一本能体現詞彙規范化的現代汉語詞典，也还缺少体現規范化精神的語法著作和修辞著作，質量較高的有关文章作法的書籍也很少見。这就使得汉語規范化和文風改进工作發生一定的困难和受到一定的阻碍。从当前国家的需要来看，这些工作必須尽速完成。因此动員所有的力量，按照"全面規划、加强領导"的方針，訂出切实的計划，認眞地通力合作地加以执行是完全必要的。我国研究語言的人才虽然不多，但是通过全面整風，思想認識和积極性普遍提高，在鼓足干勁的情况下，完成这些工作是可能的。我們希望語言研究所在这方面多做点領导和組織工作。

第四，加强語文教学工作。目前的語文教学，無論在中等学校或者高等学校，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这是無庸諱言的。这些缺点中最突出的就是理論脫离实际。在教学中过多地談术語，談概念，談空洞的理論，而对語言的实践(包括閱讀和写作)往往忽視。一个中文系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畢業，学習了十多年的語文，尽管能談出一套語言学理論，但不能保証在写作中不犯語言上的錯誤，甚至連标点符号也不能正确地掌握。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別的，必須引起我們的重視。我覺得从事語文教学工作的，应該檢查一下过去的教学內容和教学方法，教科書的編写者也要总結一下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在語文教学上来一个大革新。只有这样，文風的改进，合格人才的培养才能得到保証。

人民日报社論指出："这种語言混乱現象的繼續存在，在政治上是对于人民利益的損害，对于祖国的語言也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破坏。每一个人都有責任糾正这种現象，以建立正确地运用語言的严肃文風。"这是值得我們仔細体会的。

談改进文風

姜亮夫

一

«中国語文»把改进文風的討論作为当前中心任务之一，这是非常适时的。要我也参加討論，理無可辞；但这是件大事，細心思索，謹愼提出，非短时間所能办，姑且拉杂写点。

"文病"一事，自先秦以来，已大有人談論：董仲舒、楊雄、王充、仲長統、曹丕、陆机、裴子野、刘勰、顏之推、刘知几、韓愈、白居易、欧陽修、陈亮、宋濂、方孝孺、唐順之、楊愼、顧亭林、王夫之、章学誠、王国維、梁啓超、章炳麟…都針对当时文弊，提出过批評或建議。这理由很簡單，时代变了，新思想新事物出現了，新詞彙产生了，一切旧的典型性的事事物物，再也不能套在当时人民乃至"学士文人"头上，于是必然要有相应于这一时代的文風，所以改进文風是个古老問題，也是永久在变，永久要求"变"的問題。

但这里面所涉及的方面極多，最根本的自然是思想。比如，我为什么向人說話，向什么人說話，說什么話，这就是"言之有物"的物，"言之成理"的理。这点我不想在这兒談。另外一个問題是語言。語言問題的复杂、重要，也不次于思想。思想与語言又不易割裂，也不应割裂，但現在的文弊，有許多單从語言角度也可以說得明白。

先臚列一点当代文弊的条目，好根据說話。

(1)八股。八股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1)套公式，2)套章法，3)說假話，4)說空話，5)背教条，6)喊口号，7)挂長銜，8)摆架子。

(2)廢話連篇的長文。

(3)处处裝上不必要的术語——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术語。

(4)全篇只是些"概念"的空話。

(5)忸忸怩怩，不痛不痒。

这五款十二項，未必已將現在文弊說完，但重要的已在。其实某人某篇文章，偶然有点"公式"，背点"教条"，偶有几句"廢話"，多少有点"术語"，也都不太要紧，問題是全篇一律，乃至千篇一律，成了"風"。这个"風"吹到哪兒，哪兒成灾，这就得"整改"一下。

这里面譬如說假話、說空話、摆臭架子、忸怩、背教条、挂長銜、裝术語等，大都有思想根源。毛病都在于非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場，不面向工农大众，旨在裝点自己。其实，"將叛者其辞慚，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应作簡明解)，躁人之辞多，誣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文如其人，是誰也騙不过的。思想上有許許多多問題的人，造成形形色色的毛病，假若这不能从根兒認識，是改也改不过来的。

假使有了思想內容，認清了对象，这十二弊自然会减少。但文章到底不全同于兩片嘴皮一条舌头那样方便，再加上表情、語气，使人聞而神会；(見下)白紙上只有黑字，表情無他依緣，多少得靠些語言技巧。譬如套公式，套章法，要是知道"公式"不仅有"加减乘除"，还有几何、代数、微积分，乃至物理化学"公式"，那也不会变成千篇一律的刻版相，这也是篇章結構問題。又如句子長得可怕，可能是不知造句变化。

这些語言問題也是改进中应注意应討論的。簡單点說，要把詞彙、語法、修辞，乃至于音韵的研究来配合这一改进，这还是語文工作者的責任!

但是不是說，一切学生，一切学写文章的人，把語

法詞彙等学習一下子，便什么都解决了？这也未必然。文学家不管語法修辞的很多，語言学家文章写得不够好的也不少。我想为引导青年学習，像夏丏尊先生的«文章作法»，郭紹虞先生的«学文示例»那类的書，写得再簡單一点，更具体一点，作为篇章結構、修辞要点的示范材料，可能比学習語法修辞更有用些。另外写点分析解釋詞彙的詞典，也可能帮助免去"术語""概念""忸怩""枯澀""口号"一类的弊病。再由作家們提倡有啥写啥，結結实实的搞，使得語句显豁，遣辞明快，干干淨淨，不支不蔓，造成一种風气与学習基础，里应外合，文風之变，是可以做得到的！

二

自从改进文風倡議以来，提出了不少的問題。我以为值得注意的，有下面兩事：

(1)語文統一問題。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时代，是需要語文統一的，但有人以为从汉語的历史看来，有些問題。自周秦以来(周以前所知甚少)，汉語的口語与書面語便有些距离，不仅是語气詞、虚助字，乃至詞彙、語法，都可以一一指数。从文学的發展来看——尤其是隋唐以后的發展，是天天在追赶口語，到五四以后，多少是更多接近些了。然而書面語到底还不可能全部口語化(有些地方性文艺，虽口語化，又未必普通化)，这里面是什么道理？

又如汉晋竹簡的記載，六朝以来的供詞、判詞、彈詞(如文选所載奏彈刘整)，敦煌唐写本里的借券、买卖券及一切"俗文学"，宋人的平話、元曲，明傳奇，等等，里面有許多口語为現代所难了解。假如我們用現代口語写，是否会使后人多一重張相先生那样的工作，这又怎样办？这是第二問。

这确实是文章与口語已經存在过的現象，其实这兩个矛盾，現在正在进行徹底解决。第一問是关乎汉語与汉文字的距离，非單純的語言問題。普通話普遍推行以后，拼音文字出現以后，这个問題就会漸漸不存在了。古来从未做过統一語言的工作（或做过而成效未見)，現在正向着統一的路走，那些历史的痕迹，必然不会重演。第二問一大部分也屬于标准語言問題，与第一問相似。其余小部分，只是新思想新事物發展所造成的語言現象，不怕沒有千百个張相先生来作研究。

还有一点，即我在上文說过的，語言有官能的依緣(用«荀子，正名篇»义)，而文章只是白紙上的黑字，少了面对面的依緣，听受者当面了解对方語言的意义，比讀文章容易深切。譬如一个允許还債的人，同样用"还你"二字，而有不同的意义。1)要是声調低而緩，則有向債主乞憐，請求稍緩的意味。2)要是把"还"字讀重，"你"字讀得輕而短，其意好像說"有啥了不得，早晚还你就是了！"是干脆的口吻。3)要是把"你"字讀得重長，則是疑問口吻，"你还希望我还你嗎？"这三种声調之异，必然牽連到眉目手足的表情。古文里用"諾"，用"然"，用"可"，用"唯"，当然不眞；即使用了口語的"还你"，我們也还認不出是三种中的哪一种。

我主張制一套表示語气高低、强弱、緩急、長短的符号(如何别于声調符号，或借用国际音标中的符号皆可)，注在某些用作語文教本的字旁，則文章不仅与口語相近，而且更活潑。有了这套符号，語調作用加强，則手足眉目的傳情，也可由想像推知。

到这兒又碰到一个問題是：方言入文，自古有之。若要口語眞切，是否也可以适当吸收一些方言詞，如方音的語气詞、虚助字，乃至地方俗語、歇后語等。我想这不必謬謬过虑，这只是暫时景色，普通話推行到了，不必要的方言詞自然会被普通話的詞所代替，况且方言中有極多語妙天下的詞彙，也应吸入，以丰富普通話詞彙。我主張采用方言詞时，文中要加以注明；要是長篇大文，不妨文尾来一个音义。試看我們老祖宗翻釋佛經，不是多半后附音义嗎？

总之，語文統一問題在过去是做不到的，今后只是对象、只是方法、只是如何"过渡"的問題。

(2)还是一个从对象到"史文"問題。上面所說的文章，其对象都是人民大众，因此应該用口語写眞，使人人能懂，能欣賞，能感受，不論其文体为詩歌、小說、戏曲。

此外，有一种文章主要是对后人負責的，即所謂"史文"。这类史文是不是也以口語为趣归？"史文"不能如一般文学作品那样細膩地描写，可是同样要求眞实，但这种眞实，应当重于理性，而非重于感性。它不仅要感人，也得显示历史發展的眞实性，使人彰往而知来。我看过很多近代賢哲志士的傳記，有的好像小說，有的好像写超人的人，人物事迹的眞实性令人怀疑。我以为写"史文"应有一种高度的归納能力，从語言来說，应有高度的技术修养，高度的表达方法；不仅止于干淨爽利，更要深入淺出，要平正，要直道，要錐練而且精簡。

如何算高度修养，就現在想到的写点在下面：

1）以历史傳統中的基本詞彙、基本語法为基础。

2）选擇这些基础中最明淨精簡而又易了解的使用。

3）选用能表达新思想、新事物的最好最妥的詞和术語。

4）劊去一切浮詞，"以簡要为主"(史通語)。

5）文中多用夾注。

多快好省，改进文風

唐 蘭

全国人民在轟轟烈烈地建設社会主义，每个人都在飞躍前进，力求又紅又專，我們应該多写、快写文章，多發表自己意見，多抒写个人經过困难，在斗爭中前进的愉快心情；多議論世界上、国內、人民中所發生的一切大事情，多記載生产上的大發展、大躍进、科学技术上的大革新；多描写英雄們英勇斗爭的史迹和工人农民們的忘我劳动热情；多歌頌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的新社会的光明，多批判社会上遺留下来的旧習慣、坏思想与惡劣作風，…总之，需要写的东西很多，也很迫切，我們应該想到就写，看見就写，提起笔来就写；要快人快語，無畏無惧，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不要瞻前顧后，怕狼怕虎，惜墨如金；不要尽想写大部头，藏之名山，看不起小文章，不屑动笔；巧而迟不如拙而速，必須学会能赶上社会主义建設的速度。

当然，在有些人看来，多快还容易，好省却困难。坏文章常常碰到，种类很多，举例說明，有如：

1）写不了，硬要写。"临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应該多学習，多調查研究，但是有些人不肯虚心，不肯老老实实下些工夫；只为賺稿費，为出風头，于是無中生有，东抄西襲，改头換面，生搬硬凑，辞句不通，文理不順。写的人也曾抓耳撓腮为凑成字数而奋斗，讀的人却無法終篇。

2）油腔滑調，花言巧語，言之無物，根本不为什么，只为写文章而写，仗着一套鬼聪明，表面上也說得头头是道，可是沒有具体內容，沒有中心思想，尽管写了万兒八千，但空空洞洞一無所有。

3）公式化与教条气，永远老一套。搬弄一些名詞，引用一些詞句，講一些簡單大道理，不結合当前的具体內容。1958年的总結，可以挪到1959年或60年去用也無妨碍，乍看上去也是夸夸其談，像有一些道理，兩篇如此，三篇也如此，久看起膩，久听生煩。

4）言不由衷，随声附和，心里尙未了了，笔下依样葫蘆。或者勉强敷衍，了草塞責；或者轉弯抹角，委婉曲折，有意叫人莫名其妙，但实际在字里行間，总在自相矛盾。

5）文不对題，表面說东，实际說西，表面馬列主义，实际老一套，越古越好。題目是現代的，一讀內容是陈芝麻、爛谷子，是中外旧書店里抄来的。

6）言过其实，故意夸張，矯揉造作，不切实际；贊揚时捧入云霄，毁損时百般挑剔，使人感覺到不眞实，沒有力量。

7）拚命修飾，堆砌字眼，塗朱擦粉，語句生硬，想要美化，反而丑态百出，支离破碎，讓人讀不下去。

8）垃圾馬車，又臭又長，下笔万言，滔滔不絕。像老太太上街买菜，碰見熟人，聊起閑天，沒結沒完；或者像破爛旧貨攤，样样都要，拚命抄書，以示淵博，越長越好，用以吓人。

諸如此类，都应該算是坏文章，坏而長的文章，固然是費，但即使不長，文章旣坏，印了出来，浪費紙張人力，浪費讀者时間精力，也都是費。坏文章里有时还有毒素，更不宜于傳播。

今天，一篇文字刊布以后，就有千千万万人閱讀，必須坚持好而省的方針。

又要多快，又要好省，首先必須改进文風，才能繁荣作品，为社会主义建設大躍进而努力。

漫談文風中的三个問題

高名凱

語言是推动文化發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由文字所組成的書面語言更是如此，因为只有能够克服时間和空間的障碍的書面語言才能够更加有效的傳布知識，对散处各地的、世世代代的群众进行阶級斗爭和生产斗爭的教育，使文化随着發展起来。这也正是各国人民在文化教育事業中首先要努力教导人們識字和写作的原因。

書面語言旣是發展文化事業的重要动力之一，合理或不合理的运用書面語言就会直接影响到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所以，如何运用書面語言去进行知識的傳授和阶級斗爭的教育，不但是各族人民所关心的，同时也是在斗爭着的各个阶級所重視的問題，虽然語言本身并沒有阶級性。

語言之所以是推动文化教育事業的重要动力之一，因为它是人們用以表达思想感情的交际工具。思維活动所获得的知識，阶級斗爭所获得的知識，以及人們对事物的看法和感情，都要通过語言来表达。因此，运用語言之是否合理或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能恰当而完善地帮助人們完成交际任务。为着使語言能够帮助人們恰当而完善的完成交际任务，首先就要使語言中的各个要素（語音、詞彙、語法）有社会中全体組成員所共同理解和共同遵守的規范。这也正是我国人民在过去一段时間里，在党的領导下，努力进行推广普通話汉語規范化工作的一个原因。几年来，在党的正确領导下，我国人民在現代汉語規范化工作上已經取得了

巨大的成績，虽然我們还要更进一步的推广普通話，更进一步的促进現代汉語的規范化。

然而，現代汉語的一般的語音、詞彙和語法的規范化并不是使人們能够更加有效的运用現代汉語的唯一措施。書面語言的一般的規范化只是合理运用語言的各种措施之一。音發对了，詞彙也用对了，語法規則也被遵守了，自然会使各地区汉族人民之間彼此交际起来能够互相了解。但是仅仅如此，語言的运用还不能發揮更大的效能。比如有兩篇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尽管基本上是相同的，它們尽管写来都符合語音、詞彙和語法的規范，效果却可能不同。其所以如此，正因为除了遵守語言各要素的規范之外，还有各自的不同的写作艺术。这种写作艺术所構成的写作的風气，就叫做文風。今天，党再进一步的提出整頓文風的問題，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虽然我們也不缺乏語言艺术家（毛主席就是一位偉大的語言艺术家），但是一般的說，我們从事于写作的人还不能十分完善的掌握語言艺术，則是目前的実情。这就使得"整頓文風"成为我国目前的重要社会运动之一。如果我們不能及时的解决这个問題，我們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設事業就要受到影响。

我国目前的文風問題到底表現在什么地方呢？依我看来，它表現在下面三方面：

1）修辞問題。由于着重語音、詞彙和語法的規范化工作，还来不及講究修辞，我們目前的文風就有缺乏修辞艺术的傾向。我們的文章往往"言之無物"，缺乏具体的內容，沒有中心的思想。我們的文章也缺乏邏輯性，往往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或錯誤的推理。我們的文章又往往用詞不准确或运用一些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术語。这些都使讀者不知所云。我們的文章又写得很不簡煉，往往洋洋数万言，东拉西扯，漫無边际，把中心思想湮沒在言語的洪流之中，叫看文章的人無从寻找。我們的文章又喜欢堆砌，用上一大堆沒有作用的"漂亮"的詞句，几乎把字典上所能找到的形容語都堆上，裝飾得像个塗脂抹粉的老太婆，叫人看来难受。我們的文章又往往前后重复，同样一句話在文章里重复了好几次。这样的不簡煉的情形只有浪費讀者的时間，并使讀者疲劳，不願多看。我們的文章还有枯燥臭澀的毛病，写来干巴巴的，毫無生气，不能引起一般讀者的兴趣。这些缺点如不消除，我們的書面語言就不能發揮在社会主义文化事業中所应起的作用。我們希望我国語文学家們能多多的进行汉語修辞学的科学研究和普及工作，来整頓这一文風。

2）風格問題。由于对規范化的誤解，以为規范化就是公式化，又由于慣于抄襲和其他的原因，我国目前的文風具有相当严重的公式化、一般化的缺点。其实，規范化并不排斥風格上的多样化。規范化是語言規則的問題，不是具体造句的問題，我們可以根据同样的語法規則写出各自不同的語句。語言規則要有規范，个人語言要有个人的特点、个人的風格。語言規則和語言材料（語法和詞彙成員）屬于"語言"的范圍，沒有阶級性；运用語言規則和語言材料来構造的語句是"言語"的問題，有阶級性。我們不要把"語言"和"言語"这兩个概念混同起来，以为"語言"旣沒有阶級性，"言語"也就沒有阶級性。"言語"是某一个人或某些人所組成团体所說出的具体的話，它显然可以表达某一个人或某些人所組成的团体的思想感情，包括他或他們的阶級思想意識。語言虽然是全民的交际工具，它是全社会的所有組成員所共有的，我們的思想感情，由于阶級立場的关系，也可能有共同之处，但运用語言来構造具体言語的个别的人或个别的团体都有其具体的細致的思想感情上的差别和特点。正是这些具体的細致的特点和差别是思想感情的多样化的表現，而在高度發展了的社会里，这种思想感情的多样化也正是文化丰富的一种表現。写文章其实是言語問題，它是每一个个别的人或某些人所組成的团体的思想感情的表达，只有創造性的組織自己的言語，創造性的写出自己的文章，才能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特点，也才能使讀者領会作者所要表达的眞正的思想感情。然而，我們目前却有公式化、一般化的文風，这种文風使人感到沒有多閱讀的必要，因为都是同样的公式，又何必多費时間去讀呢？語言是社会現象，社会环境并不是到处一样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运用同一个語言的人可以为着适应这环境的特殊性，創造出不同的言語風格，例如在辯論的場合中要运用不同于横鋪直叙的風格，在專門的科学論著中要运用富于邏輯严密性的風格。各不同的言語風格的运用正好是和公式化、一般化的文風相反的。我們認为在遵守共同的語言規范的基础上，有必要提倡不同的言語風格的运用，不論是个人的言語風格或适应不同社会环境的各不相同的言語風格，并加以研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公式化、一般化的文風。

3）欧化言語問題。由于翻譯欧洲各国的著作和閱讀这些譯品，我們目前的文風中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欧化言語的問題。我們不同意某些人所說的"欧化語法"这一提法，因为这种問題并不在于"欧化語法"，而在于"欧化言語"。各語言都有各語言的發展的內部規律，而語法又是各語言的特点的本質，不容易吸收外来的成分，尤其是汉語的語法結構和欧洲各語言的語法結構極不相同，更不容易吸收欧洲各語言的語法。虽然近百年来，由于和欧洲各語言的接触，汉語中曾經受了一些欧洲各語言的語法的影响，但这是極其有限

的，就是平常一味模倣欧洲語言的人，也不大可能在語法方面运用欧洲各語言的語法，我們从来沒有看見过人家拿俄語的变格或变位等語法規則运用到汉語上面来。我們的确曾經受到欧洲各語言的影响，但这主要不表現在語法上，而表現在言語結構上，換言之，表現在模倣欧洲各語言的言語表达方式上。我們因为閱讀或翻譯欧洲語言所写的著作，往往在言語表达方式上受到影响，而在自己的写作里运用这种方式去構造自己的言語風格或"文風"。尽管我們提倡作者应当有作者的風格，但这風格还是要运用本族語言的材料来構成的，不是可以随便拿外国語的材料来構成的。因为这种"欧化言語"不是根据汉語的各种言語表达方式的可能性来構造的，而是运用外国語的言語表达方式来構造的，結果就可能引起誤解，也不容易和汉語的語法配合好，造成不中不西的現象，至少也使人看来不像是汉語。当然我們并不是說外国語的言語表达方式都不可以加以运用，但运用起来，要有个限制，要遵守汉語的內部規律，并且要使得汉人看得懂。如何采用外国語的言語表达方式而能符合汉語的內部規律，而能使讀者不至于看不懂，不至于有不像汉語的感覺，这是值得大家詳細研究的問題，我国的語文学家們应当努力設法解决我国文風中的这一問題。

也来一个双反运动吧！

傅东华

解放以来移風易俗的成效是普天下人有目共睹的。就拿文風来講吧，也受到了深澈的影响。至少是，那种叫人費解的所謂象征派詩歌已經銷声匿迹了，那种要使皮膚起鷄皮疙瘩的所謂晚明小品的模仿也再不敢露瞼了。

但是，如果百尺竿头更求进一步，那么似乎还可以来一个双反运动，也不过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意思而已。

文風上的反浪費，首先該反掉"且夫天地即宇宙之乾坤"那样的八股調，因为这样的話簡直是廢話，你要听得多了是会叫你变成瘋子的。这种毛病的病灶在思維，所以对症的藥应該是邏輯。

其次該反掉的是婆婆媽媽式的嘮叨。这大概有兩个来源，其一是由于不能掌握語言的艺术，主要的病象是口齿不清或口吃一类，对症的藥当然是修辞。还有一个来源是公式主义，具体的表現就是各种依样画葫蘆的文章。这就不仅仅是語言艺术的問題，而是应該結合着業务上的公式主义一齐来反的。

浪費的反面就是儉朴，儉朴的表現就是朴素，我們目前的政治运动原是向这个方面走的，当然文風也該向这个方面作相应的發展。但是朴素不等于寒磣，更不等于丑陋，因为"充实之謂美"这一句話似乎至今还是顚扑不破的。充实首先是思想上的事情，并不是篇幅上的事情。思想怎样能充实起来？恕我再借用孟子的一句話："必有事焉而勿正。"这就是說，多多参加实际的斗爭，多多上山下乡去历練历練。要不然的話，即使你笔下生花，終于不过是个空头文学家。

語言上也得求其充实，就是要能掌握丰富的詞彙和多样的語式。但是充实又不等于肥胖，所以务必要讓肌肉多过脂肪，才算不是浪費。在这一点上，讀一点古典作品还是有好处的，特别要向那些曾对江左浮华革命的古文家和曾对宋学空疏革命的汉学家学習学習。同时，还得繼續提高譯文的水平，因为文風上的浪費現象有一部分是由不够好的譯文造成的。

文風上的反保守，首先該反掉故步自封、抱殘守缺的态度。抱着这种态度的人大都是目光如豆，少見多怪，心地狹窄，不容异己，發展起来就要成为宗派主义者或是右派分子。五四时代有人反对白話文，新近还有人反对文字改革，都是这种保守主义在作祟。在文風上，这种主义是不許百花齐放，只許一花独放的，如果听憑它猖獗下去，势必至于使我們社会主义的文化事業寸步难移，所以非首先反掉它不可。

文風的革新也不仅仅是在語言上，主要是在作品所表現的境界上。拿宋人的詞来說，語言上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各人有个独辟的境界，因而各自成一家。社会主义的文化所以跟資本主义的文化不同，正在它能独辟自己的新境界，这非但在內容方面，而且在与內容相联的風格方面。在这样一个創造性的建設过程中，保守主义当然是要不得的。

但是辟新境界不等于造烏托邦，因而文風上的革新也不等于炫奇。我們的总原則仍旧是平易近人的社会主义現实主义。

文風上的保守主义还有一个形式，就是因食古不化而表現为依样画葫蘆。这是一种消化不良症，我們常常看見这种病人吃下花生米，拉出来的还是花生米。吃下去的花生米原是香的，拉出来的花生米却是臭的了。而依样画的葫蘆也不能用来裝藥，所以这种文風上的保守主义也非反掉它不可。

以上的話也許有些是無的放矢，不过对于想要做文章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內，至少可以起一点免疫作用吧。

形名組合間"的"字的語法作用*

范繼淹

一

形名組合指的是形容詞性成分①修飾名詞性成分的組合，这种組合有时候中間帶"的"字，有时候不帶。"形·名"和"形·的·名"这兩种結構究竟有些甚么区别，其中"的"字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問題。一般語法学者对于这个問題的解釋不外以下三个方面：②

1）从習慣上解釋：認为熟語（結合得紧的）就不用"的"字，例如"水紅綢子"；非熟語（結合得松的）就要用"的"字，例如"渺茫的歌声"。

这种解釋虽然嫌抽象一些，但也的确有些道理。"聰明人"通常不帶"的"字，"勇敢的人"却非帶"的"字不可，这种現象除了用"熟語"和"非熟語"来說明以外，很难找到别的解釋。但是这种解釋却無法說明何以"熟語"本身有时候也帶上"的"字，"青山"跟"青的山"并存，"水紅綢子"并不排斥"水紅的綢子"。我們說，"聰明人"是熟語，所以不帶"的"字，那么"聰明的人"算什么呢？"新方法～新的方法"，"幸福生活～幸福的生活"…諸如此类的是熟語呢，还是非熟語？同一个形名組合，有时候帶"的"字，有时候不帶，不能說它有时是熟語，有时是非熟語。同一个熟語，在甚么时候帶"的"字，甚么时候不帶呢？在現代汉語里这样的形名組合極多。

2）从意义上解釋：認为用"的"字和不用"的"字在意义上彼此不同，即"的"字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例如："黑鵝"是某种事物的称謂，"黑的鵝"是强調事物所具有的性狀特征。

这种解釋也不無道理，絕不能說"黑的鵝"是單純的事物称謂。但是从意义上来判断就牽涉到邏輯概念，往往会糾纏不清。"白刀子进去，紅刀子出来"究竟是强調"刀子"的性狀呢，还是指称"白刀子"，"紅刀子"这兩件先后不同的事物呢？恐怕很难說清楚。

3）从音节数目上解釋：認为形名組合中音节数目的某种配搭不用"的"字，例如單音节跟單音节配搭（藍天）；某种配搭多用"的"字，例如双音节跟單音节配搭（蔚藍的天），即"的"字有調剂音节的作用。

这种解釋看来似乎有些道理，但是如果多收集一些材料，就会發現音节的数目并不足以决定"的"字的有無。因为在各种音节数目的配搭关系中都可以找到"形·名"結構和"形·的·名"結構同时并存。例如：

單音节跟單音节配搭：青山～青的山，白紙～白的紙，新鞋～新的鞋，好書～好的書，等等。

單音节跟双音节配搭：黑头髮～黑的头髮，好东西～好的东西，新方法～新的方法，大錯誤～大的錯誤，等等。

單音节跟三音节配搭：新洋鉄壺～新的洋鉄壺，大糖葫蘆～大的糖葫蘆，紅玫瑰花～紅的玫瑰花，短皮大衣～短的皮大衣，等等。

單音节跟四音节配搭：新办公大楼～新的办公大楼，大玻璃書櫃～大的玻璃書櫃，長紅木桌子～長的紅木桌子，小絲棉紧身～小的絲棉紧身，等等。

双音节跟單音节配搭：老实話～老实的話，新鮮肉～新鮮的肉，正經事～正經的事，普通人～普通的人，等等。

双音节跟双音节配搭：新鮮空气～新鮮的空气，紧急任务～紧急的任务，幸福生活～幸福的生活，普通朋友～普通的朋友。

双音节跟三音节配搭：新鮮鵪鶉蛋～新鮮的鵪鶉蛋，普通中国人～普通的中国人，簡單操作法～簡單的操作法，乳白电灯泡～乳白的电灯泡，等等。

双音节跟四音节配搭：普通工作人員～普通的工作人員，广大人民群众～广大的人民群众，詳細經过情形～詳細的經过情形，等等。

不可否認，某几种音节数目配搭起来时帶"的"字

---

* 本文初稿曾于1958年2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的学术报告会上提出討論，承諸位先生、諸位同志提供了許多宝貴的意見，作者根据这些意見，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并在呂叔湘先生的指导下，將全文重新改写，特此致謝。

① 本文所指"形容詞性成分"只包括由形容詞詞素構成的描写性狀的成分，不包括由其他詞类轉化而成的形容詞性成分。

② 詳見呂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王力《中国語法綱要》，張志公《汉語語法常識》，黎錦熙《新著国語文法》，鄖峻章《汉語語法》等書，以及陈瓊瓚《修飾語和名詞之間的"的"字的研究》（《中国語文》1955年10月号），肃父《名詞性詞組中"的"字的作用》（《中国語文》1956年3月号）等文章。为节省篇幅，此处只將各种解釋的主要內容略为提一提，不再分別引用原文。

的結構要多些，某几种音节数目配搭起来时带"的"字的結構要少些，但是我們覚得，除非数量有極大的悬殊(多到足以概括全面，少到可以置之不論)，否則量的多少不大能够說明問題。而且数量的多少恐怕也未必就决定于音节的数目，还牽涉到意义配合的可能性。

以上是对一般說法所提出的一点意見。实在說来，討論形名組合間"的"字的有無，包含着两个問題:

1. "形·名"結構和"形·的·名"結構有沒有区别?有甚么区别?

2. 在甚么情况下出現"形·名"結構，甚么情况下出現"形·的·名"結構?

上述三种說法都是企圖解答第二个問題，即討論"的"字的"該用"或"不該用"，"可用"或"不可用"。但是这个問題目前恐怕还很难找到圓满的答案。

本文只企圖解答第一个問題，不討論第二个問題，即只是平面地比較描写"形·名"結構和"形·的·名"結構在語法上的区别，从而考察"的"字在形名組合間的語法作用。因为我們覚得，即使要討論第二个問題，恐怕也需要在解决了第一个問題之后才有可能。

本文所要加以比較描写的只是形名組合的两种結構形式，因此在整理材料的时候就把凡是带"的"字的一律归为一类，不带"的"字的一律另归一类，不管其中哪些組合本身只有一种結構形式，哪些組合本身就有两种結構形式。在分析比較的时候，"青山"固然可以跟"青的山"比較，也可以跟"新的書"，"老实的話"，"好的东西"，"溫柔的姑娘"…比較，不論彼此的音节数目是否相等，形容詞性成分和名詞性成分是否相同。

二

現在就来比較描写形名組合的两种結構形式。为了簡便和节省篇幅，尽量用符号和公式表达，減少文字叙述。

設: A=形容詞性成分　N=名詞性成分

d="的"字

則: AdN=带"的"字的形名組合，例如:

青的山　好的东西　糊塗的話　幸福的生活

AN=不带"的"字的形名組合，例如:

青山　好东西　糊塗話　幸福生活

AdN 和 AN 在句子里的各种結構关系有許多区别，分述如下:

1. 單項式:

1) AdN 里的 A 可代以 XA，構成 (XA)dN 式 (X=其他成分，这里是: 程度副詞，指代副詞，否定副詞); 也就是說，A 可以受别的成分修飾。例如:

[舍选.17]感情到了最热的时候是会最冷的。

[丁选.60]这本是很平常的事，沒有甚么稀奇。

[周.报.18]我們反对修正主义就有更重要的意义。

[独选.50]你看看我們这样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沒有?

[舍.駱.13]这么大的人，拉上那么美的車…

[独选.192]我呀，我怎有这么苦的命呵!

[舍选.275]多么好的主人也还是主人，不能肩膀齐为弟兄。

[周.报.44]难道除了共产党以外，还有别的党派能够領导中国人民实現这样偉大的理想嗎?

AN 里的 A 不能代以 XA，不能構成 (XA)N式; 也就是說 A 不受其他成分的修飾。例如沒有"很平常事"，"这样偉大理想"之类的說法。①

2) AdN 里的 N 可代以 XN，構成 Ad (XN)式 (X=其他成分，这里是: 数量詞，指示代詞); 也就是說，N 可以受别的成分限制。例如:

旁的都記得，就是把要紧的一句話給忘了。

請你把紅的那件毛衣遞給我。

AN 里的 N 不能代以 XN，不能構成 A(XN)式; 也就是說，N 不受其他成分的限制。例如沒有"要紧一句話"，"紅那件毛衣"之类的說法。

3) AdN 里的 A 可代以 A^2，構成 A^2dN 式; 也就是說，A 可以重叠。例如:

藍藍的天　大大的晴眼　老老实实的話

高高兴兴的样子

AN 里的 A 不能代以 A^2，不能構成 A^2N 式; 也就是說，A 不能重叠。例如沒有"大大眼睛"，"老老实实話"之类的說法。②

4) 在一定的語言环境下，AdN 整个的結構可代以 Ad，也就是說 N 可以省去。例如:

大的臉盆三塊錢，小的兩塊。

旧的烟囱不要，要新的。

AN 的整个結構不能代以 A，也就是說 N 不能省去。例如沒有"大的臉盆三塊錢，小兩塊"之类的說法。

5) AN 可代入 A'N' 或 A'dN' 里的 N'，構成 A'(AN)或 A'd(AN)式: 也就是說，AN 可以再受别的形容詞性成分修飾。例如:

A'(AN)式: 大灰狼　大黑馬　小花猫　特别快車

A'd(AN)式: 眞的香花　眞的毒草　孤苦伶仃的老小姐

AdN 不能代入 A'N' 或 A'dN' 里的 N'，不能構成 A'(AdN)或 A'd(AdN)式; 也就是說，AdN 不能再受

① "最高領导"，"最高紀录"，"最大限度"，"最新出品"，"最高級"，"最下層"这类結構形式比較特殊，但只限于跟"最"字結合。其中前三例是固定詞組，因为只有"最高領导"等，沒有"高領导"等。

② "好好先生"是固定詞組，意义不同于"好先生"; 另外有个别專門名称例外，如"小小画家"，"小小食堂"。

别的形容詞性成分修飾。例如沒有"大黑的馬","小的紅的花"之类的說法。

6) AN 可代入 A'N' 里的 A' 或 A"(A'N') 里的 A",構成(AN)N' 或(AN)(A'N')式;也就是說,AN可以修飾別的名詞性成分或別的"形·名"結構。例如:

(AN)N'式: 藍布制服 圓臉胖子 大眼睛姑娘 聪明人想法

(AN)(A'N')式: 圓臉大胖子 灰布短大衣 長毛小狗 黑漆旧衣櫃

AdN 不能代入 A'N' 里的 A' 或 A"(A'N') 里的 A",不能構成(AdN)N' 或(AdN) (A'N')式; 也就是說,AdN 不能再修飾別的名詞性成分或別的"形·名"結構。例如沒有"圓的臉胖子","黑的漆旧衣櫃"之类的說法。

II. **多項式**:

(1) A 單項,N 多項:

AdN 有兩种結構形式:

1) 分析式: $AdN_1+AdN_2\cdots+AdN_n$ 例如:

[周.报.33]而旧的不平衡和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現新的不平衡和新的矛盾。(n=2)

[人社.1957.7.23]这就是說,工人阶级必須用新的人、新的組織、新的方法来代替旧的国家机器。(n=3)

2) 綜合式: $Ad(N_1+N_2\cdots+N_n)$ 例如:

[周.报.1]我們取得了許多宝貴的經驗和教訓。(n=2)

[舍.駱.30]綠的田、树、野草都由暗綠变为發光的翡翠。(n=3)

[八大决議.6]为了發揚农民的生产积極性,除了国家必須实行正确的税收政策、粮食政策和物价政策以外,…(n=3)

AN 只有一种結構形式,即分析式: $AN_1+AN_2\cdots+AN_n$ 例如:

[相选.32]那天是我們新办公大楼和新宿舍落成典禮,…(n=2)

[人社.1957.4.13]在人民內部,在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間,在抱着正确意見正确态度的人們和錯誤意見錯誤态度的人們之間…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n=2)

沒有綜合式,例如沒有"正确意見和态度"之类的說法,而"新办公大楼和宿舍"这类結構之中"宿舍"并不是"新"的。

(2) A多項,N單項:

AdN 有三种結構形式:

1) 分析式: $A_1dN+A_2dN\cdots+A_ndN$ 例如:

[毛.內.26]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錯誤的东西,常常需要考驗的时間。(n=2)

2) 半綜合式: $(A_1d+A_2d\cdots+A_nd)N$ 例如:

[人社.1957.7.18.]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爭是一場艰苦的、复杂的斗爭。(n=2)

[毛.內.27]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較的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n=3)

3) 綜合式: $(A_1+A_2\cdots+A_n)dN$ 例如:

[散选.81]栽种下了蛋黃和墨紫的地瓜花…(n=2)

[散选.87]只有讓这兒長滿芳香、艷丽的花果才能和今天的新生活相称。(n=2)

[丁选.18]是的,那都是些極真誠,極平常,極正当的話。(n=3)

AN只有一种結構形式,即分析式: $A_1N+A_2N\cdots+A_nN$ 例如:

[刘.报.62]在我們党內有正确思想和錯誤思想、正确路綫和錯誤路綫的斗爭…。(n=2)

沒有綜合式,例如沒有"艰苦复杂斗爭","正确和錯誤思想"之类的說法。①

(3) A 多項,N 多項:

AdN 有兩种結構形式:

1) 半綜合式: $(A_1d+A_2d\cdots+A_nd)(N_1+N_2\cdots+N_{n'})$例如:

勤劳的、朴素的工人和农民。(n=2,n'=2)

光荣的、强大的、英勇的苏联紅軍和中国人民解放軍。(n=3,n'=2)

2) 綜合式: $(A_1+A_2\cdots+A_n)d(N_1+N_2\cdots+N_{n'})$例如:

勤劳、朴素的工人和农民。(n=2,n'=2)

光荣、强大、英勇的苏联紅軍和中国人民解放軍。(n=3,n'=2)

AN 沒有以上的結構形式,例如沒有"勤劳朴素工人和农民"之类的說法。

現在把上述各項列成如次頁的簡表。

这样,我們就可以看出 AdN 和 AN 在語法上的区別是:

1. AdN 里的 A 可以受程度副詞、指代副詞、否定副詞的修飾,AN 里的 A 不能受这类副詞的修飾。

---

① 有"大專学校"、"大中小商店"这样的說法,但是这并不是由"分析式"紧縮而成的"綜合式",因为"專学校"、"中商店"都不能單独說。这是一种模仿文言語法的特殊結構形式(例如:"东西汉"、"南北朝"、"古今字画"、"中西圖書"之类),因此多半出現在書面語言里。

"新老工人"也不能認为是由"新工人+老工人"紧縮而成的,仍然是書面語言里模仿文言的特殊結構,因为在口語里常用的語汇如"大狗、小狗","新書,旧書","好东西、坏东西"…都不能紧縮成"大小狗"、"新旧書"、"好坏东西",等等。

	AdN的結構形式	AN的結構形式
單項式	1. (XA)dN	——
	2. Ad(YN)	——
	3. A^2dN	——
	4. AdN—Ad	——
	5. ——	A′(AN), A′d(AN)
	6. ——	(AN)N′, (AN)(A′N′)
多項式	7. $Ad(N_1+N_2\cdots\cdots+N_n)$	——
	8. $(A_1d+A_2d\cdots\cdots+A_nd)N$	——
	$(A_1+A_2\cdots\cdots A_n)dN$	——
	9. $(A_1d+A_2d\cdots\cdots+A_nd)(N_1+N_2\cdots\cdots+N_{n'})$	——
	$(A_1+A_2\cdots\cdots\cdots+A_n)d(N_1+N_2\cdots\cdots+N_{n'})$	——

注：AdN和AN的多項分析式彼此相同，故未列入。

2. AdN 里的 N 可以受其他成分（数量詞、指示代詞）的限制，AN 里的 N 不能受其他成分的限制。

3. AdN 里的 A 可以重叠，AN 里的 N 不能重叠。

4. AdN 里的 N 可以省去，AN里的 N 不能省去。

5. AdN 不受别的 A 或 Ad 修飾，也不能修飾别的 N 或 AN；AN 可以受别的 A 或 Ad 修飾，也可以修飾别的 N 或 AN。

6. AdN 的多項式能够加以綜合（既有"分析式"又有"綜合式"），AN 的多項式不能加以綜合（只有"分析式"沒有"綜合式"）。

由此可知：AN 在句子里永远連在一起，構成一个整体，彼此不能分离。AN 里的 A 和 N 不是兩个独立的句法單位，①不能在句子里分别活动，只能共同構成一个句法單位，这个句法單位具有跟單一的名詞性成分相同的語法特点：不受程度副詞、指代副詞、否定副詞的修飾，可以受别的形容詞性成分修飾，可以修飾别的名詞性成分或"形·名"結構。

AdN 在句子里不是一个整体，不一定永远連在一起，可以彼此分离。AdN 里的 Ad 和 N 是兩个独立的句法單位。②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

形容詞性成分修飾名詞性成分依靠兩种不同的語法手段，达到兩种不同的語法效果。

1. 用詞序作为語法手段（即不帶"的"字）：形容詞性成分和名詞性成分結成一个紧密的"形·名"組合，構成一个整一的句法單位。其中的形容詞性成分在句法关系上不再發生作用，造句时只需考慮整个組合所具备的名詞性特点，不需要考慮形容詞性成分本身有甚么特点。因此，从句法学的观点看来，"形·名"組合中的形容詞性成分不是研究的对象，句法学所研究的是整个的組合，并且把它作为單一的名詞性成分看待。

2. 用"的"字作为語法手段（即帶"的"字）：形容詞性成分借助于"的"字而成为一个独立的、足以影响結構关系的句法單位。"形·的·名"組合在句法关系上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兩个不同的句法單位，造句时必需考慮組合之中的形容詞性成分有些甚么語法特点。因此，"形·的·名"組合中的形容詞性成分是句法学研究的对象。

三

最后附帶談一談形容詞性成分修飾动詞性成分以及名詞性成分修飾名詞性成分的情形。

形容詞性成分修飾动詞性成分的情形要复杂得多，需要作專題研究。但是有一点可以指出：帶"的"（地）字的形容詞性成分修飾动詞性成分时，多項式也可加以綜合，結構形式跟修飾名詞性成分时的多項式完全相同。玆列举如下：設 V＝动詞性成分

(1) A 單項，V 多項：

1）分析式：$AdV_1+AdV_2\cdots+AdV_n$ 例如：

[刘.报.63] 因此，为了避免犯錯誤，必須正确地認識客观实际，正确地明辨是非。(n＝2)

2）綜合式：$Ad(V_1+V_2\cdots+V_n)$ 例如：

① "句法單位"指的是造句时用的、在句子里独立活动的單位。

② 从語音上来看，情形也相同：AN 中間沒有語音停頓，例如"一匹｜白馬"；AdN 中間有或者可以有語音停頓，例如"一匹｜白的｜馬"；这种語音停頓在多項綜合式或半綜合式中尤其明显，例如："宝貴的｜經驗和教訓"，"艰苦的｜复杂的｜斗爭"，"芳香｜艳丽的｜花果"等等。就是說，AN 在語法上彼此不能分离，在語音上也不能分离；AdN 在語法上可以分离，在語音上也可以分离。

[人社. 1957.7.23.] 对于这种意見应当認眞地傾听、研究和采納。(n=3)

(2)A 多項,V 單項:

1) 分析式: $A_1dV+A_2dV\cdots+A_ndV$ 例如:

同志們对你提了很多意見,你应該認眞地考慮,仔細地考慮。(n=2)

2) 半綜合式: $(A_1d+A_2d\cdots+A_nd)V$ 例如:

[舍.駱.199]她坐在炕头上,呆呆的,渺茫的,追想婚后的快乐。(n=2)

3) 綜合式: $(A_1+A_2\cdots+A_n)dV$ 例如:

坚决、徹底、干淨地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n=3)

(3)A 多項,V 多項:

1) 半綜合式: $(A_1d+A_2d\cdots+A_nd)(V_1+V_2\cdots+V_{n'})$例如:

[刘.报.11] 可以比較自然地、比較順利地脫离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資料的私人所有制,接受集体所有制。(n=2,n′=2)

2) 綜合式: $(A_1+A_2\cdots+A_n)d(V_1+V_2\cdots+V_{n'})$ 例如:

可以比較自然、比較順利地脫离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資料的私人所有制,接受集体所有制……(n=2, n′=2)

帶"的"字的名詞性成分修飾名詞性成分时,多項式的結構形式也相同,也可加以綜合。例如"木头的桌子和木头的椅子","苏联的青年和中国的青年",可以說成"木头的桌子和椅子","苏联(的)和中国的青年",但是不能說成"木头桌子和椅子"("椅子"就不一定是"木头"的),苏联和中国青年"(变成"苏联"这个国家和"中国青年"),諸如此类。

这就是說,凡是帶"的"字的多項式修飾語和被修飾語都能够加以綜合,而不帶"的"字的修飾語和被修飾語則不能加以綜合。

由此可以看出"的"字一个重要的語法特点:"的"字能够賦予多項式修飾語和被修飾語以一种"可綜合性",換句話說,"的"字具有承前(修飾語多項)和領后(被修飾語多項)的作用。这个特点在現代汉語里已經有了相当广泛的發展,是值得指出的一种語法現象。

材料来源

書名	版本	簡写
《丁西林剧作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丁选.頁]
《老舍短篇小說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舍选.頁]
《相声选集》	作家出版社本	[相选.頁]
《独幕剧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独选.頁]
《散文小品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散选.頁]
老舍《駱駝祥子》	人間書屋本	[舍.駱.頁]
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問題》	人民出版社單行本	[毛.內.頁]
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	人民出版社單行本	[周.报.頁]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人民出版社單行本	[刘.报.頁]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議》	人民出版社單行本	[八大决議.頁]
《人民日报社論》		[人社.年.月.日]
《魯迅短篇小說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未引用
《曹禺剧作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未引用
吳組光《風雪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未引用

华南师范学院师生热烈学习拼音方案和普通話

汉語拼音方案公布后,华南师范学院师生即热烈討論和学習。中文系汉語教研組举行了汉語拼音方案座談会,参加座談的有汉語教研組全体教师和广州师范專科学校中文科汉語教研組的教师。

全院各系学生热烈要求学習拼音方案,学習普通話。他們出了很多大字报,要求組織起来,进行学習。剛从中学实習回来的畢業班同学,在实習試教中深切体会到講不好普通話就教不好課,因此迫切需要学習。寒假里,学院开办了語音学習班,报名参加的有数百人,分为十几个小班学習,教員由中文系教师担任,教材采用徐世荣的《汉語拼音字母教学广播講座》,每天上課二小时,十天講完。本学期,又在全院各系畢業班开設《語音基础知識》課,講授有关汉語拼音方案和普通話标准音的基础知識。每周上課二小时,八周講完,并进行考查。全院四年級学生除提前畢業者外全部参加《語音基础知識》課学習,因此在学生中形成了一个学習拼音方案和普通話的高潮。教师中也展开学習,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全体教师还把学習汉語拼音方案列入躍进計划里,保証短期內学会拼音字母,学好普通話。

学院准备举办語音广播講座,利用課余时間在教学大楼播送拼音方案教学留声片和普通話会話留声片,帮助广大师生学習拼音方案和普通話。此外,还准备在周末电影晚会前放映普通話幻灯片。(梁猷剛)

潮州話的一些語法特点

詹伯慧

潮州話是閩南方言的一支，它流行在广东省韓江流域的潮安、澄海、饒平、潮陽、揭陽、惠来、普宁、南澳、海丰、陆丰等县和潮州、汕头两市。此外，客家方言区的丰顺、大埔兩县也有部分地区説潮州話的。

潮州話在語音、詞彙兩方面都与普通話有較大的距离。在語法方面，虽然大致跟普通話相同，仍有一些大同中的小异。本文就作者的初步观察，介紹潮州話一些比較显著的語法特点，供研究方言的同志参考。

一 詞法上的一些特点

1) 人称代詞的“数”和“格”

a) 数: 潮州話人称代詞中單数与复数的区分不是采取在單数語詞后面加詞尾的方式（例如普通話單数变复数加詞尾“們”，粤方言單数变复数加詞尾“哋”)，而是通过不同的語詞来表示。例如:（有些汉字仅是借用，跟字义無关，下同。）

單数	复数
我 [ua˦˨]	俺(咱們) [naŋ˦˨] (包括式) 阮(我們) [uŋ˦˨] (排除式)
你 [lɯ˦˨]	恁(你們) [niŋ˦˨]
伊 [i˧]	因(他們) [iŋ˧]

尽管潮州話的人称代詞單、复数是兩个不同的詞，但是在語音上我們仍然可以看出單数形式与复数形式的一定关系来: 第一，复数形式都是 -ŋ尾; 第二，單、复数声調完全相同; 第三，單、复数兩者的主要元音大致相同。我們知道，在厦門話中，人称代詞單数变复数是通过單数加 -n 尾的形态变化来完成的 [gua˦˨ (我) ——→gun˦˨ (我們)，li˦˨ (你)——→lin (你們)，i˥ (伊) ——→in˥ (伊們)]，潮州話虽然不像厦門話那样用整齐的形态变化来表示，但是，从單数与复数之間的語音关系看来，基本上还是能够体現出閩南方言人称代詞單、复数变化的这一特点来。

潮州話的人称代詞第一身复数有“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分别，这一点跟北京話、厦門話等相同。

b) 格: 潮州話的人称代詞有“領有格”。表达的方式一般是在領有者的后面加一个詞尾“个” [kai˩]，这个“个”相当于普通話的“的”，粤方言的“嘅” [kɛ˧]，厦話的 [ɛ˨˦]。例如:

我个書 [ua˦˨ kai˩ tsɿ˧] (我的書)

恁个厝 [niŋ˦˨ kai˩ ts'u˨˩] (你們的房子)

如果領有格的后面是一个表亲屬称呼的名詞如“阿爸”(父亲)“阿兄”(哥哥)，等等，則前面的領有格代詞不但不加詞尾“个”，而且还要产生連讀音变的現象，結果連后面名詞的詞头“阿”也合幷到前面的音节中去。例如:

阮阿爸(我們的父亲):

uŋ˦˨(kai˩) a˧˧˨ pa˧——→u:a˦˨˨ pa˧

因阿兄(他們的哥哥):

iŋ˧ (kai˩) a˧˧˨ hĩã˧——→i:a˧˨ hĩã˧

2) 指示詞的近指和远指

潮州話的指示詞跟普通話一样有近指和远指兩套。普通話近指用“这”，远指用“那”，在語音上沒有什么关連; 潮州話近指用“ts-”，远指用“h-”，兩者在語音上却有整齐的对应，韵母、声調完全相同，只是声母不同而已。下面是潮州話中常用的几对指示詞:

近指 [ts-]

者 (这些) [tsia˦˨]

者个 (这些) [tsia˦˨ kai˩]

只个 (这个) [tsi˦˨ kai˩]

只塊 (这兒) [tsi˦˨˨ ko˨˩]

只主 (这位) [tsi˦˨˨ tsu˦˨˦]

只存 (这会兒) [tsi˦˨˨ tsuŋ˥]

照□ (这边) [tsĩẽ˨˩˦ põĩ˥]

远指 [h-]

□ (那些) [hia˦˨]

□个 (那些) [hia˦˨ kai˩]

許个 (那个) [hɯ˦˨ kai˩]

許塊 (那兒) [hɯ˦˨˨ ko˨˩]

許主 (那位) [hɯ˦˨˨ tsu˦˨˦]

許存 (那会兒) [hɯ˦˨˨ tsuŋ˥]

□□ (那边) [hĩẽ˨˩˦ põĩ˥]

3) 名詞詞尾“仔”和“孥”

潮州話有兩个表示指小的詞尾，一个是“仔” [kĩã˦˨]，一个是“孥” [niuʔ˥]。

“仔”大致相当于普通話中帶有指小的名詞詞尾“子”“兒”。例如:

潮州話	普通話
奴仔 [nou˧˨ kĩã˦˨]	孩子
帽仔 [bo˩˨ kĩã˦˨]	小帽子
兎仔 [tou˨˦ kĩã˦˦]	兎子

歌仔 [kũã˧⊬ kĩã˦˨]　　歌兒
盒仔 [ap˥⊦ kĩã˦˨]　　盒兒
貓仔 [ŋiəu˧⊬ kĩã˦˨]　　貓兒

普通話中不帶小义的“子”“兒”翻为潮州話时就不能加上“仔”。例如“日子”不能說成“日仔”,“事兒”不能說成“事仔”。

潮州話的“仔”有时用在指人的名詞后面,帶有輕蔑的意思。例如:

美国仔 [mui˦˨⊬ kɔk˩⊦ kĩã˦˨]
敗家仔 [pai˩⊬ ke˧⊬ kĩã˦˨]
短命仔 [to˨⊬ mia˩⊬ kĩã˦˨]

“孧”是潮州話中表示極小义的一个詞尾,它不能直接加在名詞詞根的后面,而必須加在名詞詞尾“仔”的后面。因此,沒有帶“仔”詞尾的名詞就不能有“孧”尾了。例如“椅仔孧”是“很小的椅子”的意思;“奴仔孧”是“很小的孩子”的意思。

这个“孧”詞尾在浙江南部的閩南話中也有,同样必須是放在“子”的后面。但是在厦門話中我們却沒有發現这一詞尾。

4) 表性別的后綴成分

潮州話中表示动物的性別一般是在动物名詞的后面加一个后綴成分,不像普通話那样在动物名詞的前面加性別限制語(如“公鷄”“母鷄”)。就構詞的方式来說,潮州話在这一点上是跟粤方言、客家方言以及閩南方言相似的。不过潮州話中表示性別的后綴成分比起这些方言来,更加丰富多采,这一点是值得提一提的。例如:

a) 表陽性的后綴成分:

“翁”[aŋ˧]:　鷄翁 [koi˧⊬ aŋ˧]
“牯”[kou˦˨]: 牛牯 [gu˥⊬kou˦˨],
　　狗牯 [kau˦˨⊬ kou˦˨⊦],
　　貓牯 [ŋiəu˧⊬kou˦˨],
　　馬牯 [be˦˨⊬ kou˦˨⊦]
“公”[kaŋ˧]: 鴨公 [aʔ˨⊦ kaŋ˧],
　　蛇公 [tsua˥⊬ kaŋ˧]
“哥”[ko˧]: 豬哥 [tɯ˧⊬ ko˧]
“庚”[kẽ˧]: 羊庚 [ĩẽ˥⊬ kẽ˧]
“角”[kak˩]: 鳥角 [tsiəu˦˨⊬ kak˩]
“雄”[heŋ˥]: 鵝雄 [go˥⊬ heŋ˥]

b) 表陰性的后綴成分:

“母”[bo˦˨]: 豬母 [tɯ˧⊬ bo˦˨]、
　　鷄母 [koi˧⊬ bo˦˨]
　　狗母 [kau˦˨⊬ bo˦˨]、
　　羊母 [ĩẽ˥⊬ bo˦˨]
“娜”[nua˨˦]: 雞娜 [koi˧⊬ nua˨˦](沒有下过蛋的母雞)

“娘”[nie˥]: 貓娘 [ŋiəu˧⊬ nie˥]

从以上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表陽性的后綴成分要比表陰性的多。例如“雞”的陽性加“翁”,豬的陽性加“哥”,狗的陽性加“牯”,但是,陰性的“雞”、“豬”、狗”却無区別的一律加“母”。

至于人的性別,潮州話是不用根詞加性別附加語的方式来表示的。潮州話管一般“男人”叫“禾埔”[ta˧⊬ pou˧],管一般“女人”叫“姿娘”[tsɿ˧⊬ nie˥]或“姥埔”[tsa˧⊬ pou˦˨]。年紀輕的男性叫“禾埔仔”[ta˧⊬ pou˧⊬ kĩã˦˨](相当于普通話的“小伙子”);女性叫“姿娘仔”[tsɿ˧⊬ nie˥⊬ kĩã˦˨]或“姥埔仔”[tsa˧⊬ pou˦˨⊬ kĩã˦˨⊦](相当于普通話的“大姑娘”)。

5) 形容詞中的“弱化形态”

潮州話的形容詞,往往可以加一个特別的后綴成分,用以表示形容詞所表示的性狀的“弱化”。这种后綴成分純粹是一种語法上的形态标志,不能离开形容詞而独立。我們姑且称它为“弱化形态”。例如:

a) 表示顏色弱化的 hũãĩʔ˥:

紅 [aŋ˥]: aŋ˥⊬ hũãĩʔ˥⊦ aŋ˥⊬ hũãĩʔ˥
　　(不太紅)
烏 [ou˧]: ou˧⊬ hũãĩʔ˥⊦ ou˧⊬ hũãĩʔ˧
　　(不太黑)

b) 表示气味弱化的 ts'iʔ˥、niʔ˥:

甜 [tiəm˥]: tiəm˥⊬ ts'iʔ˥⊦ t'iəm˥⊬
　　ts'iʔ˥ (不太甜)
鹹 [kiəm˥]: kiəm˥⊬ ts'iʔ˥ ˨kiəm˥⊬
　　ts'iʔ˥ (不太鹹)
酸 [sɯŋ˧]: sɯŋ˧⊬ niʔ˥⊦ sɯŋ˧⊬ niʔ˥
　　(不太酸)
苦 [k'ou˦˨]: k'ou˦˨⊬ niʔ˥⊦ k'ou˦˨⊬ niʔ˥
　　(不太苦)

形容詞帶上这一类表示弱化的后綴成分后必須重叠,不能够單用,这是值得注意的。例如不能單說“紅 hũãĩʔ˥”,“甜 ts'iʔ˥”,或“酸 niʔ˥”。

二 句法上的一些特点

1) 量詞可以直接修飾名詞

在普通話中,量詞一般总是要跟数詞或指示詞結合在一起,然后才能作为名詞的定語的。在潮州話中,量詞却可以單独修飾名詞,作为名詞的定語。例如:

塊布雅絕 [ko˨⊬ pou˨ ŋia˧⊬ tsoʔ˥]
(这)塊布很漂亮。
你掠个銀分伊 [lɯ˦ k'ieʔ˥⊦ kai˥⊬ ŋɯŋ˥ puŋ˧⊬ i˧]
你拿(一)塊錢給他。

潮州話的量詞單独修飾名詞时,实际上是隐含有

数詞"一"或指示詞"这""那"的意义在里面的。这种情形跟粤方言有相似之处（例如广州話中也有"只豬好肥"一类的說法），因此也接近于，比方說，英語的定冠詞 the。

2）指示詞不能直接修飾名詞

普通話数詞或量詞一般都不單独修飾名詞，但是，指示詞"这""那"却常常直接加在名詞的前面，作为名詞的定語（例如"这人""那書"）。在潮州話中，如上面所述，量詞可以直接修飾名詞；可是，指示詞却反而不能够直接修飾名詞，在潮州話的指示詞与名詞之間，一般总是夾着一个量詞的。例如：

只說"这个人"[tsi˨˦ kai˥˨ naŋ˥]，不說"这人"。只說"許(那)本書"[hɯ˦˦ puŋ˦˦ tsɿ˧]，不說"許(那)書"。

3）特别的后置狀語

潮州話中表示性狀的强烈程度时，常常在形容詞的后面加一些特别的狀語，这类狀語都是一些"不吉利"的詞語，例如"死"、"絕"、"爱死"、"哭父"等等。这些后置狀語如果是單音节的，可以直接加在形容詞的后面；如果是多音节的，就必須在形容詞与狀語之間加一个"到"[kau˨˩]。例如：

只出戏好睇絕 [tsi˦˦ ts'uk˨˦ hi˨˩ ho˦˦ t'õĩ˦˦ tso?˥]这出戏很好看。

伊行路猛死 [i˧˦ kĩã˥˨ lou˩ me˦˨ si˦˥]

他走路很快。

今日寒到哭父 [kim˧˦ zik˥ kũã˥˨ kau˨˥ k'au˨˧ pe˩]

今天冷得要命。

因二人好到爱死 [iŋ˧˦ no˥˥ naŋ˥ ho˦˦ kau˨˥ ãĩ˨˥ si˦˥]

他們倆非常要好。

4）动詞"有"帶动宾結構

普通話的动詞"有"后面总是帶着一个名詞性的宾語（例如"我有書"）。潮州話动詞"有"的后面除了帶名詞性宾語以外，还有一种特别的用法，就是帶一个动宾結構在后面。这是比較特别的。例如：

我有睇戏 [ua˦ u˥˥ t'õĩ˦˥ hi˨˩]

我看了戏。

你有食飯阿无？[lɯ˦ u˧˥ tsia?˥˥ puŋ˩ a˧ bo˥]你食了飯沒有？

伊有去学堂 [i˧˦ u˥˥ k'ɯ˨˥ o?˥˥ tɯŋ˥]

他去了学校。

潮州話中这类句式，翻譯为普通話时，大致都得在动詞后面加"了"来表示，因此，这里的"有"实际上多少含有"完成体"的意义在里面。

5）"处置句"的表現方式

潮州話中表示"处置"的方式跟普通話不大相同。普通話的"处置式"用"把"字把宾語提到动詞前面（如"我把碗打破了"），潮州話却有兩种不同的"处置式"：

a）在动詞的前面加一个"甲伊"[ka?˨i˧]（給他），把"处置"的对象移到句子的最前面。例如：

撮飯甲伊食了 [ts'o?˨˦ puŋ˩ ka?˨ i˧ tsia?˥˥ liəu˦] 把这些飯吃光。

本書甲伊收起 [puŋ˦˦ tsɿ˧ ka?˨ i˧ siu˧ k'i˨] 把这本書收起来。

这一类处置式处帶有祈使、命令的語气，因此，主語常是隐去不提。

b）用"將"[tsiaŋ˧]或"对"[tui˨˩]把宾語提到动詞的前面，这个"將"或"对"的地位和普通話中的"把"完全相当。例如：

伊將我个碗扣破嘍 [i˧tsiaŋ˧˦ ua˦˦ kai˨ ũã˦ k'a˨˥ p'ua˨ lou˨]

他把我的碗打破了。

你对伊支笔物害去 [lɯ˦tui˨˥ i˧˦ ki˧˦ pik˨ mue?˥˥ hai˩ k'ɯ˨]

你把他的笔弄坏了。

有时候，"將"或"对"和"甲伊"并用在一个句子里，作用仍跟一般处置式一样。例如：

伊將个碗甲伊扣破嘍——他把一个碗打破了

6）疑問句的表現方式

潮州話中沒有表示疑問的語气詞（如普通話中的"嗎"）。因此，在表示疑問的方式上跟普通話有些不同。常用的是以下兩种句式：

a）在动詞的前面加一个"豈"[k'a˦]。例如：

伊豈知你来北京？[i˧ k'a˦˨ tsai˧ lɯ˦ lai˥˨ pak˨˦ kĩã˧]

他知道你来北京嗎？

你豈有时間甲我呸？[lɯ˦ k'a˦˦ u˥˥ si˥˨ kaŋ˧ ka?˩ ua˦˦ p'ue?˥]

你有时間跟我談嗎？

b）在句末加上否定的語詞（如加"唔"）。例如：

你爱去广州阿唔 [lɯ˦ ãĩ˨˥ k'ɯ˥ kɯŋ˦˦ tsiɯ˧ a˧ m̩˥]

你上广州去嗎？

你有阿兄阿无 [lɯ˦ u˥˥a˧˦ hĩã˧ a˧ bɔ˥]

你有哥哥嗎？

上面这兩个例子中，"阿唔"等于普通話"还是不"，"阿无"等于普通話"还是沒有"。任何一种屬于"是非問"的句子，都可以用在句末加上一个"阿＋否定詞"的方式来表示，例如"戏好睇阿孬"（戏好看嗎？"孬"是"不好""的合音），"你会咀俄文阿𠊎"？（你会說俄語嗎？"𠊎"是"不会"的合音）等等。

潮州方言的数量詞

李新魁

(一) **基数** 潮州話的基数,也是用一、二、三、四、五、十、百、千、万等,但在一般老人家(多半是女人)口中,某些基数都常用禁忌語来代替。如“七”不称“七”而叫“一礼拜”,这是因为在有丧事的人家,每隔七天要做一次丧事(举行祭奠),这叫做“做七”。另外,“九”也不称“九”而叫“快”,如把“初九”叫做“初快”。这大概是因为在潮州話中,“九”与“狗”同音,犯罵人的嫌疑,所以說“快”,“快”是取其“快到十”的意思。

(二) **序数** 潮州話的序数是在基数前加“第”而成的,但加“第”之后,“一”、“二”的唸法不同了。基数“一”是[tsek˥],“二”是[no˧˥],序数“一”是[ik˩],“二”是[dzi˧˥]或[dzi˩],初学潮州話的往往会唸錯。

序数也常用“头”字表示第一,用“尾”表示最后。例如头年、头名、头下(次);尾年、尾名、尾下,等等。或用“細”表示最后,“細”相当于“小”。例如細仔(小兒子)、細叔(小叔叔)。有时“第二个”也可說“二一个”[dzi˩ tsek˥kai˥],量詞前的“一”字不能省去。

(三) **一般称数** 潮州話几个十进等級位数連用时,只說出第一个就够了,以后的都可省略。例如“一万三千九百”和“一百一十”可說成“万三九”和“百一”。

普通話中,等級位数之間如有空位,就要用“零”連接在中間。潮州話不用“零”,而在前一位数后面加上一个“了加”[liou˥˧ke˧]的連接詞,它的意思是某数之后再加另一个数,如說“百了加三”,就是103。

普通話整数所帶的零数常常用“几”或“多”表示,如說“十几个”、“百多人”等。潮州話用“外”[gua˩],如“十外个”,“百外人”等。要說得更明确些,則零数約在五之下,一般用“敲”[k'iou˧],表示比整数稍多:如果多出很多,就再重复“外”。例如:“百敲个”就是出百不远;“百外外个”就是出百很远而近于二百了。

潮州話表示大概的数量(約数)用“个般母”[kai˩ pan˧bo˥˧]或“压宝量”[iak˥po˥˧liaŋ˧˥],这相当于普通話的“上下”或“左右”,“个般母”加在数詞之后,“压宝量”加在数詞之前:

伊五十岁个般母(他五十岁上下)。
許塊压宝量百人(那里一百人左右)。

(四) **人物称数** 普通話中用途最广的量詞是“个”,但这个“个”在潮州話里面的用途还要广泛。一些动物在普通話中是用“隻”来称的,潮州話也可用“个”,如“一个蝴蝶”、“一个蜻蜓”等。其他物品也多可用“个”来称,如“一个鏡”、“一个衫”、“一个新妇”等。

普通話的“隻”多用在动物和成对东西的單称上,如牛、羊、手、鞋等。潮州話除了这些地方都可用“隻”外,凡是那些有“脚”的东西都可用“隻”,如对桌子、椅子(普通話多用“張”)等的計量称呼。普通話中,凡是器物可以用手把握的,多称“把”,如刀子、扇子、傘、鍾子等。潮州話不用“把”而用“支”,如說“一支刀”、“一支雨遮(傘)”、“一支鍾”等。有一平面的物体,普通話多用“張”或“面”,如“一張桌子”、“一面旗子”,潮州話也用“隻”或“支”。

凡成条狀的东西,潮州話也用“支”或“条”,如“一支棍”、“一条索(繩子)”、“一支竹”、“一支火柴”、“一条毛”等等,这些普通話都用“根”。普通話还用“条”来称狹長形的东西,但普通話用“条”的,潮州話又不完全用“条”,如褲、魚、黃瓜等就不称“条”而称“一个褲”、“一尾魚”、“一个黃瓜”了。潮州話用“欉”[tsaŋ˥]称树,“个”称花,普通話則用“棵”、“朵”等。

普通話称房屋建筑物用“間”、“所”和“座”。潮州話則用“間”和“落”,“落”和“座”相当,但“座”还可用以指山、塔、城市等,“落”則不能。潮州話指称这些东西都用“个”。

普通話称車輛用“輛”,驢馬用“匹”;潮州話称車輛用“隻”或“張”,称牲畜俱用“隻”。人称的集体單位普通話用“群、班、伙”等;潮州話則用“群”和“撮”,如“一群老人”、“一撮奴仔(小孩)”。

普通話用“包”、“卷”、“串”、“捆”、“把”等称某些物品的集体。潮州話有“包”、“卷”、“把”,沒有“串”、“捆”,潮州話的“球”[kiu˥]等于“串”,“縛”[pak˥]等于“捆”。如說“一包藥”、“一卷紙”、“一把米”、“一球珠”、“一縛柴”等。

(五)**行为称数** 对行为、动作的計算,也要使用量詞。表示动作次数的“次”,潮州話用“匝”[tsua˩],卽古詩“繞树三匝,何枝可依”的匝。例如:

伊去二匝了(去兩次了)再来一匝(再来一次)

有时也用“回”[hue˥]或“摆”[pai˧]。

在計算感官行为(听、看、說)的次数方面,普通話常用“遍”,潮州話則用“过”[kue˨˩˧]。例如:

听一千过,还是要听!(听一千遍,还是要听!)

数量詞往往可以省略。潮州話里面,数詞、量詞和名詞結合在一起时,数詞如果是“一”,則往往省去数詞,如“一个人”可以省为“个人”。量詞在个别場合也可省略,“三个人”可省成“三人”等。

浙南閩語里的“仔”“子”和“孥”

溫端政

浙南閩語分布在浙江南部平陽、玉环、洞头、泰順等县，內部不很統一。本文材料主要以平陽的雷瀆、厤步兩地为依据。这兩个地方只相隔三里多路，它們的“仔”字的用法，在浙南閩語中有代表性。

一

在雷瀆話里，“仔”字有兩个音：a˥˩ 和 kiã˥˩。这兩个音实际上代表兩个詞，①各有自己的用法。下面先談談讀为 a˥˩ 音时的用法。

雷瀆地方流行着这样一首兒歌：

天 內 （抬） 云 仔，就 要 落 雨
t'ĩ˥ ·lai kia˧˩ xuən˧˩ a˥˩, tɕiu˩ ·bo lo˥˩ xɔu˥˩
仔，新 妇 仔，（抬） 椅 仔，（靠） 籬
a˥˩, sien˥˧ pu˥˩ a˥˩, kia˧˩ i˥˧ a˥˩, ua˩˥ li˧˩
仔，收 裙 仔，…。
a˥˩, siu˥ kuen˧˩ a˥˩,…。

（意思是：天上起了云，就要下雨啦，童养媳搬凳子，靠在籬巴边，收尿布。）

这首兒歌，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浙南閩語中“仔”字的用法：

1）“云仔”：在一般情况下，“云”后面不加“仔”，“仔”字在这里不表示什么意义，只是帮助語气，为的說起来“落句”②一些。在下面这首兒歌中，也有这种情况：

天 烏 烏，要 落 雨…，公 仔
t'ĩ˥ ʔɔu˥˧ ʔɔu˥, bo˥˩ lo˧˩ xɔu˩, kɔŋ˥ ·a
（抬） 鋤 头，媽 仔 开 水 路，…。
kia˧˩ ti˥˩ t'au˧, ma˥˩ ·a k'ui˥˧ tsui˥˧ lɔu˩。

（意思是：天上黑黝黝，就要下雨了…，老大爷，拿鋤头，老大娘，开水路，…）

“公”“媽”后面一般也不加“仔”，“仔”在这里也是起語助的作用。

2）“雨仔”：“雨仔”与“雨”不同，“雨”指一般的雨，“雨仔”指小雨。“仔”在这里是附在名詞后面表示小的意思，“椅仔”的“仔”也屬这种情况。这种用法的“仔”字，比較常見。例如：

刀仔 to ˥˧ a˥˩(小刀)　桌仔 to˥˧ a˥˩(小的桌子)
碗仔 ũã ˥˧ a˥˩(小碗)　厝仔 ts'u ˩˥ a˥˩(小房子)

这些“仔”字表示比同类物体小，还有一些表示物体本身就是小的。例如：

梭仔 so˥˧ a˥˩(梭)
指头仔 tsŋ˥˧ t'au ˧˩ a˥˩(手指)

3）“新妇仔”：这并不是指小媳妇，而是指尚未与丈夫成亲的童养媳。“仔”字在这里的作用是和它前面的詞合在一起構成一个与这个詞意义有关的新詞。与这种情况相同的，如“娘仔 nĩũ˧ a˥˩”是指蚕，“娘”本来是对女子的尊称，按迷信說法，养蚕时不能說蚕难看，而应該說它好看，否則便养不成功，因此就把蚕叫做“娘仔”。又如：“放屎 paŋ˩˥ sai˥˩”是“大便”的意思，“放屎仔 paŋ˩˥ sai˥˧ a˥˩”則是指痢疾。“人仔 laŋ˧ a˥˩”是指画有人的圖画。

4）“籬仔”：單独的“籬”不成詞，沒有意义，必須說成“籬仔”，“仔”在这里成为構詞的不可缺少的成分，与这种情况相同的，如“耳仔 xi˩˧ a˥˩(耳朵)，如把“a˥˩”去掉，剩下的便沒有意义，不成詞。有的去了“a˥˩”后，虽还有意义，但与原来的意义毫不相关。如：“kiu˥˧ a˥˩”(小孩子)如把“a˥˩”去掉，則成为“kin˥˩ 紧”，是“快”的意思，与“小孩子”一点关系也沒有。

5）“裙仔”：“裙仔”是指圍在嬰孩身上作为尿布用的一种裙。“仔”在这里的作用是把一个意义范圍較大的名詞变成一个意义范圍較小的名詞。

以上已經可以看出浙南閩語中“仔”字的用法不是那么簡單，但“仔”的用法还不止这些，除此之外，还有下面这几种用法：

1. 放在动詞或形容詞后面，使它变成名詞。如：“鑿”是动詞，“鑿仔”(錐子)便是名詞；“园”是形容詞，“园仔”(“元宵”或叫“湯园”)便是名詞。

2. 放在数量詞后面，表示少的意思。例如：

一滴仔 tɕie?˧˩ ti˥˧ a˥˩
一碗仔 tɕie?˧˩ ũã˥˧ a˥˩
一米仔 tɕie?˧˩ bi˥˧ a˥˩

3. 放在平列的表示同輩亲屬的名詞詞組后面，帶有亲热的意思。如：

姐妹仔 tɕi˥˧ mũĩ ˥˩ a˥˩
兄弟仔 xĩã˥˧ ti ˥˩ a˥˩
翁某仔 aŋ˥˧ bɔu˥˧ a˥˩(相当于普通話“夫妻

---

① 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仍以一个汉字(仔)来表示。

② 落句：浙南閩語口語，順口的意思。

俩")

这里的"姐妹""兄弟""翁某"一般指年紀較輕的。

4. 放在叠字副詞后面,幫助語气。例如:

慢慢仔(走) liau⊣⌊ liau ⊣⌊ a⋁ (tsau⋁)

密密仔(来) bɐʔ⋏⌊ bɐʔ⋏⌊ a⋁ (lai⊣)

5. 放在"叔"字后面,用来称呼年紀最小的叔父。如"叔仔 tse⋁⊦ a⋁",相当于普通話的"小叔"。

此外,"仔"字还偶然放在地名的后面、人名的后面或前面,但这种說法,已經很少听到,只是年紀很大的人才这样說,一般人,特別是年輕人已經不这样說了。

現在談談音为"kĩã⋁"的"仔"字的用法。分下列几点来說明:

1) 單独用。單用时,"仔 kĩã⋁"是孩子的意思。如"生仔 sĩ⌉⊦ kĩã⋁"是"生孩子"的意思;"父仔 pe⌊ kĩã⋁"是"父子"的意思。

2) 放在某些表示人的名詞的后面,也是第二代的意思。如:"賊仔 tsɐʔ⋁⊦ kĩã⋁"是指賊的兒子。"財主仔 tsai⋏⌊ tsu⋁⊦ kĩã⋁"是指財主的兒子。"仔"作这种用法时,有时不一定眞的是指第二代,而是含有罵人的口气,如用"賊仔"来罵人时,并不一定表明对方眞的就是賊的兒子。

3) 放在某些形容詞或动詞的后面,把它变成表示人的名詞。如"戇"原是形容詞,"戇仔 gɔŋ⌋⌊ kĩã⋁"(傻子)就变成名詞;"討米"是动詞(求乞的意思),"討米仔 t'o ⋁⊦ bi⋁⊦ kĩã⋁"(乞丐)便成为名詞。这些詞都含有輕視的意思,不輕視的叫法是把"仔"字換成"人"字,如"戇人gɔŋ⌋⌊ laŋ ⊣""討米人 t'o ⋁⊦ bi⋁⊦ laŋ ⊣"。

4) 放在疑問代詞 sĩã ⊣ 后面,表示对人的不尊敬的發問。如"sĩã⊣⌊ kĩã⋁?"相当于普通話的"哪个傢伙?"

5) 放在地名或职業名称的后面,指該地方或从事这种职業的人,但含有鄙視的語气。如"美国仔 bi⋁⊦ kɐʔ⋁⊦ kĩã⋁"相当于"美国佬","山头仔 sũã⊣⊦ t'au⌊ kĩã⊦"是指住在山区的人,"打鉄仔 p'a⋁⊦ t'i⋁⊦ kĩã⋁"是指鉄匠。

以上分別說明了音为"a ⋁"和音为"kĩã⋁"的"仔"的用法。从我們所列举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它們的大致的区别,这就是含有 kĩã⋁ 的,一定是表示人的名詞,但含有 a⋁ 的,除了少数詞(如"新妇仔")或詞組(如"兄弟仔")外,大多数都是不表示人的即表示事物的名詞。不論說成"a⋁"或說成"kĩã⋁","仔"字一般都不輕讀,只有在"公仔(抬)鋤头"一类的句子中,"仔"才輕讀。

在浙南閩語中,"仔"字分成"a⋁"和"kĩã⋁"兩套来使用,雷瀆話是比較突出的,当雷瀆人說到 a⋁ 音或 kĩã⋁ 音时,往往受到鄰近地方說浙南閩語的人的耻笑,說这是"雷瀆腔",因此雷瀆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往往改变这种說法,学習別的地方的說話,即把"仔"字,不分"a⋁"和"kĩã⋁",一概說成"kɔ̃⋁"。

把"仔"說成"kɔ̃⋁"的,可以厩步为代表,这样說法在浙南閩語中比較普遍。厩步的"kɔ̃⋁"兼有雷瀆的"a⋁"和"kĩã⋁"的作用,不必再来細說。它一般也不輕讀。所不同的是:

1. 厩步的"kɔ̃⋁",还可作为表示惊奇的嘆詞用,例如:"kɔ̃⋏!tɕia⋁ sui⋁!"意思是:"啊!这么漂亮!"作这种用法时,"仔 kɔ̃⋁"的声調拉得較長。

2. 厩步的"仔 kɔ̃⋁",不放在"叔"字后面,他們用"細叔 sue⌋⋀ tse⋁"(小叔)这个詞来代替雷瀆的"叔仔"。

3. 厩步的"仔 kɔ̃⋁",不作語助詞用。如不說"云仔""公仔"等。

二

下面我們来談談浙南閩語中"子"字的用法,不論是雷瀆、厩步或其他地方說浙南閩語的人,在口語上都把"子"說成"tɕi⋁",用法也大致相同。

"子 tɕi⋁"字的基本意义是指小而圓的东西,它可以單用,如"一粒子"是指一顆小而圓的东西。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作为構詞的輔助成分放在別的詞的后面。讓我們先来看看下面的例子:

1) 麦子 beʔ⋏⌊ tɕi⋁ (麦的种子)

桔子 kieʔ⋁⊦ tɕi⋁ (桔的种子)

魚子 xɯ⋏⌊ tɕi⋁ (魚的卵)

蝨母子 sɐʔ⋁⊦ bu⋁⊦ tɕi⋁ (蝨的卵)

2) 槍子 tɕ'ieŋ⌋⋀ tɕi⋁ (子彈)

手子 tɕ'iu⋁⊦ tɕi⋁ (介子)

算盤子 sŋ⌋⋀ pũã ⌉⌊ tɕi⋁ (算盤里的珠)

目珠子 bɐʔ⋏⌊ tɕiu⌉⊦ tɕi⋁ (眼珠)

(目珠 bɐʔ⋏⌊ tɕiu⌉ 眼睛)

3) 窗子 t'aŋ ⌉⊦ tɕi⋁

栗子 lɐʔ⋏⌊ tɕi⋁

童子 taŋ⋏⌊ tɕi⋁ (男巫的一种)

4) 石头子 tɕieu ⋏⌊ t'au ⋏⌊ tɕi⋁ (指圓而小的石头)

回豆子 xue⋏⌊ tau⌋⌊ tɕi⋁ (指炒的豌豆)

(回豆 xue⋏⌊ tau⌋ 豌豆)

沙子 sua⌉⊦ tɕi⋁ (开土槍用的沙粒)

在 1)里,"子"表示植物的种子或小动物的卵。

在 2)里,"子"的作用是加在名詞后面,使它变成一个意义与这个名詞有关的另一个新的名詞。

在 3)里,"子"是構詞的重要成分,沒有它,剩下的

音在浙南閩語里就失去意义，不成为詞。

“子”在 4）里的作用是把一个意义范圍較大的名詞，变为一个意义范圍較小的名詞。

除以上所說之外，“子”还有其他一些用法，如“六骰子 lɐʔ˩˨˩ kau˩˨˩ tɕi˥˩”中的“子”字可有可無，不論是“六骰”或“六骰子”都相当于普通話的“骰子”，但这是比較个別的例外現象。

“子”有时說成“tsɿ˥˩”，如“面子 bieŋ˩˨˩ tsɿ˥˩”“独子 tɐʔ˨˩˨ tsɿ˥˩”，这显然是受了書面語言的影响，（在讀書音里，“子”讀成“tsɿ˥˩”），口語在吸收書面語言的詞彙时，往往同时吸收它的讀音。

不論“tɕi˥˩”或“tsɿ˥˩”在詞里都不輕讀。

掌握浙南閩語里“子”和“仔”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例如：“鷄仔 kə˥˧ kɜ̃˥˩”是指小鷄，“鷄子 ke˥˧ tɕi˥˩”則是指鷄的腎臟。又如：“男鳥仔 lan˨˩˨ tɕiau ˥˩˧ kɜ̃˥˩”是指男孩子的生殖器，“男鳥子 lan ˨˩˨ tɕiau ˥˩˧ tɕi˥˩”則是指睾丸。

三

和“仔”字有联系的还有“𡥧 nĩũ˥”字。浙南閩語的“𡥧”字归納起来有四种主要用法：

1）作形容詞用，表示小的意思。如：“这物件𡥧显𡥧”（意思是：这个东西小得很。）“𡥧”作形容詞时，在句子里只作謂語，不作修飾語。

2）用来作为对小孩的表示亲热的称呼。如浙南閩語里有这样一首兒歌：“𡥧，𡥧，liŋ˥˩˧（你的）母（母亲）好命去杭州，…。”

3）和“仔、大、細、某”等合在一起作为小孩（一般是男孩）的乳名。例如：

仔𡥧 a˥˩˧ nĩũ˥

大𡥧 tɔ˩˨˩ nĩũ˥

細𡥧 se˩˥ nĩũ˥

某𡥧 bəu˥˩˧ nĩũ˥

4）加在帶有“仔”（在雷瀆話里音为“a˥˩”的“仔”）的名詞后面，表示小的意思，这是“𡥧”字最常見的用法。例如：

椅仔𡥧 i˥˩˧ a˥˩˧ nĩũ（小椅子）

鼎仔𡥧 tĩã˥˩˧ a˥˩˧ nĩũ（小鍋子）

狗仔𡥧 kau˥˩˧ a˥˩˧ nĩũ（小狗）

甕仔𡥧 aŋ˩˥ a˥˩˧ nĩũ（小罎子）

“𡥧”和“仔”“子”都可以放在名詞后面表示小的意思，“𡥧”和“仔”“子”不同的是，它不能直接放在名詞后面，如不說“椅𡥧”“鼎𡥧”等，也不能放在“子”后面，如不說“石头子𡥧”“回豆子𡥧”，它只能加在“仔”后面。帶有“仔”的名詞，加了“𡥧”后，表示更小的意思。例如：“椅仔”是指比“椅”小的椅子，“椅仔𡥧”則是指比“椅仔”更小的椅子。

“仔”字后面加“𡥧”后，仍然不輕讀，但需按浙南閩語的变調規律进行变調。“𡥧”字也不輕讀。

由以上的叙述可知，浙南閩語的“仔”“子”“𡥧”的用法是复杂的，企圖找出它們与普通話的“子”字的对应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于这，最后，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普通話中帶有構詞輔助成分“子”的詞，在浙南閩語中却不一定都可加“仔”（当然也就不能加“𡥧”）或“子”。如“肚子”，浙南閩語叫 puə ˥˩˨ təu˥˩；“嫂子”，浙南閩語叫“嫂（so˥˩）”；“褲子”，浙南閩語叫“褲（k‘əu˩）”；“胖子”，浙南閩語叫“tə˥˩˧ k‘əu ˥˧ laŋ˧˥”。

更正：本刊 1958 年 125 頁倒 21 行“群”字应为“郡”字；127 頁左欄 16 行“这一書”应为“这一本書”；17 行“[tɒ˧]”应为“[tʼɑ]”；右欄九行“[ŋ˧˧]”应为“[ŋɤ˧]”；179 頁左欄 24 行“科学体系”应为“学科体系”，右欄8 行“器关”应为“机关”；右欄 25 行表中的“nʒ”应向左移在‘mΠ”之下；180 頁右欄 2 行“-u”“ä”应为“ü”“u”。

补正：本刊 1958 年124 頁右欄倒 6 行“一对一”应为“一对二”；127 頁左欄倒 1 行“但对”的前面应加“也許是小孩兒的一种撒嬌的說法”。

江苏省試用拼音字母扫盲成功

汉語拼音字母是扫除文盲的有力武器。江苏省教育厅为了加快扫盲的进度，三月分和南京市教育局在棲霞区农業社石埠寨生产队进行了使用拼音字母扫盲的試驗。試驗結果，在十天中，文盲可以学会五百多汉字，一个月就可以摘掉文盲帽子。

在开始学習汉語拼音字母的时候，有的学員兴趣不大，通过宣傳教育，說明了汉語拼音字母的用处以后，学員們学習的勁头就来了。学員韓鳳英說：“現在我眞的看到它的用处，要下决心学到底，以后决不脫課。”有的学員拿到标有拼音字母的課本喜笑顏开地說：“有了拼音字母，汉字不認得我，我会認得它。”学員倪順英、吳文蘭，用拼音字母認識了老师沒教过的課本，自豪地說：“掌握了开汉字門的万能鑰匙，我們还怕什么！”

現在，石埠寨村大部分标語和一些实物上的汉字都注有拼音字母，工地、田間的識字牌上也注有拼音字母。人到哪里，就学到哪里，家內、路上都有“老师”，学習速度比平常学汉字加快三四倍。（劳　衛）

关于动詞作狀語和“地”的問題

——对《結構助詞“地”的用法規律》一文的商榷——

汪惠迪

动詞作狀語的情况比起它作謂語来，的确要少得多，而且作狀語的动詞多半是双音节的。尽管狀語是动詞、形容詞之前的附加成分，但是作狀語的动詞却只能附加在动詞之前，附加在形容詞之前的仅限于“飞快”“飞紅”“滾热”之类几个为数甚少的偏正式合成詞。

由于动詞的主要句法功能是作謂語，几个动詞組合在一起的时候又極易構成复杂謂語的句式（比如連动式），因此当一个动詞附加到另一个动詞之前作它的修飾成分时，自然就要受到較为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在我看来，就是作狀語的动詞一般不能直接加到中心詞之前而需要結構助詞“地”的帮助。

但是作狀語的动詞是否非借“地”就不能直接加到中心詞上去呢？当然不是。上边我們說一般不能直接加到中心詞上去，就意味着不能把問題絕对化，但是胡竹安先生在他所写《結構助詞“地”的用法規律》一文中却說：“动詞作狀語是不多的。除了單音詞‘飞’可以直接作狀語外，必定要用‘地’字。”（見《中国語文》1957年9月号第22頁，着重点是我加的——惠迪。）我認为动詞作狀語不是“必定要用‘地’字”，作狀語的动詞帶“地”与否有时还是比較自由的，甚至有些作狀語的动詞（包括單音节的和双音节的）因为某些原因而不能借“地”的帮助加到中心詞上。下边分别举些例子：

1）他忘記了自己地接連說…。（巴金：春，205頁）

1'）于是明七拍，暗七拍，飞花，急口令等等連接地行着。（同上，18頁）

2）他挂了彩，也还拚命抵抗呢。（新兒女英雄傳，新版，106頁）

2'）大水拚命的用手刨。（同上，99頁）

3）大家追出門去，叫住小水，一只手兒搭在他的肩膀上，叮嚀說…。（同上，203頁）

3'）大水叮嚀的說…。（同上，382頁）

4）老头吃惊說…。（同上159頁）

4'）那会長独个兒躺在西間炕上，一見他兩个，吃惊的坐起来。（同上，91頁）

5）申耀宗偷偷溜出去。（同上，14頁）

5'）他們暗里却偷偷的去照顧楊小妹。（同上，244頁）

5''）她們跟大嬸合計，偷偷兒在麦子地里，跟打老鼠倉似的，挖了一个洞。（同上，109頁）

6）活活把她燒死（同上，166頁）

6'）这可憐的孩子給張金龙搶了去，活活兒糟害死了。（同上，106頁）

上举成双作对的各例，都出自同一作品。它們有的帶“地”，有的不帶“地”或帶了“兒”尾；帶“地”的可以去掉“地”，不帶“地”的也可以加上“地”。这都無碍整个句子的結構，在意念上，帶了“地”，頂多也只是对狀語修飾性强化了一下。我是想說明作狀語的动詞，当它加到一个中心詞上去的时候，帶“地”或是不帶“地”，有时还是比較自由的，下边7）8）9）三例中作狀語的动詞（有的还有連帶成分宾語，实际上动宾之間結合較紧）都不帶“地”，假如要强調狀語的修飾性，加上“地”也可以；10）11）12）三例中作狀語的动詞之后則根本不能用“地”。看下边例子：

7）“大哥”，淑英忽然失声喚道。（巴金：春314頁）

8）双喜笑着諷刺說…（新兒女英雄傳，95頁）

9）張金龙使勁夺。（同上，224頁）

10）交通員飞跑去了。（同上，43頁）

11）自己提着大槍，飞奔回去报信。（同上，212頁）

12）三个人輪流放哨。（同上，118頁）

12'）队伍上的同志們替换着他們，輪流着抬。（初中《文学》課本三册，256頁）

这里，除了进一步証明动詞作狀語帶不帶“地”是較为自由的以外，还可使我們看到有些动詞狀語是不能用“地”的这一語言事实。

那么，哪些动詞作狀語不能用“地”呢？这里略略一提：1）作狀語的动詞是單音节的（見底下例子）或是双音节的帶有比喻性的偏正式合成詞，如上举10）11）兩例；2）作狀語的动詞本身可以表示动作的連續的，如例12）。它們虽不能加“地”，却可以加“着”（如12'），加“着”后在形式上虽跟“笑着說”一样，但实际上是有区别的，所以不屬于复杂謂語的句式。

胡先生还說，动詞如果是單音节的，可以直接作狀語，这是对的。不过并非象胡先生所說除了單音詞“飞”以外就再沒有其他与此类似的例子。底下我再补充几个例子：

13）有些民伕偷跑。（新兒女英雄傳，52頁）

14）队員們急了，就对罵起来。（同上，207頁）

15）（老孙头）又慌忙添說。（初中《文学》課本三，218頁）

除此以外，还有“照搬”“死盯”“活捉”“死守”之类。仅从上举例子看，作狀語的动詞跟中心詞結合得很紧，可以說已經是一个偏正式的合成詞或是一个固定詞組里的一部分了。

我参加少数民族語文科学討論会的几点重要体会

常竑恩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員会在3月28日到4月16日联合召开了第二次少数民族語文科学討論会。参加討論会的有各有关省和自治区的民族語文研究机構、民族事务委員会、民族学院、民族代表、民族出版工作者，以及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中央民族学院等有关單位的代表和民族語文科学工作者共126人。

这次会議是在全国各族大动員，各个战綫大躍进，亿万人民乘風破浪，万馬奔騰的社会主义建設高潮中召开的。这次会議的目的和任务是：总結1955年第一次民族語文科学討論会后兩年多来的少数民族語文工作，貫徹执行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設計字母的五項原則，鼓起革命干勁，实現少数民族語文工作大躍进。这个会議自始至終貫徹了整風的精神。在正式开幕之前，經过了十七天的預备会議。預备会議中通过大鳴大放、大字报、大辯論的方式，交流經驗，互相学习，肯定了几年来民族語文工作所获得的成績，同时也尖銳地批判了民族語文工作中存在的脫离政治、脫离实际和脫离群众的不良傾向。結合着代表們貼出的和各地航空寄来的大字报以及小組討論、大会辯論中所揭發的問題，进行了反复的、热烈的爭論。大家对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都获得了一致的認識。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在会上講了話。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所長包尔汉作了《兩年来少数民族語文工作的成就和今后工作的意見》的报告，副所長傅懋勣在会上作了《苏联民族語文發展的情况和解决民族文字問題的先进經驗》的报告和《关于国内少数民族語言中新詞术語的問題》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員会副主任刘春在預备会議和正式会議上先后都講了話。他們都分别指出把这次会議放在目前整風运动中是非常适合的。他們指出民族語文工作几年来所以能取得很大的成績，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党的路綫和方向正确。同时也指出了在民族語文工作中，在划分語言系屬、拟訂文字方案、制訂新詞术語以及資料使用和編写工作等方面都存在着兩条道路的思想斗爭。他們殷切地勉励民族語文工作者和專家們，要通过这次"兴無灭資"的会議虛心听取同志們的意見。深刻地檢查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要把自己的思想从資产阶級思想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同时要鼓起革命干勁，努力实現会議制訂的工作規划。

这次会議是很成功的，它确实达到了大会所預期的目的。代表們在預备会議中不但采用了"四大"的方式进行了热烈的爭辯，更重要的是首先学習了1957年8月周总理在青島民族工作座談会上的报告录音，学習了1957年11月29日国务院第63次全体会議批准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設計字母的几項原則"。經过深入体会，反复討論，大家都明确地認識到：創立、改进和改革民族文字的問題以及整个民族語文工作，必須坚持本民族自願自擇的原則，坚持有利于本民族的發展和繁荣，也就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团結、統一和各族人民共同發展与繁荣的原則。大家也認識到，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設計字母的几項原則不仅是各少数民族創立和改革文字时确定字母的原則，这五項原則的精神也是我們今后民族語文工作各方面的正确依据和共同指針。

現在把这次会議中的几点主要收获略述一下。

一 会議总結了兩年多来民族語文工作的成績

（一）兩年多来，我們普遍調查了僮、布依、侗、傣、水、黎、苗、瑤、彝、傈僳、哈尼、拉祜、納西、白、景頗、佧佤、土家、蒙古、达呼尔、土、东乡、保安、維吾尔、柯尔克孜、撒拉、裕固、烏孜別克、塔塔尔、哈薩克、塔吉克、錫伯、藏、羌等33个民族的語言。这些語言資料給解决民族文字問題、划分語言系屬問題以及对以上各語言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帮助僮、布依、傣、黎、苗、景頗、彝、傈僳、拉祜、哈尼、納西、佧佤12个民族設計了18种文字方案。这些新文字正在实驗推行或准备实驗推行。这些文字已成为这些民族扫盲和普及教育工作的有力工具，同时对支援民族地区农業大躍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云南省佧佤族今年即可用新文字培养合作社的会計員400人，这就將大大地解除佧佤地区农業社因会計不足而影响生产的困難。

（三）建立了地方的少数民族語文科学的研究或

指导机構，并按工作需要分别召开了蒙古族語言、新疆維吾尔自治区的民族語言、云南的少数民族語言以及僮、布依、黎、苗、凉山彝等民族的語文科学討論会。在各地民族語文机構直接的領导和支持下，使各民族語文調查工作队能更順利地开展工作。通过上述各語文科学討論会，不但确定了各民族試驗推行的文字方案(草案)，而且在每次会議中也及时地总結了工作經驗，反映了群众意見，加速了工作的进度。

(四)民族干部的培养和編譯出版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現在全国已培养了三万多少数民族語文工作干部，他們在各个民族地区紧張地工作着。对于已确定的文字方案，民族語文調查工作队与各地語文机構、教育部門、出版部門相互协作地編譯和出版了各种农民課本、扫盲課本、小学教材、簡明語法和其他通俗讀物。中央民族出版社也用蒙、藏、維吾尔、哈薩克、朝鮮等文字編譯和出版了大量的政策文件和讀物。

这里必須指出，这些成績是在党的正确領导下和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持下，全体民族語文工作者辛勤劳动获得的，同时也是和苏联專家的無私帮助分不开的。苏联專家們不但介紹了苏联創制民族文字和建立标准語等先进經驗，而且还深入現場，在具体工作中給予詳細的指导。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值得我們永远学習和感念的。

二 民族語文工作中的不良政治傾向得到正确的批判

会議在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民族語文工作成績的同时，也严肃地批判了工作中的“三脫”(脫离政治，脫离实际，脫离群众)的現象。

(一)調查研究工作中的不良傾向

在民族語言調查研究工作中，有些工作人員忽略了“求同”的精神，喜好“异”，喜好“分”。例如：

1) 景頗話和載瓦話的系屬問題：

在景頗族的景頗話和載瓦話的系屬問題上，我們是犯了純客观主义的錯誤的。我們只特别注意到这兩种話在詞匯方面差异較大的現象，而对于它們之間的共同部分沒有足够的注意和分析。因为工作离开了政治統帅，于是得出景頗話和載瓦話在詞匯方面有80%不同的結論，語法構造和語音方面也都努力找到了相“异”的部分。这样一来，就把景頗話立为景頗語支的独立語言，而載瓦話則归入緬語支，另成一种独立的語言。但据最近一些青年語文工作者重新比較的結果(初步的)，从詞匯、語法和語音各方面看来，景頗話和載瓦話确实应屬同一語言的差异較大的方言。值得注意的是，同用一分語言資料分析研究，竟得出兩种不同的結論。比如这次根据2234个詞进行比較的結果，不是不同的詞占80%，而是相同相近的詞占50.9%(当然是初步的比較，为了能在这次大会以前赶出比較的結果来，可能还有疏漏之处，但相同相近的詞絕不会少于45%)。

这說明什么問題呢？显然，要划分語言的系屬，要搞清楚是語言的差异还是方言的差异，除了依据詞匯、語法和語音的比較分析，依据語言的历史發展以及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历史發展的情况以外，还要政治挂帅，我們要从有利于本民族的發展和繁荣，并有利于祖国大家庭的团結与統一，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出發，不然，則所謂“实事求是”，只不过是純客观主义的另一种說法而已。

会議中也有人主張：“作語言研究工作不能把政治摆在前头，应当把語言的具体資料攤开看，是啥就是啥。”这种說法似乎很“公平”的样子，但我們若子細一想，就不难看出这句話的骨子里浸透着多么濃厚的脫离政治的純客观主义气息。

景頗話和載瓦話被判为不同的語支之后，繼之而来的影响是什么呢？它給本民族的团結与發展帶来了危害，有些民族主义情緒严重的个别人物就利用了語言差异較大作为口实，企圖进行分裂民族的勾当。在一段相当長的时期內，这确实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和睦(当然是民族中的个別現象)。这难道还不够說明問題嗎？当然，导致这种妨碍民族內部团結的原因还在于：民族語文工作中的右派分子們(如程默之流)曾别有用心地在具体工作中放了烟幕彈，以致蒙蔽了民族語言的某些眞象。但我們所以未能及时發覚敌人的陰謀，也正是因为我們的头腦缺乏政治灵魂。

誠然，景頗話与載瓦話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分歧，操这兩种方言的居民不能彼此通話，但只要研究一下这些居民的历史，对这种分歧現象自然也就不会奇怪了。况且这兩种話之間的差异与苗語中的某些方言的差异相比，眞是小巫之見大巫了，难道我們能把苗語方言分成几个不同的語支嗎？

2) 哈尼族文字方案問題：

哈尼族文字的处理問題也存在着与景頗类似的情况，有个别同志为了想在自己的方言区搞一套文字，便在方言比較工作中尽力求异，其动机也許是为了本方言区的群众“利益”，但其結果是不利于本民族的团結、發展和繁荣的。当然，哈尼族是否需要兩种文字的問題，現在还不能下最后結論，但是在比較工作中已經發現严重的缺点。

3) 云南貴州彝族的文字問題：

在大会之前，曾經有人一度主張过云南貴州彝族必須按五个方言区創制五种文字，这也說明民族語文工作中普遍存在着喜异乐分的資产阶級思想，彷佛文

字越多，就越便于民族文化的提高和社会主义的建設。这种只嗜好“异”“分”而看不見共同成分的傾向，若在思想中占了主导地位，我們的民族語文工作將不会有利于民族的团結和發展。我們固然要看到目前的利益，可是更应当看到永久的利益；我們要关心局部的利益，同时更应当关心整体的利益。我們在会議进程中，对曾經提出給云南貴州彝族創制五种文字的想法，也曾經反复地进行批判。（虽然这种想法只一度出現过）

（二）民族語言新詞术語制訂工作中的不良傾向

在某些民族的語文工作中，对于民族語言新詞术語的創制似乎已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公式，即“先挖，再創，不得已才借”。使用这个公式的同志們認为本民族語言要保持它的“純潔性”，不能借入其他語言中的詞，尤其怕借汉語的詞；不这样做的話，这些借詞就会玷污語言的“純潔”，而且会感到借詞“不光彩”！他們把語言間的相互借入和彼此丰富的自然現象看作語言的“貧乏”現象。在这种保持語言“純”化的思想支配下，于是有些同志拋弃了人民群众在生产斗爭中借用已久，并且已变成本族語言的基本詞的那些詞不用，反而由少数人关在房子里从古經旧典里去挖掘那些早为人民群众摒弃了的死字僵詞。这种作法眞如清格尔泰同志(蒙文專家)所說：“假若想把那些已死的古詞都复活起来，硬叫群众使用，將是本民族一种灾难！”比如，云南拉祜族第一版成年課本中曾挖出了一个 pumopei mi 当“祖国”，結果群众誤認为“祖坟”；北部苗文曾用“蜕化”(蜕蟬壳的意思）当作社会主义化的“化”，結果使“社会主义化”一詞变为“社会主义蜕化”了。这种“挖”“創”的例子很多，总之，不外乎下面几个路子：

1）發掘古詞。不管群众懂不懂，只是因为这些詞是本族語言所固有，就認为应当把它們从旧紙堆里或老先生們的記忆中掏出来，給它們一些“新的內容”。这样就使眞正掌握着社会命运的广大群众变为“語言的健忘者”，使今后說話或写文章都由几位老先生或是几本古經發号施令！

2）硬譯，甚至把一个詞譯成很長的一句話。

3）隨便譯。这种譯法更有問題。他們只求“得其彷彿”，并未想到对其他意义相近的詞今后怎么办。比如有的民族，几乎每个人都知道“銀行”一詞，可是有的同志为了使它有个本民族的語詞，便隨隨便便地把“銀行”譯成“放錢处”，用起来群众也許还能体会出一定与銀錢有关，但是这就給銀行、金庫、出納室，甚至放錢的抽屜、箱子、櫃子帶来了無限的糾紛。

4）标准語里沒有的詞就从方言土語里找，或从其他亲屬語言里找，甚至从俄、英、緬等語言里找。总之，反正不願意借入汉語詞。比如，蒙古族人民早已用慣了“元帅”、“將軍”等詞，一些作編譯工作的同志却偏偏把这些詞排挤掉，而采用群众不懂的генерал和маршал。最突出的是蒙文版兵役法中的軍銜部分，因为借用了俄語，老百姓甚至干部直到現在还弄不清空軍、海軍、陆軍的將軍到底怎么叫法。

此外，有些人为了排斥汉語借詞和其他語言借詞，还找出了一些“理論”根据，制訂了一些限制性的規則。他們說語言系屬不同不能借，有声調与無声調的語言之間不能借，同时还規定了借詞不能超过10—15%，等等。其結果不外是脫离本族人民群众，在民族語言發展的道路上添了一些人为的障碍；同时，也阻塞了祖国大家庭各民族語言間共同成分增加的途徑。

以上这些作法，不但会导致“三脫”，也是違背語言發展規律的。語言間相互借用和彼此丰富，决不会影响本族語言的純潔，反而会帮助語言的發展。关于借詞問題，刘春副主任和傅懋勣副所長都已明确地指出：借詞主要决定于政治經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它和語言的亲屬关系倒不一定有多大联系。只要在两个民族中間有政治、經济和文化的联系，就自然会产生借詞的現象。世界上所謂“不可滲透的”、“純粹”的語言是很难找到的。各民族不宜把語言視作壁壘，不应該把从汉語或其他民族語言中借来的詞認为“不純潔”。当然，关于借詞問題，主要的还是取决于本民族的自願自擇，語文工作者必須走群众路綫，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一問題。

这次大会的代表們，通过反复爭辯，一般对“先挖，再創，不得已才借”的公式进行了分析批判，大家認为借入汉詞將成为今后各族語言中制訂新詞术語的主要手段。这样作更会增加祖国大家庭各族語言的共同成分，有利于我国各兄弟民族語言的丰富、發展和互相学習。

（三）其他不良傾向

1）“小倉庫”：

会議上还揭發了“小倉庫”和“自留地”的問題。这也屬于一些語文科学工作者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的問題。有的人是有“有形倉庫”，他把集体劳动所积累的資料視为私有而封閉起来；有的則是“無形倉庫”，他們不直接把持語言資料，表面上是非常“公开”的，其实却暗中掌握了这些資料的命运，因为他們从不向其他同志透露一点有关資料的使用問題，以及哪些需要复核加工，哪些能够使用，等等。这些資料虽沒有鎖在箱子里，但也不会被別人使用，反正專家不开腔，別人对这些資料是無可奈何的。

2）脫离实际的研究方式：

党和政府号召我們在全国各項重要科学研究方面，要在十二年內赶上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民族語言工作当然也不能例外，自应奋勇苦战，爭取早日实現

党的号召。但是問題并不在于"赶国际水平"本身，而在于專家們赶国际水平的指导思想和工作作風。他們为了要赶国际水平，曾經想在1958年把全国民族地区的語言調查工作队全部撤回北京，大家关起門来研究，不管民族地区目前大改进的形势需要我們作些什么。有人認为，只要我們在几年內写出几本像样的語法或編輯几本像样的詞典，就可孤立地达到国际水平。这种脫离生产需要、脫离群众的作法是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服务的。当然，我們并不反对写大著作，但是放松了少数民族劳动人民急需的簡明語法、簡明詞典和一些通俗讀物的編写工作而沈醉于几十万言的大著作，同时也不繼續深入群众中向群众学習，刻苦鑽研，这就必定会脫离广大劳动人民在万馬奔騰的生产斗爭生活中的迫切需要。以这样的办法来赶国际水平，其結果也是不会达到目的的。

3）調查方法：

民族語言調查研究工作中有一种常用的工作方法，就是对"發音合作人"的語言进行調查。当然，这种办法的本身是沒有大毛病的，它确是調查語言的一种基本形式。問題就在于在什么指导思想下运用这个方法。假如深入群众，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或者集鎭采取这种工作方法，除了記录發音同志个人的語言以外，还了解附近居民的語言情况以及人文情况，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有些同志却不如此，他們習慣于城市生活，不喜欢下乡，常常把一位發音的同志調到城里，有时調到大中城市里，甚至調到北京来調查研究。这种离群索居的工作方法，仅憑一兩人的語言情况、詞匯知識和語法現象就論断一种語言如何如何，是不可靠的。我們常常發現男女老幼發音有时不同，村头寨尾語音互有差异。若仅憑發音合作的同志一个嘴作为蒐集語言資料的唯一来源，其正确性是可疑的。当然，根据这种資料也决不会使成品达到所謂国际水平。并且在搜集資料过程中，主动地从政治上帮助發音合作同志也每每不够，大多是給發音費之外，还招待烟酒糖茶，請看电影，听戏。把一樁有严肅政治意义的民族工作貶低到用金錢收买語言資料的庸俗地步，这难道还不应該警惕嗎？

三 拟訂1958—1960年少数民族語文工作躍进規划的初步意見

这次会議通过十七天的大鳴大放，总結了工作經驗和成績，批判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統一了思想認識，加强了工作信心。为了使少数民族語言研究工作能依照"多、快、好、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建設路綫，緊密配合祖国工农業以及文化科学事業全面大躍进的总形势，大会初步提出了一个三年（1958—1960）的躍进規划。这个規划包括六个部分：a）創制、选擇和改革文字，b）調查研究，c）編写工作，d）領导分工，e）培养干部，f）工作方法。規划中已明确地規定要在1958年底以前帮助全国需要創制文字的民族設計文字方案，如果决定不創制文字的民族，也要在1959年底以前帮助他們选擇对他們适用的文字。对于那些需要改革文字的民族至迟也要在1960年确定他們的文字方案。

这个規划还制訂了語文工作者紅与專的躍进要求和指标；也明确地提出"近兩三年內着重在乡下結合生产进行工作"的群众路綫工作方法。

这个規划經大会126位代表討論研究，除对个别問題提了一些补充意見外，大家一致認为这个規划是个躍进的工作規划。我們今后必須在思想躍进的基础上，依据大会各族代表的要求和願望，把这个工作規划变为每个民族語文工作者的行动綱領，鼓起革命干勁，以百倍的信心去实现这个規划。

四 結 語

这次会議开得确是生动活潑、有声有色，对每个語文工作者都給予了深刻的教育和鼓舞的力量。会中有批評，有建議，它为今后民族語文工作在全民大躍进的总形势中指出更明确的躍进方向。因限于个人思想水平，对会議某些問題尙体会不足，其中定有疏漏，尙請同志們、專家們批評指正。（1958年4月，北京）

广东省举办汉語拼音方案研究班

广东省教育厅为培养推广汉語拼音方案师資，于1958年3月25日至4月4日举办汉語拼音方案研究班。参加学習的共259人，大多是全省111个县市的中小学师范学校語文教师。由前参加北京語音研究班学習回来的10位教师干部，組成輔导核心小組，采取了上課、研究討論、自学、拼写朗讀、問題解答、个别輔导等方式进行教学工作。教师們学習情緒高漲，大都写了大字报，有的表示决心，有的挑战，有的提出了批評。通过此次学習，大部分教师进一步明确了推广普通話与社会主义建設的关系，表示回去一定要做文字改革的促进派。業务方面也都掌握了拼音字母的拼写知識，能根据字母發音拼讀和注音。（Y.G.）

汉字为什么沒有早走上拼音的道路*

李行健

一

文字發展的一般規律是表形到表意再到表音。方塊汉字基本上在表意阶段停留了几千年，这是有一定原因的。在研究汉字历史时，正确地說明这些原因，正是我們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探討这些原因之前，我們不能不概述一下專家們所發表的不同看法。据所見到的，目前有三方面的看法：第一是从文字本身發展的規律去看的，認为"文字發展，由衍形趋向衍音，任何民族都是如此，中国文字自然不能例外"。汉字在甲骨文中就有了同音假借的字，这就是衍音的趋势。但同音假借"鬧到一个字有好几个含义，叫人看了不知它究竟代表的是哪一个意思，这样当然会糾纏不清流弊百出了"。为了把"'有好几个含义'的字分别开来，按其意义，注上适当的偏旁，作为形符，使之各成一字。…这样假借的缺陷弥补了，而中国方塊字的局面也就借以巩固下来，維持下来了"。① 即是說汉字走上形声道路以后，就使"方塊字的局面"一直"維持下来了"，以致沒有走上拼音的道路。还有人認为："古人对于中国文字早就有了表音的要求和傾向，只是受汉字呆板形体的拘束，以致演进到形声就停滞不前了"。②

第二是从文字和語言的关系上去看的：比如，王力先生說："古代汉語單音节詞太多，同音异义的詞也就太多，非形声字不足以示区别。"因而形声字就沒有"像西洋文字那样变为拼音字"。③

謝尔久琴柯教授說："語言里存在着詞根分立的語法結構和形态不够發达的情况，表意文字当然可能在很長时期以內發展和使用，例如在中国。"又說："中国本身以及汉族社会經济和政治發展的特点…决定了迄今还存在的汉語多方言現象以及各方言間那些主要是語音和詞彙方面的悬殊差异。"这个"很重要的原因，直到最近它还严重地使过渡到拼音文字的工作遭遇困难。""在严重的方言分歧条件下，在缺乏統一的普遍通行的普通話，特别是缺乏統一的讀音規范的情况下，当然表意文字是一种方便的，可以說是'超方言的'文字。"④

第三是从社会發展的情况上去看的：这种看法可举曹伯韓先生为代表，他認为"秦汉时，盛行假借字尤其是同音通假，把象形字当做音符，随便乱写，这已經到了腓尼基創造拼音制的前夜。只要再进一步，就可以踏上拼音字的大道了。無奈 1）中国人民生产方法，自秦汉以后，进化很慢，人民安居于落后的生产方式之下，生活上对文字的需要相对地減少。再則 2）中国自秦汉以后，封建制度始終不改，一般供奉封建貴族的文人，故意把文字弄得很难，給封建貴族們去玩弄，使它成为貴族的独占品。这样一来，中国文字的进步就停止下来了"。⑤

从以上的引述中不难看出，各个專家对汉字为什么沒有走上拼音道路的看法都是强調了某一个方面，很少談到原因的各个方面。所以，我們願在这里提出一些补充的意見，試圖全面地探討一下汉字沒有走上拼音道路的原因。

二

我們从現在所能見到的材料看来，已經可以肯定，任何一种文字，只要是有它的完整体系和發展历史的，都是經历过表形、表意，最后到表音的阶段，或者正趋向于表音的阶段。比如埃及文字，就是这样一直發展下来的，而汉字只是正趋向于表音阶段，基本上仍是停留在表意的形声阶段。古代的楔形文字也是起源于表形，發展到既"不是純粹的'象形文字'也不是純粹的表意文字，它已經是一种'形声'字，有点像汉字的情形"，只是随巴比倫等帝国的灭亡而被人忘記了的文字。⑥ 不过，"在历史發展过程中，这些阶段不是截然划分的；

---

* 作者写此文时，曾蒙高名凱、梁东汉兩位先生指导，附此致謝。

① 参看丁易《中国文字与中国社会》，中外出版社，1950年，24頁；或《中国的文字》，三联書店，22—23頁。

② 参看《中国文字拼音化問題》，中华書局，1954年，12頁。

③ 王力：《汉語講話》，文化教育出版社，1955年，76頁。

④ 謝尔久琴柯：《关于中国文字的几个問題》，見《中国語文》1955年11月号，21—23頁。

⑤ 曹伯韓：《中国文字的演变》，三联書店，1952年117—118頁。

⑥ 高名凱：《普通語言学》上册，东方書店，1954年156—157頁。

圖画文字(可以)包含有表意文字的成分，而在表意文字里也同样有后一阶段（表音文字）所特有的那些成分”。①因此，我們当然不能說以形声字占絕对优势的汉字完全是表意文字，但是汉字畢竟还沒有脫出表意的阶段。这里的問題是；古埃及文字同样也是經过这样的形声阶段的，为什么埃及文字会最后發展到表音阶段，而汉字却長期停留在形声阶段而未能發展成为表音文字呢？对这一点，我們認为，前面引述專家的看法，的确都各有一方面的道理，只是要答复这个問題，必須正确地联系到各方面的原因，决不能孤立地只看到一个方面。

首先我們就要想到汉字为什么会發展到形声阶段。这是合乎一般的文字發展規律的，也就是有它的必然性的。文字的表形阶段的特点是“画成其物”，遇到很难“画成其物”的事物和根本不能“画成其物”的抽象概念、虚詞等就發生了不可克服的困难。虽然“指事”和“会意”的造字方法緩和了一下这种矛盾，但并不能根本解除这个矛盾，于是产生了“假借”的方法。但是“假借”仍然是“流弊百出”。由于書写工具的不便，記录語言就要力求簡練，所以古代的書面語与口語的距离比現代是大得多的，甲骨卜辞就是一个証明，因此当时也就不能准許“一形多义”的情况存在。就当时的物質条件說，人們是不会想到拼音的，补救的办法就是加注形符以区别它們。如“其”和“箕”就是这样分化出来的。另外是表形字只能表一类事物的共性，而不能表其具体特征。如“鳥”只能画出鳥形，而各种不同的“鳥”就只得用別的东西区别它們，最簡便和最妥善的办法是加注声符（区别同一类中具体事物还可能先是用“假借”办法，然后注以形符）。这种造字方法已經包涵有表音的成分，因而語言中产生的新詞或是外来語都可以方便地書写下来。当人們意識到这是一种好方法时，于是用这种方法大量造新字(汉賦中最多)，許多原不是形声字的也同化成形声字，所以从甲骨文中少量的形声字很快地就發展到占了絕对优势。这說明汉字走上形声道路是有其必然性的，并非偶然的，更不是个別人为的。②認为形声字妨碍了汉字走上拼音道路的人，他們就正是認为形声字的出現是偶然的。我們的看法恰好相反。

从文字的演进中，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形声字是一切文字完整發展过程中必然經过的道路。那末，我們就沒有理由說汉字衍到形声字后就使方塊字局面長久“停滞”下来，沒有向拼音發展。郭沫若先生說得好：“从我国文字本身發展过程来看，由象形进到形声，是合乎世界各国文字的發展的一般趋势即走向拼音道路的。”③旣然別的文字沒有因形声字的呆板形体“拘束”而走向拼音，也就不能說独独汉字的形体“拘束”了它走向拼音，“以致演进到形声就停滞不前了”。

再看同音詞多是否就妨碍了走向拼音的道路呢？不容否認，古汉語單音节詞比現在是多得多，但絕不能从此得出“非形声字不足以示区別”同音詞的結論。古代的同音詞不管多到什么程度，总該不致妨碍人們的互相交际，这是肯定的事实。我們决不否認利用形旁有区別同音詞的作用，这种作用一直到現在还保持着，这也是事实。但是决不能因此說單音节占优势的語言由于同音詞多就不能实行拼音文字。越南的拼音文字正是一个有力証明。因而也决不能說因單音节詞多，造成同音詞多，結果就只能使用形声字。如王力先生所說，只有在“复音詞已經大大地增加了”的情况下，汉字才“会走上拼音的道路”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

我們認为任何語言在任何时候，仅就它的語法結構和詞彙特点来說，都是可以使用拼音文字的，絕不会有某种語言在某一阶段，由于什么構造上的特点而不能用拼音文字。相反地，我們可以說有的語言可能因結構特点而不适于用形声字。但这不等于說，語言中同音詞多的現象对記录它的文字从表意阶段到拼音阶段，完全沒有一些影响。

三

文字是記录語言的符号，是为人类的交际服务的。文字服务得好不好，就要看它能否把語言記录得好，看它是否适合語言本身結構的特点。若服务得不好，人們一定会改革它的。汉字老停留在表意的方塊字阶段，就不能不从汉語的特点去考虑了。

应該承認，詞根分立的語法結構是汉語的特点。所謂“詞根分立的詞彙語法特点”，就是說“汉語中各种語法形式和語法范疇形成时，汉語詞根是沒有变化的。”④方塊汉字不能表示出印欧語言那样的形态变化，因而它也就适合了汉語沒有这种形态的特点。語法成分与詞根是分立的，同时語法成分和詞根的本身并不生变化，所以方塊字也能胜任地把它們表現出来。

---

① 契科巴瓦：《語言学概論》第一編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164頁。

② 丁易先生在《中国文字与中国社会》24頁說，汉字变成形声字是过去掌握文字的巫史們搞出来的，于是駡他們“低能”，不知分析音素，制定音标。高元白先生在《汉字的起源發展和改革》（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版，16、28頁）中說，古人不知放弃方塊制度，在假借这个我国老早就發明了的由“衍形”走向“衍音”的方法中，“只是把所有的方塊汉字，当做音符使用，因而發生了‘一形多义’的流弊”，于是注以形旁造成形声字，不知“写成拼音文字”。高先生对这一点表示極大的惋惜。

③ 《中国文字拼音化問題》，1頁。

④ 《中国語文》1955年11月号，22頁。

汉字为什么沒有早走上拼音的道路*

李行健

一

文字發展的一般規律是表形到表意再到表音。方塊汉字基本上在表意阶段停留了几千年，这是有一定原因的。在研究汉字历史时，正确地說明这些原因，正是我們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探討这些原因之前，我們不能不概述一下專家們所發表的不同看法。据所見到的，目前有三方面的看法：第一是从文字本身發展的規律去看的，認为"文字發展，由衍形趋向衍音，任何民族都是如此，中国文字自然不能例外"。汉字在甲骨文中就有了同音假借的字，这就是衍音的趋势。但同音假借"鬧到一个字有好几个含义，叫人看了不知它究竟代表的是哪一个意思，这样当然会糾纏不清流弊百出了"。为了把"'有好几个含义'的字分别开来，按其意义，注上适当的偏旁，作为形符，使之各成一字。…这样假借的缺陷弥补了，而中国方塊字的局面也就借以巩固下来，維持下来了"。①即是說汉字走上形声道路以后，就使"方塊字的局面"一直"維持下来了"，以致沒有走上拼音的道路。还有人認为："古人对于中国文字早就有了表音的要求和傾向，只是受汉字呆板形体的拘束，以致演进到形声就停滯不前了"。②

第二是从文字和語言的关系上去看的：比如，王力先生說："古代汉語單音节詞太多，同音异义的詞也就太多，非形声字不足以示区別。"因而形声字就沒有"像西洋文字那样变为拼音字"。③

謝尔久琴柯教授說："語言里存在着詞根分立的語法結構和形态不够發达的情况，表意文字当然可能在很長时期以內發展和使用，例如在中国。"又說："中国本身以及汉族社会經济和政治發展的特点…決定了迄今还存在的汉語多方言現象以及各方言間那些主要是語音和詞彙方面的悬殊差异。"这个"很重要的原因，直到最近它还严重地使过渡到拼音文字的工作遭遇困难。""在严重的方言分歧条件下，在缺乏統一的普遍通行的普通話，特別是缺乏統一的讀音規范的情况下，当然表意文字是一种方便的，可以說是'超方言的'文字。"④

第三是从社会發展的情况上去看的：这种看法可举曹伯韓先生为代表，他認为"秦汉时，盛行假借字尤其是同音通假，把象形字当做音符，随便乱写，这已經到了腓尼基創造拼音制的前夜。只要再进一步，就可以踏上拼音字的大道了。無奈 1）中国人民生产方法，自秦汉以后，进化很慢，人民安居于落后的生产方式之下，生活上对文字的需要相对地減少。再則 2）中国自秦汉以后，封建制度始終不改，一般供奉封建貴族的文人，故意把文字弄得很难，給封建貴族們去玩弄，使它成为貴族的独占品。这样一来，中国文字的进步就停止下来了"。⑤

从以上的引述中不难看出，各个專家对汉字为什么沒有走上拼音道路的看法都是强調了某一个方面，很少談到原因的各个方面。所以，我們願在这里提出一些补充的意見，試圖全面地探討一下汉字沒有走上拼音道路的原因。

二

我們从現在所能見到的材料看来，已經可以肯定，任何一种文字，只要是有它的完整体系和發展历史的，都是經历过表形、表意，最后到表音的阶段，或者正趋向于表音的阶段。比如埃及文字，就是这样一直發展下来的，而汉字只是正趋向于表音阶段，基本上仍是停留在表意的形声阶段。古代的楔形文字也是起源于表形，發展到既"不是純粹的'象形文字'也不是純粹的表意文字，它已經是一种'形声'字，有点像汉字的情形"，只是随巴比倫等帝国的灭亡而被人忘記了的文字。⑥不过，"在历史發展过程中，这些阶段不是截然划分的

---

* 作者写此文时，曾蒙高名凱、梁东汉兩位先生指导，附此致謝。

① 参看丁易《中国文字与中国社会》，中外出版社，1950年，24頁；或《中国的文字》，三联書店，22—23頁。

② 参看《中国文字拼音化問題》，中华書局，1954年，12頁。

③ 王力：《汉語講話》，文化教育出版社，1955年，76頁。

④ 謝尔久琴柯：《关于中国文字的几个問題》，見《中国語文》1955年11月号，21—23頁。

⑤ 曹伯韓：《中国文字的演变》，三联書店，1952年117—118頁。

⑥ 高名凱：《普通語言学》上册，东方書店，1954年156—157頁。

圖画文字(可以)包含有表意文字的成分，而在表意文字里也同样有后一阶段（表音文字）所特有的那些成分”。①因此，我們当然不能說以形声字占絕对优势的汉字完全是表意文字，但是汉字畢竟还沒有脫出表意的阶段。这里的問題是：古埃及文字同样也是經过这样的形声阶段的，为什么埃及文字会最后發展到表音阶段，而汉字却長期停留在形声阶段而未能發展成为表音文字呢？对这一点，我們認为，前面引述專家的看法，的确都各有一方面的道理，只是要答复这个問題，必須正确地联系到各方面的原因，决不能孤立地只看到一个方面。

首先我們就要想到汉字为什么会發展到形声阶段。这是合乎一般的文字發展規律的，也就是有它的必然性的。文字的表形阶段的特点是“画成其物”，遇到很难“画成其物”的事物和根本不能“画成其物”的抽象概念、虛詞等就發生了不可克服的困难。虽然“指事”和“会意”的造字方法緩和了一下这种矛盾，但并不能根本解除这个矛盾，于是产生了“假借”的方法。但是“假借”仍然是“流弊百出”。由于書写工具的不便，記录語言就要力求簡練，所以古代的書面語与口語的距离比現代是大得多的，甲骨卜辞就是一个証明，因此当时也就不能准許“一形多义”的情况存在。就当时的物質条件說，人們是不会想到拼音的，补救的办法就是加注形符以区別它們。如“其”和“箕”就是这样分化出来的。另外是表形字只能表一类事物的共性，而不能表其具体特征。如“鳥”只能画出鳥形，而各种不同的“鳥”就只得用別的东西区別它們，最簡便和最妥善的办法是加注声符（区別同一类中具体事物还可能先是用“假借”办法，然后注以形符）。这种造字方法已經包涵有表音的成分，因而語言中产生的新詞或是外来語都可以方便地書写下来。当人們意識到这是一种好方法时，于是用这种方法大量造新字（汉賦中最多），許多原不是形声字的也同化成形声字，所以从甲骨文中少量的形声字很快地就發展到占了絕对优势。这說明汉字走上形声道路是有其必然性的，并非偶然的，更不是个別人为的。②認为形声字妨碍了汉字走上拼音道路的人，他們就正是認为形声字的出現是偶然的。我們的看法恰好相反。

从文字的演进中，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形声字是一切文字完整發展过程中必然經过的道路。那末，我們就沒有理由說汉字衍到形声字后就使方塊字局面長久“停滯”下来，沒有向拼音發展。郭沫若先生說得好：“从我国文字本身發展过程来看，由象形进到形声，是合乎世界各国文字的發展的一般趋势即走向拼音道路的。”③旣然別的文字沒有因形声字的呆板形体“拘束”而走向拼音，也就不能說独独汉字的形体“拘束”了它走向拼音，“以致演进到形声就停滯不前了”。

再看同音詞多是否就妨碍了走向拼音的道路呢？不容否認，古汉語單音节詞比現在是多得多，但絕不能从此得出“非形声字不足以示区別”同音詞的結論。古代的同音詞不管多到什么程度，总該不致妨碍人們的互相交际，这是肯定的事实。我們决不否認利用形旁有区別同音詞的作用，这种作用一直到現在还保持着，这也是事实。但是决不能因此說單音节占优势的語言由于同音詞多就不能实行拼音文字。越南的拼音文字正是一个有力証明。因而也决不能說因單音节詞多，造成同音詞多，結果就只能使用形声字。如王力先生所說，只有在“复音詞已經大大地增加了”的情况下，汉字才“会走上拼音的道路”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

我們認为任何語言在任何时候，仅就它的語法結構和詞彙特点来說，都是可以使用拼音文字的，絕不会有某种語言在某一阶段，由于什么構造上的特点而不能用拼音文字。相反地，我們可以說有的語言可能因結構特点而不适于用形声字。但这不等于說，語言中同音詞多的現象对記录它的文字从表意阶段到拼音阶段，完全沒有一些影响。

三

文字是記录語言的符号，是为人类的交际服务的。文字服务得好不好，就要看它能否把語言記录得好，看它是否适合語言本身結構的特点。若服务得不好，人們一定会改革它的。汉字老停留在表意的方塊字阶段，就不能不从汉語的特点去考虑了。

应該承認，詞根分立的語法結構是汉語的特点。所謂“詞根分立的詞彙語法特点”，就是說“汉語中各种語法形式和語法范疇形成时，汉語詞根是沒有变化的。”④方塊汉字不能表示出印歐語言那样的形态变化，因而它也就适合了汉語沒有这种形态的特点。語法成分与詞根是分立的，同时語法成分和詞根的本身并不生变化，所以方塊字也能胜任地把它們表現出来。

---

① 契科巴瓦：《語言学概論》第一編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164頁。

② 丁易先生在《中国文字与中国社会》24頁說，汉字变成形声字是过去掌握文字的巫史們搞出来的，于是罵他們“低能”，不知分析音素，制定音标。高元白先生在《汉字的起源發展和改革》（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版，16、28頁）中說，古人不知放弃方塊制度，在假借这个我国老早就發明了的由“衍形”走向“衍音”的方法中，“只是把所有的方塊汉字，当做音符使用，因而發生了‘一形多义’的流弊”，于是注以形旁造成形声字，不知“写成拼音文字”。高先生对这一点表示極大的惋惜。

③ 《中国文字拼音化問題》，1頁。

④ 《中国語文》1955年11月号，22頁。

在这一点上，应該說汉字是服务得好的。因为方塊字記录汉語是以音节为單位的，自然它不能表示出小于音节的音素上的变化。汉語正是沒有这种变化，并且是基本上具有單音节特性的語言（尤其是古汉語），所以即使就現代来說，方塊汉字对汉語也是有适应性的。許多人認为汉語發展到現在，已与汉字發生了不可調合的矛盾，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似是而非的說法。不錯，現代汉語确是有了“子、兒、头、着、了、們”等等形态，但这些成分仍然是以音节为單位的。不管它們放在什么詞或詞組甚至句子形式（如“的”）后边，这些变化都是以整个音节的單位来运用的，很少發生音素上的变化（兒化情况稍不同）；因此，方塊汉字仍然可以表示它們。这正是方塊字和汉語詞根分立的語法結構适应的地方。

我們承認汉字服务得好，方塊汉字可以把汉語記录下来，并不等于維护停留在形声阶段的方塊汉字，說它是唯一的最好的工具；恰恰相反，正因为汉字的形声阶段早已蘊蓄着表音的成分，有形成拼音的趋势，我們在掌握了它的發展規律之后，利用这个規律促成它的拼音化，以便使它能够更好地为現代汉語服务，也就是使它能够充分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建設高潮的需要。我們在指出方塊汉字的优缺点时，既要实事求是，又要辯証地来看汉字的發展趋势。必須看到，方塊字同汉語的适应性只是問題的一面，在另一面，方塊字还有許多严重的缺点。这些缺点已經有人一再談过了，这里不必多說。我們只要注意到这一点，这就是，因为形声字的發展越来越使得汉字繁复，难認，难写，而且有許多貌似形声而实非形声的汉字，打乱了原来的形声規律，以致很难为要求文字的人民接受。

我們知道，文字本来应該屬于人民的，但是在阶級社会里，反动的統治阶級为了自身的利益，总是想把它壟断起来（不一定是自觉的）。汉字常被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在群众中造成文字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气氛，甚至今天还有这样看待汉字的人。

过去反动統治阶級为要达到壟断汉字的目的，除了靠政治和經济上的手段以外，还要保持汉字最大的限度的繁难，过去的文人都是大力保持汉字繁难，認为簡化字是不合法的。他們在忠实地貫徹統治阶級的企圖中，也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他們还怕“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①为壟断汉字，当然認为形声阶段的汉字是最好的了。难怪魯迅先生說：“我們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經济这些限制之外，卻还要加上一条高門檻：难。”②

这应該說是汉字沒有早走上拼音道路的主要原因。

四

在考查方塊汉字沒有走拼音道路时，我們認为方言分歧也是一个原因，不过它并不是主要的經常起作用的原因。方言的分歧主要表現在語音上。我們从汉語發展的历史上看，方言分歧在語音上虽然越来越严重，但是在一定阶段上也还是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同語的。一般認为《詩經》和《楚辞》分別代表北部和南部方言，可是从兩者用韵上看，差別并不很大。春秋战国时，各国使节互相往返聘問，一般知識分子讀書、行礼时都要用当时的“普通話”，也就是《論語》中說的“子所雅言，詩書执礼皆雅言也”。这說明当时“普通話”不但有書面的，还有口头的。秦汉統一后，汉語的基本結構的一致性更日趋明显。所以我們認为，“从各方面的文献材料看来，都表現出汉語在汉代已經形成了一个共同的部族語言”，③这种說法是可信的。因而，在这种时候如果說方言分歧造成对汉字走向拼音道路有妨碍的話，那是可以克服的。方言分歧的严重情况是历史發展的結果，并且它是随社会發展情况而起分化或統一的变化的。如果把方言分歧看成是一个决定性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这不仅忽視了其他方面，同时也無法解釋在有共同語存在的历史阶段上，汉字何以沒有走上拼音的道路。王力先生对这个問題發表意見时說，現在方塊汉字在群众心目中“只是一个囫圇的复合体”，“拼音文字即使受方言局限，从最坏的情况来說，也不过是变为囫圇复合体”。“而实际上情况决不会坏到这个地步”。他并預言“即使在方言复杂的今天，拼音汉字和方塊汉字如果进行竞賽，拼音文字还是能够取得胜利的”。④这些都是正确而中肯的話。

綜上所述，可知汉字沒有走上拼音道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过去以至現在方塊汉字确是具备了記录汉語的可能性，但是并非必要性。就过去社会發展的停滯不前的情况說，已給予了方塊字不一定非改革不可的可能性。从过去統治阶級以及使用文字的人来說，他們又有保存这种繁难的方塊汉字的必要性。这些可能性和必要性的結合，就使汉字基本上在表意阶段停留了一兩千年。

我們所以要探討过去汉字沒有走上拼音道路的原因，就是因为許多文改先驅者的失敗，都說明了过去社会制度的腐朽，不可能有像今天的有利条件。当然，我們所探討的原因也不見得就是全面的，但至少是主要的。最后，在这一点上，我們还希望專家們能从外国文字發展的历史上多做一些比較研究。

---

① 魯迅：《門外文談》，全集旧版卷六，99頁。
② 同上，98頁。
③ 《北京大学人文学报》1956年第1期，131頁。
④ 《中国語文》1957年10月号，3頁。

論汉語中詞的界限問題(一)

苏联 伊三克

确定詞的界限的方法

§1 我們試圖确定汉語中詞的界限，是以这种出發点为基础的：汉語中的詞彙單位是詞，而不是"語音"、"詞素"和"編插"等等，在这方面汉語和世界上一切別的語言并無不同。当然，那并不排斥承認汉語的詞有它自己独具的許多特点。还应当着重指出，我們这里是选取现代汉語中存在的詞，并沒有涉及汉語早期發展阶段的詞，也沒有深入詞的历史。

我們的研究所采取的准則就是梅耶的定义："詞是一定的意义同具有一定語法用途的一定語音組合联系之結果。"①

但是尽管采納这个定义，我們也并沒有忘記列宁的指示："所有一般定义都只有一种有条件的和相对的意义，始終不能把現象的全部發展上的一切复杂联系概括起来。"②科学的定义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向性的，因而它可能有时强調說明一定現象的某一些典型特征，有时又强調說明現象的另一些典型特征。

梅耶給詞下的定义虽然有它显著的缺点，不过也还能够符合我們的研究要求，这是因为它并非孤立地、而是在不断的联系中(例如他說"詞是联系之結果")概括了語言学应当研究的詞的三个主要方面，即詞义方面、語音方面和語法方面。

§2 在对汉語的詞所下的許許多多定义中，我們这里仅仅举出最近比較完善的三个定义：

康拉德在所著《論汉語》一書中給汉語的詞的特征下定义是："事实上，汉語詞彙的必要标准是：对于一切的詞来說，就是它的音素和它在形态学上的一定的变化能力，对于多音节詞来說，还要加上重音的存在，这重音跟一定的声調結合起来。"③同梅耶的定义相比，显然可以看出这里缺乏一項詞义标准——詞是应当有它一定的詞彙意义的；康拉德强調的是詞的語音方面——对于一切的詞来說，就是它的音素，对于多音节詞来說，还有重音的存在，这重音跟一定的声調結合起来；康拉德也提到了語法标准——在形态学上的一定的变化能力。

中国語言学家周祖謨在自己的定义中也指出詞的这三方面："詞在語言中是代表一定的意义的語音形式，它是語言中最小的独立运用單位。"④这个定义提出詞具有在語言中独立运用的能力作为語法标准，并且把詞同詞組和句子严格分开。

波蘭汉学家亞·赫迈萊夫斯基在給汉語詞下定义时，提到三个标准：

"我們不应該承認一个語言單位为一个詞，除非它能滿足下列条件：1)必須能够离开上下文說出来，而叫听的人听得懂；2)它必須本身能在句子中充当一定句法成分，那就是依照这个語言單位的語文价值充当主語、宾語、謂語等等角色；3)它必須不能分析成几个構成部分，这些構成部分都能滿足1)和2)兩个条件。"⑤

关于第一个条件不适用于汉語的問題，我們將在下面叙述。我們也不能同意这第三个条件，因为它武断地否認汉語中存在着組合型(composita)的复合詞。不过，赫迈萊夫斯基教授提出的第二个条件倒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提供了能在語言中独立运用作为确定詞的标准，这一点也是周祖謨的定义中提到了的。

綜合上面几个定义，并且补充以苏联語言学所建立的、已往成功地用在我国汉学中的、关于必須在詞的形式的整体中来考察詞的論点，⑥大致可把汉語的詞所应符合的条件归納如下：

單独的实詞应当是：

1) 在詞义上具有一定的独立的詞彙意义。

2) 在語音上是單一的語音組合，即复杂的語音整体，它的各別成分是由發音的和扩及整体的一定声調的連續性而熔合在一起的。

3) 在語法上，a)应当能够执行一定的句法功能；b)应当能够接納某一詞彙-語法范疇的詞所独具的構

---

① 参見梅耶《Revue de metaphysique et de morale》(形而上学和道德的評論)，1913年，11頁。引文据方德里叶斯《語言》，1925年，倫敦，89頁。

② 列宁：《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底最高阶段》，《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995頁。

③ 康拉德：《論汉語》，彭楚南譯，中华書局，1954年，37頁。

④ 周祖謨：《汉語詞彙講話》，見《語文学習》第43期，33頁。

⑤ 赫迈萊夫斯基：《汉語的句法和形态問題》，見《中国語文》1955年12月号，7頁。

⑥ 康拉德在《論汉語》(中文本48頁)中指出：汉語的"詞在話里头联結起来就表現出它的語法形式，这种語法形式在特征上、意义上是丰富而多样性的。"

形要素(不論是綜合的或分析的)。

§3 根据謝尔巴院士的学說，說話的气流分为几个語調上不可分割的言語單位——意群(синтагма)，它們是"在言語-思想过程中表示單一意义整体的語音統一体。"①在一个意群之中，停歇是不可能的。

維諾格拉多夫院士这样說明了謝尔巴对意群的理解："謝尔巴写道：一个句子可以分割成这样几段，它們用最后一个音节的重音作为特征，并且在一定的上下文中表示一个概念，虽然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意群与意群之間是可以（但不是非此不可的）用停歇分开的。它們是由一个詞或許多詞組成的。"②

現在我們就来試把謝尔巴关于意群的理論用于汉語，以确定汉語詞的界限。

試取下列一段汉語为例：③

人家中心小学的女教員，齐砚庄啊，在学校里教完一天的書，还来白教識字班，这还不算，学生們不来，她还亲自到家里找去，您多喈看見过这样的好人？

上引文的作者自己在这里就已通过标点符号把这段話初步划分成几个所謂复杂的意群，在汉語中，标点符号首先是执行节奏-句法功能的。

我們把这段話录在示波器上，来确定言語当中产生的自然停歇，并且解析所得意群的意义，便可看出下列情况：④

人家　中心-小学的　女教員　齐砚庄啊　在学校里　教完　一天的　書　还-来　白教　識字班　这-还　不算　学生們　不来　她-还　亲自　到家里　找去　您　多喈　看見过　这样的　好人

如果我們現在拋开前置詞、后置詞和語气詞(它們是作为前接詞和后接詞在語音上与实詞連接的)不談，并且除去專有名詞和重复出現的意群在外，那末就可得出下列二十五个"候补詞"：

人家　中心　小学的　女教員　学校
教完　一天的　書　还　来
白教　識字班　这　不算　学生們
不来　她　亲自　家　找去
您　多喈　看見过　这样的　好人

在这二十五个言語單位中，有些是單詞（有原形詞，也有用綜合和分析的構形要素構成的詞），有些是詞組，但是却不可能有比詞更小的單位，这是因为只在意群与意群之間才能有停歇，而意群却是不能小于一个詞的。

把一句話分解为几个意群是很自然的，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困难。⑤因此，將上面分析的一节作出連續的实驗录音就毫無必要。在我們的研究中只是碰到某些疑难場合才把那一段話录在示波器上。

§4 我們前面称为"候补詞"的二十五个單位，其中有七个是單音节詞，它們根本不能是詞組。

这些單音节詞就是：書、您、家、她、来、这、还。

認为它們是詞的一部分，怀疑到它們的独立性，那是沒有任何根据的：它們每个單位都具有完全独立的詞彙意义，而且它們在意群分析的过程中，也显現了語音上的整体性和完善性。由此可見，根据詞义和語音这兩个标准，就已經可以把它們算作單詞。

不过考虑到語法标准对于下面就要分析的多音节意群特別重要，因此在分析單音节詞时应用这条标准也并不是多余的，为了把我們在研究工作中所采用的方法叙述得更加全面，这也是必要的。

前面已經說过，根据語法标准，一个單詞应当能够：1)在句子中执行一定的句法功能；2)接納某一詞彙-語法范疇的詞所独具的全部或一部分(那怕是一部分)構形要素。

"書"这个詞具有实物的意义，在所分析的那一段語句里就是行为的客体。因此它是一个名詞。

語法規定，名詞在一个句子中应当：执行主語、宾語和表語的功能；能够同前置詞、后置詞和量詞結合在一起；不能同否定詞"不"結合在一起。⑥

不难看出，"書"这个詞是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

我的｜書｜很｜多(这里書是主語)
他｜看｜書(这里書是宾語)
这｜是｜書(这里書是表語)

---

① 謝尔巴：《法語語音学》，1957年，86頁。

② 見《現代俄語句法問題》，論文集，1950年，210頁。

③ 老舍：《龙鬚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39—40頁。

④ 这里分写是表示明显的停歇，用連字符是表示短暫的停歇。

⑤ 在这方面我們引証薩皮尔（E.Sapir）一段有趣的話：表現在規范化的書面形式中、或者是在日常用法中証实的語言經驗，充分表明要把一个詞当作心理現实来理解照例都是沒有什么困难的。最令人信服的証据就是，一个根本不習慣于書面詞的概念的天眞的印弟安人，在用他自己的語言把一段話逐字逐句念給学語言的学生听写的时候，他是从来不会感到有什么严重困难的：当然他会像在日常說話中那样把詞一个接着一个念出来，但是如果請他停頓一下，若是他懂了你想要他干什么的話，他也能立刻把詞孤立出来，当作單位来重复。另一方面，他經常不同意孤立出詞根或語法要素，因为那样做"沒有意思"（見 Sapir：《語言》，1921，紐約，34—35頁）。

⑥ 由于缺乏公認的划分詞类的标准体系，所以我們不得不采用在語言学文献中得到大多数人承認的体系。把某个詞类的一切特征都弄个清楚明白，这对采用語法标准是沒有什么必要的，因为一个詞彙單位只要具备一兩个这样的特征，便足有根据承認其为独立的詞。

在|書|上
在|書|底下
三-本|書

因此，有充分理由把"書"看作是現代汉語里面的單詞。

当然，也不是汉語所有的詞都像"書"这样充分具有显示自己語法特征的能力。

例如"家"这个詞在我們分析的这段話里，就得指出，由于它自己的詞义特点，能够同它結合在一起的后置詞是为数有限的，它也不能同量詞結合(除了在極少的場合下)，因为"家"这个詞本身就是量詞。

不过，要發現"家"这个詞的語法本質也并不困难：

他的|家|离|这兒|很|远
我|很|想|家
从|我|家|旁边

語法的檢驗也令人信服地証明，使用意群分析的方法提出来的一切單音节詞都是單詞。

从多音节意群中提出單音节詞的办法，我們將在下面叙述。

在我們这部辞典里(按指《拼音汉俄辞典試編》——譯者)，选出單音节詞就是用的这种方法——把一段話分成几个意群，分析意群的意义，放在另外的上下文中从語法上来檢驗。

單音节詞的数量在我們这部辞典里占詞的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

但是須要立即說明，單音节詞在汉語詞彙中所占的比重，当然比这还要小得多。

研究的材料范圍越广，單音节詞的比重就显得越小。我們这部《拼音汉俄辞典試編》也証实了这一点：記录的詞句越多，未收入的單音节詞也就越少碰到。

單音节詞在这部辞典里所占的百分比所以比較高，应当說是由于單音节詞在口語中，特别是在日常談話中用得較多。我們研究的材料性質(只限于直接用語)，辞典的篇幅有限，等等，也都決定了这一点。

§5 每一个多音节意群可以是單詞(簡單的或复合的)，也可以是詞組。

試比較这样兩个双成分的單位："好人、要人"。

这兩个單位第二部分"人"在现代汉語是一个詞。看下面就不难相信这一点：

一-个|人
她|也|是|人
人|很|多

若說这里碰到的是兩个詞組，那末"好"和"要"就得認为是具有"好的"和"重要的"的意义的形容詞。

現在我們来檢驗一下，这些詞究竟有几分符合形容詞的語法特性。

汉語中的質量形容詞：1)具有短尾和全尾形式；2)具有重叠形式；3)能够構成分析的比較形式；4)能够同否定詞"不"結合在一起；5)在短尾形式下能用作定語和謂語；6)在全尾形式下能用作定語、主語、宾語和表語。

	好	要
1.	好(和)好的；	要(和)?
2.	好好的；	?
3.	更|好；好|一点； 好得|多；最|好；	?
4.	不|好；	?
5.	好|人材；書|好；	?
6.	好的|書；好的|多，坏的|少；	?
	我|要|好的；这|是|好的。	

上面的对比証明，不能認为"要"("重要的")是現代汉語中的一个單詞。

再举一个例子："書鋪"，在汉語中，倒是有"書"这个單詞(見§4)。可是"書鋪"这个結構的第二部分是什么呢？这第二部分具有"商店""店鋪"这样的实体意义，但是在語言中根本不能独立使用，例如不能說："这-家|鋪"(?)，"鋪|很|多"(?)，"他|开了|鋪"(?)，"鋪|里"，①"鋪|旁边"(?)等等。这些說法都是不合語言規范的，因此，"鋪"就不能認为是單詞。可是若把这些例子中的"鋪"改成原来的"書鋪"，那它們就是完全合乎語言規范的了。

在第三节中分析过的那段話里，我們可以讀到："…中心|小学|的|女教員，齐|砚庄|啊，在|学校|里|教完|一|天|的|書…。"如果假定"小|学"是"小"和"学"構成的詞組，那就不会明白，为什么同一个句子里講的同一个学校，而在前竟說"学"，在后竟說"学校"。

从語法上来加以檢驗，就很容易証明，原来汉語中并沒有"学"这个名詞，虽則有"学"这个动詞。

这里应当特别着重指出，只要是按語法标准确定其独立性的詞，就应該具有它在某一整个复合結構中可能归屬的同一詞彙-語法范疇的特性。在其他詞彙-語法范疇的組成中，虽有同样詞根的詞，决不能說明我們研究的这个結構也是單詞。

还可用"小說"这样的結構作为例子。虽然在現代汉語中有"說"这个單詞，它具有动詞的一切形式和非常自由的联結关系，但是对"小說"而言，所有这些形式

① 这样的結構也不是不可能的。关于这种現象的解釋可参閱本文第二章第一节："具有关联意义的詞"。

和用法都是絕对不适用的，因为“說”在“小說”中只能是名詞，可是在現代汉語中却沒有作为名詞的“說”。①

要决定一个詞归屬于某一个詞彙-語法范疇，就要分析它所在的上下文。

例如，“你|还|有|这-种|享|福|的|夢想！（茅盾，233）”在这样的上下文中，我們看出“夢想”是：1)宾語，2)能同指示代詞和量詞結合，3)前面可有动宾結構的定語。因此，它可能是一个詞——名詞，也可能是兩个詞——定語（名詞或形容詞）加名詞。由此可見，在驗証“想”这个詞的單詞性时，我們不能从汉語中存在着“想”这个动詞出發。我們应当看看有沒有意义相当的名詞“想”。可是这样的名詞是沒有的。②

这样一来，要是現代汉語中沒有“要”（重要的）、“鋪”（店鋪）、“学”（学校）、“說”（小說）和“想”（思想）等等單詞，那末，像“要人”、“書鋪”、“小学”、“小說”和“夢想”这样的結構究竟算是什么东西呢？

这些都是單一的复合詞。

在上面分析的过程中，我們是从这些詞中提出了詞的要素（在举的例子中就是复合詞的实詞詞干），这些要素在汉語中根本不能独立运用。

一个詞“不能不損伤其意义而分解为更小的小詞，这些小詞中总有一个讓我們看不出是从哪兒来的。”③

因此，任何一个詞彙結構，在它的組成中那怕只具有一个非單詞的成分，总的說来，它就不是詞組而是單一的詞。

这条原理的作用范圍在汉語中是很广泛的。受它支配的詞就是：1)簡單的、詞源不明的詞，例如“蒼蝇”、“蹓躂”；2)派生的、帶附加成分形成的詞，例如“桌子”、“甜头”；3)完全由現代汉語中已經不見的古詞組成的复合詞，例如“脊梁”、“阿諛”；4)即使只有一个成分是現代汉語所沒有的复合詞，例如“懦弱”、“書鋪”；5)略写的复合詞，例如“民教館”、“农机站”；6)形态学成分完全或部分地同外語構詞系統有联系的外来借詞，例如“夜叉”、“沙發榻”等等。

但是我們的目的是确定詞的界限，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按上列名詞的标准来把詞加以分类，那是沒有什么意义的。对于我們来說，重要的只是，它們都不是詞組而是單一的詞。

§6 关于宾語的詞义已經消失、或宾語具有所謂“普遍性”的动宾結構的性質，这个問題無論在中国或在我們苏联語言学界，都是一个还在爭論的問題。

有些人把“吃-飯”、“写-字”、“洗-澡”、“打-仗”等类型的結構看作是詞，有些人則看作是詞組。

贊成这种詞彙結構是詞的人，只从詞义的标准出發，④强調說这种类型的复合詞詞干的实体部分不是完全失去了詞义，便是取得了新的、扩大的意义，使复合詞同它構成的詞組区别开来。

前一种論断是完全正确的。汉語确实有很多这样的动宾結構，它們的宾語是完全或部分地丧失了自己的实体意义。例如“打-仗”、“打-架”、“睡-覚”、“洗-澡”等等就是这样。⑤

后一种論断就大有爭辯的余地，因为我們沒有任何根据可以說，一般意义上的“吃飯”同吃煮的米飯的“吃|飯”相比，詞义的扩大只是由于詞組的匯詞化和構成复合詞的結果。我們知道，意思不是“煮的米飯”而是“一般的食物”的“飯”，在汉語中不仅可以跟“吃”連用，而且还可以跟别的动詞連用（例如“作|飯”、“端|飯”等等）。因此，更正确点就应当說，汉語中“飯”（煮的米飯）这个詞同俄語中“хлеб”（面包）这个詞一样，都取得了另外的扩大意义，那种意义也就显現在上述結構中。不但如此，分析一連串的固定动宾結構还証明，發生詞义的扩大运用和成語化的情况，是不太多見的，而且也决不是这种类型的詞彙結構的必要特征（例如“刮|臉”、“唱|歌”、“抽|烟”等等）。

最后，反对这样提出問題的主要論据就是，說按照一个詞义标准来确定詞的界限不能始終一貫。既然我們沒有根据可說詞义的轉变、成語化和扩大就是詞所專有的特性，而不是詞組的特性，那末，我們也不能單單根据这个标准来划分詞和詞組的界限。因此这里也就有必要求助于从語法上来分析現象。⑥

我們知道，动宾結構应当是：1)能够自由拆开，內部既能容納語法要素，也能容納实詞，2)容許宾語換位，即把宾語放在动詞前面，例如“我|吃过|外国|飯”、“沒|飯|吃”，等等。

因此，承認这样的动宾結構是复合詞，就等于承認語言中可以存在句法上能拆开的詞，詞的要素有可能在句子中运用。

---

① 在文言里，表示“論說、学說”意义的“說”这个詞是常見的。

順便指出，可以把“小故事”这个意义照字面写成为“小說”，应当从詞的內部形式方面和它的詞源学方向来看这个意义。現在常常可以見到一种傾向，就是把構成汉語复合詞的組合成分的意义結合起来，而想从其中找出什么“字面意义”，我們認为，这就会使得詞的眞正的意义、实际意义变得不清楚。这种做法就是忽視了詞的內部形式，忽視了詞的詞源学上的意义，結果也就使人怀疑这究竟是不是一个詞。

② “夢想”作动詞的用法見本文第8节。

③ 見Sapir《語言》，1934，28頁。

④ 認为“飯”这个詞在表示一般进餐意义的詞組“吃飯”里，声調已經减弱，这在实驗上并沒有証实。

⑤ 見本文第二章第二节“具有关联意义的詞”。

⑥ 当然，語音标准也重要，不过我們这里把它放在一边不談，因为語法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也能提供相当可靠的結果。

如果这样对待單詞的界限，首先就破坏了詞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詞在發音上的完整性，詞的語音組合的統一性；其次，这也抹杀了形态学范疇和句法范疇之間的界限。

詞就像一个分水嶺，它使形态学和句法的作用范圍区別开来。如果說形态学是把詞当作最大的研究單位来处理，那末在句法来說，詞就是組成句子的最小單位。

事实上，如果把"吃飯"当作單詞，那又怎样解釋例如"我|吃完了|她|給|我|作'的|飯"这个句子呢？

从表面上看，唯一正确的解釋就是，承認这里是用动詞詞干作謂語，而用复合詞的名詞詞干作宾語。这样一来，动詞詞干便具有結果动詞的一切語法特征，而名詞詞干则取决于副句。

但是这种解釋站不住脚是很显然的，因为这把句法范疇和形态学范疇完全混淆起来了。

要想解釋像"有|錢,就|有|仗|打"（茅盾：子夜232）这种句子的句法結構，也会碰到不少的困难。

既然"打仗"是个复合詞，那有什么理由使得它的組成成分互相易位呢？是什么句法或形态学規則引起这样改变位置的呢？

要回答出这些問題是不可能的。因此語法标准便引导我們承認，有必要把上述这种类型的动宾結構看作詞組。前面說过的那些詞組的詞义特点，与其說証明这些詞組的成分已經完全溶而为一，不如說証明它們是熟語。动詞和名詞在这些詞組中所具有的語法特性，也同它們在任何一个普通的动宾結構詞組中一样。例如：

他|作|文章。	我|吃|飯。
他|作了|兩-篇|文章。	我|吃了|兩-頓|飯。
他|从前|作过|中文|文章。	我|从前|吃过|中国|飯。
我|爱|看|他|作'的|文章。	我|爱|吃|他|作'的|飯。
他|作'的|文章|很|有|意思，	他|作'的|飯|很|有|味道，
人人|喜欢|看。	人人|喜欢|吃。

在这些句子里，用作句子成分的有兩个詞：动詞和名詞，它們可以容納自己独具的語法形式，而毫不破坏結構。

根据上述理由，凡是在言語中可以拆开、內部可以容納單詞的固定动宾結構，我們的辞典里都把它們当作詞組来看待，并且提出了它們所組成的熟語；如果它們是由具有意义联系的詞①組成的，还另外列成一条，以特殊的标志注明。

在研究是否可以承認能拆开用的詞彙單位为單詞的問題时，我們当然不能忽視拆开以后又在中間插进个別的实詞，同拆开以后在中間插进丧失实体意义而語法化了的成分，是有原則性的区別的。如果非常有限的几个一定的語法化成分系統地出現在一定語法范疇的詞彙結構內部，而且这时永远帶着同样的語法意义，那便意味着我們面前的現象就不是拆开，而是中綴附加。把某个語法成分加进詞的組成中去，是服务于構形的任务的，这并不能破坏詞的完整性。在汉語中中綴附加的例子就是：可能或不可能取得結果动詞的行为結果的形式。

在这方面又产生一个問題：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样的动宾結構：它們的詞彙化走得那么远，以致只有依靠动詞后綴才能拆开，并且既不容許宾語换位，又不容許給它加定語，是不是有根据也把它們看作复合詞而不是詞組呢？

在实际上，像"洗|澡"和"畢|業"这样的詞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如果說"洗|澡"这个詞組完全可以自由拆开，例如說"洗了|澡"、"洗过|澡"、"洗着|澡"、"洗洗|澡"、"洗|个|热|澡"、"澡|都|沒|地方|洗"等等，那末"畢|業"这个詞組实际上只有借助于"了"这个体-时后綴才能够拆开，例如說："畢了|業"。

由此可見，假定汉語中存在着这么一种出自动宾結構的复合动詞范疇，其中体-时关系在語法上是利用中綴成分"了"来表示的，那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不过要驗証这条假設，就得进行專門的研究，而且要研究大量的材料，还得放在历史的范圍內加以考察，因为我們得确定这种現象是不是同行为的純語义方面有联系，它是不是由于动詞丧失了利用除"了"以外的其它体-时后綴構形的能力，而仅仅是詞組轉化为詞的中間阶段的一个特征。

沒有經过这样的驗証，暫且就沒有根据把"畢|業"这样的結構算作詞，因此在我們这部辞典里，它們是同"洗|澡"一样当作詞組看待的。

当然，根据上述还不能得出結論，說汉語中根本沒有詞干具有动宾关系的复合动詞。这样的动詞是有不少的。其中我們可以找到不及物动詞，例如："張罗、服务、道歉、动身"；也可以找到及物动詞，例如：

"得罪——得罪人"，"关心——关心我們"，"請示——請示办法"，"注意——注意这个"，"动員——动員人力"，等等。

所有这些不能拆开的詞彙結構，②都是动詞后綴按一般規范加在詞干后面形成的，虽然复合詞干的第

① 見下文第16节。

② 有时也能碰到"服|个|大|务，努|一|把|力"这样的用法，这就像"貪了|一点|污"或"体了|操"一样，是不合現代汉語規范的。中国的語言学家非常正确地建議把这些东西看作俏皮話。参閱鐘梫对鐘本康一封信《"打仗""打架"是不是詞》所作的簡短而又內容深刻的回答（見《中国語文》1955年8月号），又見曹伯韓写的一篇文章：《应当建立詞的观念》（見《中国語文》1952年11月号）。

改变文風要从說話做起

葳　甫

在一次座談会上，我曾經如实地記录了下面的兩段發言，一段是这样講的：

从大的时候的原則上討論的时候，我原来的时候的意見的时候，恐怕的时候是粗糙的。

另一段是这样講的：

不过这个不是这个会議的这个一部分，这个会議是由这个兩个單位这个召开的，我們这个过去有的时候不能这个这样做。

据說，这是小毛病，沒有多么大的关系，正所謂無关宏旨，也無伤大雅。因为这是屬于"口头語"之类的东西，"口头語"不过是在說話的时候習慣了，写文章的时候就不会句句"的时候"和"这个"了。再說，这大約也可以算做"語言風格"吧，人人自有其"風格"，人人的語言也自有其"語言風格"，这不也是很好么？

我看不行。这不是"語言風格"，这和文風有关系，这是个思想問題。

这是个什么思想問題呢？就是不重視語言的社会性，不重視語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由于不重視語言的社会性和語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說話的人便懶于或不肯把內容和形式和諧地統一起来。

改变文風要从改革思想做起，我們要求在改变文風方面，应当首先重視表达思想感情的語言的运用。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小善，可以不为，或者認为"的时候"和"这个"是小惡，而不妨为之。

二部分在这里是实体性的。至于說到为什么把它們算作詞而不是詞組，那正如上列例子表示的，首先是决定于它們的詞干某一部分或兩部分失去了單詞的特性(見§5所述的标准)。

在考察动宾結構的时候，我們也会碰到这样的事实(尽管是很少見的)：当詞組轉化为詞的过程已經导致單詞产生的时候，产生这个詞的詞組还会同时在語言中使用。

例如俄語的"Не перебивай меня"，在汉語就有兩种說法："不|要|打岔|我"(巴金：«長生塔» 9頁)和"不|要|打|我的|岔"。俄語的"отпусти меня"(убери твои руки)，在汉語也有兩种說法："你|撒手|我"(老舍：«龙鬚溝»61頁)和"撒|你的|手"。

在动宾結構后面能够用直接宾語，就証明这种語言中已經形成了一种詞，这种詞的諸成分之間的动詞-实体关系，已經不是当作兩个独立詞(名詞和支配它的动詞)的結合，而是当作詞的內部形式来理解的。在另一方面，产生这个新詞的詞組仍然繼續存在，保留着在句中联系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不过要是复合詞和原来的詞組在語言發展过程中詞义有了分化，那末它們就表示着不同的概念，而帶着各自的意义在語言中分別固定下来。这种詞义分化的例子就是：作为詞的"革命"和作为詞組的"革|命"(革某人的命)。

应当指出，也有人認为，說动宾結構可以拆开就証明它是詞組的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他們論証自己的观点說，若是这样处理問題，像"革命"这样的詞彷彿也应該算作詞組，因为我們可以說"革了|他的|命"。①

这样提出問題本身就很机械。單詞"革命"和詞組"革|命"只是在詞源上有联系。应当認为，現代汉語中的"革|命"是早在«易經»上就已見到的固定詞組"革|命"("革天命"，亦即"改朝換代")②意义轉換的結果，其中"命"(天命)后来在"民間語源学"的基础上为它的同音詞"命"("生命、命运")所排挤了。在現代汉語中，詞組"革|命"实际上是同"要|命"("就要了咱們穷人的命"，見老舍«龙鬚溝» 17頁)、"救|命"("这碗热水救了老命嘍"，見老舍«龙鬚溝» 7頁)和"拚|命"("我要不跟他拚命，我就改姓"，見老舍«龙鬚溝» 3頁)这样的动宾結構的詞組毫無区別的。

至于"革命"这个詞，就不能把它擺在这一类。它具有完全不同的詞彙意义，这說明应当列入另一类詞彙單位，它在句子中的运用和联系也說明这一点，使人并不怀疑那就是名詞。复合詞"革命"的兩个部分同構成詞組"革|命"的詞之間是有質的差別的，这种差別在語法上的表現，只要一看"革命"这个詞可用副句限定(如"俄国|無产阶級|發起'的|1905|年|革命")就可發現，而按汉語句法規則，那样的定語在动宾結構詞

① 見前面提到的鐘本康那封信，載«中国語文»1955年8月号，41頁。

② 見«易經，命卦彖傳»。

組是不能有的。

綜上所述，可見汉語中除了复合詞以外，还存在派生这种复合詞的詞組。不管这些复合詞和詞組在意义上是不是相同，我們这部辞典都把它們分别列出。自然，只有在它們是熟語的时候，我們的辞典就把它們当作詞組。

§7 关于汉語的結果动詞問題，是我国汉学界研究得最为徹底和闡明得最广泛的問題之一。这类动詞是由鄂山蔭教授最先發現并加以詳細描写的。① 后来几乎在所有苏联汉学家的論著中，都对結果动詞有所論述。

例如，这里可以举出龙果夫的《现代汉語語法研究》、雅洪托夫的《汉語中的动詞范疇》等專著和專門探討这一問題的、T. P. Zadoyenko 所著的《现代汉語中的結果动詞》等。

在上述著作中，对于結果动詞的分类、对于結果动詞第二个要素的性質的看法（后綴、結动詞詞素等等），以及其它許多問題，是存在着不同意見的。不过所有的研究者都一致同意，这种类型的詞彙結構是單一的整体，是詞。②

近年以来，这种看法得到越来越多的拥护者，其中也有中国的詞彙学家。例如鐘棱、胡附、文煉③等人就堅决主持把結果动詞看作是詞而不是詞組。呂叔湘教授則認为它是介于詞組和詞之間的。④

考虑到这个問題可說已經研究得相当透澈了，在积極意义上来說可算已經解决了的，因此在我們的辞典里，就把結果动詞列为單詞。

§8 "…在两个要素都等于表示独立的思想对象，并且沒有完全丧失自己独立意义的詞的时候，構詞法总是采取所謂詞的复合的形式。詞的复合本身是可以有这种或那种表現的。表現可能是形态学上的（所謂印欧語的"联結元音"等），可能是語音学上的（例如重音、元音和諧等），也可能是句法上的（例如詞序）"。⑤

大家都承認，正是詞的复合在許多世紀以前就是，而且今天仍旧是汉語最能产的構詞手段之一。

但是，必須把实詞詞素参与組成的，在现代汉語中已經丧失單詞性質的复合詞，同两个要素与现代汉語中的詞相同的复合詞区别开来。

前一种复合詞，我們在論述确定詞的界限时已在第5节中分析过了。

后一种复合詞我們將在下面加以探討。我們称其为复合詞(composita)，就把对于这个术語的一般理解縮小到合成詞的概念，它的两个部分在现代汉語中都是有它独具的特性的單詞。

要确定固定詞組同复合詞（composita）之間的界限，对于汉語来說是有很大困难的。

謝尔巴院士写道："应当特别着重指出，在缺乏明确的形式表現的时候，要确定在每种'言語'(parole)的情况下究竟我們碰到什么东西——是形态学的構

---

① 見鄂山蔭《汉語中的詞和詞类》，博士学位論文，1946,218頁及以下。

② 在鄂山蔭、雅洪托夫、Zadoyenko的著作中有專門証明这一原理的研究。

③ 鐘棱：《談怎样分别詞和語》，《中国語文》1954,30期；胡附、文鍊：《詞的范圍、形态、功能》，《中国語文》1954,26期。

④ 《中国語文》1954,27期，13頁。

⑤ 謝尔巴：《語言学的經常性的問題》，《苏联科学院通报，語言文学部分》，1945,No 5，181—182頁。

談"何物"

田树生

在魏晋时代，"何物"不是講作"什么东西"而是"什么"。《后汉書，禰衡傳》："死公亡等道"注云："死公，駡言也。等道，犹何勿語也"。作注的是唐太子李賢，李賢去魏晋未远，当是可信的。刘攽云："按注，勿当作物。……何物者，犹言'何物老嫗'；古語如此者多。"可見"等道"即"何物"。"等道"应解作"什么"；"等，犹底也；何也。"①則"何物"也就是"什么"。如：

陆遜、陆抗是君何物？（世說新語，方正篇）　牛屋下是何物？（世說新語，雅量篇）

所牧何物？殆非眞猪。（孙綽，商丘子贊）　何物老嫗生此宁馨兒？（晋書，王衍傳）

刘世儒先生把"陆遜、陆抗是君何物？"的"物"字与"何"字分开，講作名詞；似乎未妥。② 在一个高唱以孝治国的时代，盧志問陆机的先人是什么"物"，在情理上很难講得通；况且陆机着惱的不是因为盧志用詞不当，而是"我父祖名播海內，宁有不知？鬼子敢尔！"則"物"不該是名詞；否則"何物老嫗"該如何解釋？解作"什么老嫗"就貼切多了。"何物"是个疑問代詞，不能拆开。

---

① 《詩詞曲語詞彙釋》，108頁。

② 《論略魏晋南北朝系动詞"是"字的用法》，見《中国語文》1957年12月号，19頁。

詞，是复合詞还是句法群——有时是非常困难的”。①

不过复合詞（composita）的結構应当有它的形式表現，才能証明合成詞各部分同構成句法群的詞之間的关系是有質的差別。不承認这种形式表現的必要性，这就替那种把任何具有邏輯連系的詞和固定詞組算作复合詞的做法大开了方便之門。

我們在汉語中究竟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形式手段来表現复合詞的統一性呢？

分析材料証明，汉語中的合成詞是有語音或句法特点的，而且这些表現复合詞諸部分的統一性的手段，往往是（但不一定是）处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之中的。

合成詞的完整性在語音上的特征，就是重音的統一性，而且一般都伴隨着詞的非重讀部分声調的減弱以及詞义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失。

这样的詞就有：“讓步、用处、考試、出卖、同人、熟人、眞正、作用”（着重点重讀）。不过这种特征不能認为是可逆的：如果說單一重音的存在可以作为詞的特征，那末存在兩个重音就决不能証明我們这里碰到的不是詞而是詞組。

L. R. Zinder 教授写道：“在大多数具有詞的重音的語言中，簡單的詞总是以一个重音为特征的。但是在一个詞中，也可能有兩个重讀音节存在。瑞典語的情况便是这样…，因此瑞典語的詞在俄罗斯人听来就像分成了兩个詞…。在复合詞中使用兩个重音的情况是特別普遍的。例如在德語中总是这样。对于俄語来說，这就幷不是必然的；如：паровоз（机車），пароход（輪船）、водопровод（水道管）就只有一个重音，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而像 радиолокация（無綫电測位）、электропроводка（电綫網）等等这样的詞，就可能有兩个重音”。②

实驗結果証明，汉語中旣有帶單一重音的詞，也有帶双重重音的詞。例如“丈夫”、“衣服”、“豆腐”、“媳妇”等詞，③特点就是重音明确地落在第一个音节上面，而在第二个音节中，元音几乎全都弱化了。

与此同时，在“人民”、“中央”、“說完”等这样一些詞中，兩个音节都是重讀的，也幷沒有丧失自己的声調色彩。④

显然可見，这也就是为什么汉語詞的实詞性部分“在俄罗斯人听来就像分成了兩个詞”，因此在俄罗斯的汉学家当中引起不断的爭論，究竟那个音节是重讀的。

概括地描繪汉語的重音本質、揭示重音之間的互相关系及其与“声調”和变調的联系等等，这些都还有待研究，对于我們来說，这里重要的只是，一个意群当中有兩个重讀音节存在，幷不能証明那就是兩个單詞。

現在我們根据謝尔巴院士关于詞序是詞的复合的形式表現的指示，来看一看汉語的句法手段。

在汉語句法中，詞序是表示詞与詞的关系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破坏了詞序（句法規范），就証明在这种情况之下詞与詞之間已經形成了与句法关系截然不同的形态学关系，它把原来的詞变成了合成詞的成分。

換句話說，在某个“言語單位”（意群）內部具有不符合句法規范的特別詞序，那就是复合詞的形式表現或者特征。⑤

但是，这还不是問題的全部。也常有这样的情况：复合詞諸部分的內部关系是与句法規范完全相符的。不过，合成詞的統一性和完整性究竟还有它自己句法的表現和形式的表現：复合詞的句法功能是与簡單詞的运用規范相吻合的（与簡單詞所屬的詞彙-語法范疇相应），因此，它又是同詞組的运用規范有区別的。試圖研究像句法群这样的复合詞，那一定会碰到句法上有許多难以解釋的反常現象。

当然，对于諸部分內部关系本身与句法規則相矛盾的复合詞，这条結論也是适用的。

（本节未完，**黃振华譯**）

---

① 同上，184 頁。

② L. R. Zinder：《普通語音学》，博士学位論文，列宁格勒，1954，586 頁。

③ 实驗用的例子取自刘澤先：《北京話里用四声区別同音詞問題的实际考察》，《中国語文》，1953 年，总 8 期，4 頁。

④ 但是应該指出，重音的質不是經常一样的，有时一个重音强一些，起主导作用，另外一个弱一些，次要些。显然，在重音的这种相互关系中也表現了复合詞的統一性。

⑤ 在 1939 年出單册的《北京話單音詞詞汇》的序言（1956 重印）中，陆志韋首先指出特別詞序可以作为汉語复合詞的标志。

（上接 246 頁）

当然，黃氏治学也不是沒有他的局限，比如講經学則篤守汉唐傳注正义，說文字則屛弃殷商甲骨卜辞。固然“不如是不足以断倚魁之說”（章太炎：黃季剛遺著序），但如果不那样固执，学术成就豈不是要更大一些？（編者按：黃氏晚年曾致力于甲骨卜辞及款識之学，曾对人談过他用这些資料考証文字很有創获，可惜沒有来得及整理發表。）

至于他認为讀古書还来不及，諄諄告誡学生要爭取时間讀古籍中的基本書，而幷沒有鼓励过人們要联系当时的語言文字的实际問題来研究学問，似乎只是要人們为讀古書而讀古書。他这种“厚古薄今”的观点和做法，对他本人說来，是受了历史条件的限制所致；对我們說来，正是要引为鑒戒，不足为法的。虽然这样，黃氏治学的勤謹，对專業的热爱，以及严格地要求著作質量的精神，以至于他的古音学的某些方法和論点，值得我們学習的地方还是很多。我們在这里对黃氏的生平和他的古音学說作一簡單的介紹，幷不是沒有意义的。

詞的多义性跟詞义演变的关系和区别

孙 良 明

周祖謨先生在講詞的多义性的时候，談到詞的引申义的多种多样情况。一种情况是"詞的原义跟别的意义內容相类似、相接近"。举例說：

> 比如"薄"是"厚薄"的"薄"，这是一般应用的意义，但是我們可以說"薄酒"，"薄田"；"薄酒"是味淡不濃的酒，"薄田"是不肥的田。"不濃"，"不肥"就是引申意义。

一种情况是"用原来具体的意义轉到指其他現象类似的事物上去"。举例說：

> 比如"軌"是"車軌"的"軌"，車的軌轍有一定的寬度，車走起來也是要按照一定的軌轍来走的，因此把应該遵循的规則也叫做"軌"。我們說"步入正軌"、"納入正軌"，"軌"用的正是这个意义。①

周先生在講詞义演变的时候，說詞义的扩大有这么一种类型："兩种事物的特征、性質或功能相似，用原来指某一种事物的詞称呼另外一种事物，因而詞的意义有了新的成分。"②关于这点，周先生举了不少例子，摘录其中的兩个：

> "口"就是嘴，是动物吃东西和發声的器官，这是最初有的意义，可是后来把出入的通路也叫做"口"，如海口、港口，把破裂有空隙的地方和器物上內外相通的部分也叫做"口"，如伤口，瘡口，炮口、瓶口、于是"口"有了广泛的意义。
>
> "根"是植物莖干最下端吸收养分的部分，指树根，草根而言。扩大了，事情的本原也叫根，例如刨根問底、禍根、病根。

根据周先生的講解和举的例子，我們看不出詞的多义性跟詞义演变有什么区别。把"口"、"根"这兩个例子放在詞的多义性里也未尝不可，因为口的"原义跟别的意义內容相类似"；"根"是用"原来具体的意义轉到指其他現象类似的事物上去"。

这个問題，何霭人先生也沒有講清楚。他在《普通話詞义》一書的"詞义的發展"这一节里，共分了三部分：1)詞义的引申，2)詞义發展演变的三大規律，3)詞的形式变化的兩个特点。这样的分法使人得出的結論是：詞义的引申(即何先生說的發展)就是詞义的演变。換句話說，詞的多义性即等于詞义的演变。这样把兩个問題混淆在一起，更难使人了解它們的关系和区别。

尤其令人难懂的是，同一个例子在不同的書上放在不同的地方。"睡得很香"里的"香"的用法，周祖謨先生認为是一詞多义的現象，而何霭人先生却認为是詞义的扩大。再如"选手、好手、能手、水手"和"手边、手头"的"手"的用法，周祖謨先生認为是詞义的扩大，而張世祿先生却認为是詞的多义性。③还有这样的情况，同一个例子在同一个人的著作里出現在兩个地方。如"苦"是"苦味"的意思，又有"劳苦"、"辛苦"的意思，張世祿先生講詞义演变的时候用它，講詞的多义性的时候又用到它。④

上面这些看来矛盾的現象如何解釋，这牽涉到詞的多义性跟詞义演变的关系和区别的問題，前面的著作里都沒有談到。这里談談我个人的意見。

詞的多义性是指一个詞在現代語言中使用的情况，有几个意义；詞义的演变是指一个詞古今意义的变化。前者是从横的方面看，后者是从縱的方面看。詞义演变的三个規律——扩大、縮小、轉移——是根据原义、新义的存廢情况和原义、新义相較的范圍大小而定。在長期的社会使用中，表示甲义的詞增添了乙义、丙义或更多的意义；新生的意义和原义相較或者是并列关系，或者是种屬关系——新义范圍較原义大。这样一个詞有了更多的意义，使用范圍扩大了，是詞义的扩大。这些意义又都存在于現代語言里，即造成了詞的多义性(屬于种屬关系的原义有的死掉，这就不能造成詞的多义性)。产生的新义和原义相較屬于另一种种屬关系——新义范圍較原义少，即是詞义縮小的情况。在詞义縮小的演变規律中，原义往往死掉。如果原义沒死，新义、原义均保留在現代語言里，也就产生了詞的多义性。产生的新义和原义相較是并列关系，但新义产生后原义死亡，这就是詞义轉移的演变規律。詞义轉移的演变不能創造一詞多义的現象。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詞的多义性是詞义演变造成的，是一个詞在長期社会使用中所产生的意义的积累。

我們可以用这样的兩句話来說明二者的关系：詞的多义性是詞义演变的結果，但詞义的演变不一定造成詞的多义性。詞义演变的規律有三，每种之中又有不同的类型。但并不是說一个詞的意义演变只遵循一

---

① 見《語文学習》1955年8月号。下引不另注。

② 見《語文学習》1955年10月号，30頁。下引不另注。

③ 《小学詞彙敎学基本知識講話》，31、32頁。

④ 《語文知識》1956年6月号，19頁。

个規律，即使按照一个規律演变也有不同的类型。因而多义詞的几个意义之間的关系有的是并列的，有的是种屬的。同时，多义詞的本义不一定就是詞的原始意义。所以，詞的多义性跟詞义的演变有着明显的区別，但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是錯綜复杂的，下面就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說明。

“写”这个詞在《說文》中的解釋是“置物也”，从該書中对“吐”（“写也”）的解釋来看，可以知道“写”即今天的“瀉”。由“置物”的“写”产生了“輸洩感情”的“写”，如《詩經》中的“駕言出游，以写我憂”。“由輸洩感情”的“写”又产生了“描画”的“写”，刘向《新序》中所載《叶公好龙》的故事有这么几句：“叶公子高好龙，鈎以写龙，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現在說“写生”还保留着这个意义。至于“写字”的“写”又是后起的了。先前的那些意义都沒有保存到現在，不屬于同义的扩大，是詞义的轉移。这就沒有产生詞的多义性。“中国”这个詞最早的意思是指中間的地方。春秋战国前，汉人居于黃河流域，認为“蛮夷胡狄”居四方，而已国在中，因而称为“中国”，如《詩經》中說：“惠此中国，以綏四方。”再往后，“中国”指中原而言，《資治通鑒，赤壁之战》中說：“驅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間，不归水土，必生疾病。”至于表示全国范圍的“中国”又是后起的了。后起的意义范圍較原先的意义范圍大，屬于詞义的扩大。但旧义沒有跟着新义一道保留下来，沒有造成詞的多义性。“河”本是黃河的專称，《說文》中說：“出敦煌塞外，昆侖山發源注海。”《尔雅》中載：“河山昆侖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現在“河”泛指一切的河，新义、旧义是种屬关系，是詞义扩大的演变，但旧义今不存，也沒有产生一詞多义。“工夫”、“功夫”过去沒有区別，本指工人，《晋書，范宁傳》：“自置家庙，皆資人力。又夺人居宅，工夫万計。”①“工人”产生“工程”的意思。由“工程”又产生“努力”、“修养”、“时間”等意思。“功夫”一詞有了几个意义，是詞义的扩大，这些意义又都保留到現在，造成了詞的多义性。“口”本是嘴，《說文》中的解釋是：“人所以言食也。”它本是人体的一部分，現在說“老兩口、小兩口四个人”，“口”指人。这个演变是种屬关系（由部分到全体），屬于詞义的扩大，現在原义仍然存在，产生了詞的多义性。

“走”，《說文》上說：“趋也。”《釋名》上說，“徐行曰步，急行曰趋，急趋曰走。”从表示“跑”到“走路”的“走”，是詞义的轉移，沒有产生詞的多义性。走路要移动，于是有“改变的意思（走样子了，走了嘴）。这些意义都是在長期社会应用中产生的，一直保留到現在，是詞义的扩大，也造成詞的多义性。过去“手”、“拳”不分，《說文》：“手，拳也”，“拳，手也”。今天“手”不包括“拳”，是詞义的縮小，沒有产生詞的多义性。由劳动的“手”产生“行动”的意思，如“着手”、“入手”，又产生“近旁”的意思，如“手边、手头”。从“手足”的“手”又产生表示“人”的“手”，如“能手、选手、旗手”等，这是由部分向全体的發展。“手”有了几个意义是詞义的扩大，同时也造成了詞的多义性。

从以上这些例子可以具体地看出詞义演变跟詞的多义性的关系多么密切和复杂。

最后一并談談周祖謨先生对兩个問題的看法。

第一，关于什么是詞义的轉移，周先生說：“詞义的扩大和縮小都是就着一个范圍而發生的变化，假如由甲范圍而变到乙范圍去了…这都是詞义的轉移。”拿周先生举的例子来看，表示“秤錘”的“权”到“权衡輕重”的“权”，是詞义的轉移，而表示“农作物的收成”的“收穫”到表示“学習或研究有所得”的“收穫”就是詞义的扩大。我認为区別詞义演变的扩大、縮小、轉移三个規律，不能从詞义在一个范圍內或兩个范圍內演变来看（当然，屬于种屬关系的演变可以这样說），因为詞义的扩大也有从甲范圍变到乙范圍去的。詞义轉移規律的主要特征在于新义产生后旧义不存在，从表示甲义改变成表示乙义（屬于种屬关系的詞义演变旧义也有死亡的）。关于这点除了上面举的那些例子可以說明外，我們再拿“道”和“連”的演变来証明。《說文》：“連，負車也。”段注：“負車者，人輓車而行，車在后如負也…人与車相屬不絕，故引伸为連屬字”。关于“道”，《說文》是“所行道也”，段注：“道者人所行，故謂之行，道之引伸为道理，亦为引道。”“道”和“連”的演变情况完全一样，都是从甲范圍轉到乙范圍，可是前者我們称为詞义的扩大，后者称为詞义的轉移。这是因为“連”的原义不存在，而“道”的原义仍保留到現在，一个詞有了几个意义，使用范圍扩大了。

第二，周先生說：“詞义扩大的类型很多，如上一节所講到詞的‘轉义’，也就是詞义在历史發展中的一种扩展。”我認为这样說法是倒果为因。前边說过，詞的多义性（即詞的“轉义”）是詞义在長期社会使用中意义演变的積累。詞义的演变造成了詞的多义性，而不是詞的多义性構成了詞义的演变。

为了更好地解釋詞的多义性和詞义演变的关系，我們还可以从語言中的兩种相对的現象来比較。跟多音詞相对的是同形同音詞，跟詞义演变相对的是文字上的假借字。不能把同形同音詞看作是多义詞，也不能把文字上的假借看作是詞义的演变。詞义的演变产生了多义詞，文字上的假借产生了同形同音詞。

---

① “工夫”指“工人”，还保留在方言里，如《說說唱唱》1954年11号的柳腔剧《寻工夫》。

清代古音学研究的殿后人黄侃

——中国語言学史話之八——

彭炅乾



一

清代的古汉語語音研究工作是从顧炎武开始的*。中間經过江永、戴震、段玉裁、錢大昕、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誥、严可均、刘逢祿、黃以周等人的努力，在声母古讀上固然明确了重大問題，①在古韵分部方面，更是一步步推向細密。② 到清末，章炳麟又补充解决了一些問題，并具体描写了每一韵的音值，③眞所謂"前修未密，后出轉精"。最后給这二百五十多年的古音研究作出一个基本总結来的，則是黃侃。

黃侃(1886—1935)，字季剛，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蘄春人。他的父亲黃云鵠，做过清末四川鹽茶道，写得一手工整的顏字，是一位講理学的老先生。

黃氏的青年时代，正当淸帝国总崩潰的前夜。和当时一些有志气的青年一样，他有着强烈的民族革命思想，并組織过蘄黃一帶的实际反淸斗爭。因为淸政府的緝捕，亡命到日本。这时章太炎先生正好在东京講学，他就参加国学講習会学習，做了章氏門下的大弟子。辛亥革命后回国，历任武昌高等师范、北京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教授，前后二十多年。

1935年陰历重陽节，从旧俗飲酒賦詩，登南京鷄鳴山。回家后，急患胃出血症，还不肯休息，力疾校書。等到病势轉剧，已無法医治，第二天就与世長辞了。

黃氏自幼能辨音韵，讀書又能刻苦用功；研究問題，非得到解决不肯放手。他虽然出身于一个理学家庭，却沒有繼承家学，而是把他的畢生精力集中到汉語声音文字的研究上，从而在古音学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結束了自顧炎武以来的古音研究工作，成为我国学术界多数承認的清代古音学的殿后大师。

黃氏尽管在資产阶級民主革命中有过表現，后来却無意作官。他对北洋軍閥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是沒有好感的。早年在北京，曾有人邀他去做东三省宣撫使的秘書長，不到三个月就走了。他平生欽佩刘师培的学問，曾以师礼事刘，但1915年，袁世凱想做皇帝的时候，刘师培参加了准备大典的"籌安会"，黃侃馬上宣布和他絕交。直到刘氏失意家居，才又恢复交誼。

他的晚年是在南京度过的，一面繼續研究学术，一面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教書。这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敗，他的憂憤隨着外患的加剧已达到不可抑制的地步。他不但拒絕了一批远道来学的日本学生(因为其中有些并非眞的学生，而是文化特务)，同时还經常給当时的統治者以無情的譏刺和怒駡。他逝世前一日留下的絕笔詩写道：

> 秋气侵怀正郁陶，兹辰倍欲却登高。
> 应將叢菊霑双泪，漫借清尊慰二毛。
> 青塚霜寒驅旅雁，蓬山風急抃灵鼇，
> 神方不救群生厄，独佩萸囊未足豪！

从这首詩所表現的思想感情看，就可以知道这位学者对人民关怀和对反动統治者的憎恨了。

黃氏一向被人看成一个玩世不恭的狂生，但他做学問是一点也不狂的。他不肯随便著書，認为讀古人書还来不及，何必忙着去發表；到五十岁，搞大著作也不迟。誰知剛到这个年龄，就丢下許多手稿而去了！他平日諄諄告誡学生要爭取时間讀基本書，他自己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像《說文》、《尔雅》、《广韵》这些書，簡直沒有一日去手，④多的反复鑽研几十遍，少的也是十几

---

* 参看本刊1957年6月号《清代的古音学創始人顧炎武》。

① 参錢大昕《十駕齋养新录》卷五《古無輕脣音》、《舌音类隔之說不可信》兩条。錢氏的其他古音学說，見《潛研堂文集》卷十五《答問》十二。

② 諸家的古韵分部：顧十部，江十三部，戴九类二十五部，段十七部，孔十八部，王念孙、江有誥各二十一部，严十六部，刘二十六部，黃以周十九部。

③ 章氏的古音学說，詳《国故論衡》卷上：《小学略說》、《成均圖》、《音理論》、《二十三部音准》、《古音娘日二紐归泥說》、《古双声說》諸篇。

④ 錢玄同《林尹中国声韵学通論序》說："黃君既邃于小学，声韵尤其所專長。《广韵》一書，最为精究，日必数檢，韋編三絕，故于其中义蘊闡發無遺。"

遍，眉批夾注，朱墨杂施，加上各式各样的符号，那种辛勤的劳动，教人敬服。可惜那些遺稿，至今还沒有人整理出来。已經刊布的專著和單篇論文，和語言学密切相关的有《声韵略說》、《說文略說》、《尔雅略說》、《春秋名字解詁补誼》、《談添盍帖分四部說》、《广韵声势及对轉表》、《音略》、《声韵通例》、《与人論治小学書》、《詩音上作平証》、《集韵声类表》等十余种。①其中《音略》、《声韵通例》、《与人論治小学書》等，都是他集中表現古音学說的文章。下边的介紹，主要的就根据这几种。②

二

黃氏研究古汉語語音，是結合考古、审音，結合古韵、今韵、等韵来进行的。他說：

> 从前論古韵者，專就《說文》形声及古用韵之文以求韵部，專就古書通借字以求声类，而于音理或不了然。是以古韵家所作反切，往往世無此音。至于錢竹汀，音学之魁碩也，能知"古無舌上"，为一大發明矣，而云古舌齿互通，泯五声之大界；严鉄桥亦古韵之專家也，能知十六韵类展轉皆通，而絕去一切牽强之条例矣，而云《广韵》分部多誤。至于今韵之家，不为字母等韵之学所拘攣，卽自我作古而为种种怪异之論。于是今声古韵永無溝合之时，而声韵条例竟無从建立。（声韵略說，論声韵条例古今同异上）

这是說，声有声类，韵有韵类，因为有音变而泯乱它們內部的界限是不对的。古今汉語只是一个体系的發展，利用中古韵書，結合其他材料，詳推音理，就能找出古今音的發展規律。

从这个基本認識出發，他就在陈澧《切韵考》的基础上，再詳細归納《广韵》的切語上字和下字，找出声母四十一类，韵母七十二类。③接着又發現这四十一声类中有"古本声"，有"今变声"，七十二韵类中也有"古本韵"和"今变韵"，④而那些"古本韵"不用輕唇音、舌上音作切語，因此知道凡"古本韵"的切語上字必定是"古本声"。他說：

> 古声类之說，萌芽于顧氏。錢氏更証明"古無輕唇，古無舌上"。本师章氏証明"娘、日归泥"（自注：此理本于《切韵指掌圖》、《切韵指南》，而兴化刘融齋亦能証明）。自陈蘭甫作《切韵考》，划分照、穿、床、审、禪五母为九类，而后齿舌之界明，齿舌之本音明。大氐古音于等韵只具一四等，从而《广韵》韵部与一四等相应者必为"古本韵"，不在一四等者必为后来"变韵"，因求得古声类确数为十九。（尔雅略說）

这十九类古本声如次表（今变声旁注）。通过这四十一声类正变的分析，不但証明了錢、章二氏古声学說的正确，同时还解决了他們沒有解决的問題。因此，他的老师章氏說这是一項發明，⑤而国內講古声类的，或奉为定論。（編者按：黃侃在《音略》中只談到他的古韵二十八部是綜合淸儒的說法，而沒有提到古声十九紐的根据。其实清人鄒汉勛对古声紐早有类似的說法，然而語焉不詳，只存綱目，黃侃也許曾經受到鄒汉勛的啓發。）

喉　音	牙音	舌　音	齿　音	唇音
影喩为	見	端知照	精庄	帮非
曉	溪群	透徹穿审	清初	滂敷
匣	疑	定澄神禪	从牀	并奉
		泥娘日	心疏邪	明微
		来		

考出了古本声，再从声韵互相影响的認識出發，回过头来推求《广韵》中的古本韵，他說：

> 韵部多少，古今有异也。《广韵》中諸韵，但有十九声者，皆为古音（除上去兩声不用），又以开合同类者并之，得二十八部。其在陰声，曰歌、灰、齐、模、侯、蕭、豪、咍；其在入声，曰曷、屑、沒、錫、鐸、屋、沃、德、合；其在陽声，曰寒、先、痕、青、唐、东、冬、登、覃、添。自此以外，皆为今音。《切韵》共分二百六部（此中更应分类，有一韵一类者，有一韵之中含有数类者），若用分类法，更加对轉法列之，实有七十二类。以校古只有十二类者，則繁变多矣（歌一、曷寒二、灰沒痕三、屑先四、齐錫青五、模鐸唐六、侯屋东七、蕭八、毫沃冬九、咍德登十、合覃十一、怗添十二）。⑥（声韵略說，論声韵条例古今同异下）

这是因为《广韵》中的古本韵都用古本声作切語上字，⑦而《广韵》韵部与一四等相应者必为古本韵，于

---

① 《集韵声类表》有开明書店影印手稿本。其余均見中央大学《文艺叢刊》二卷二期《黃季剛先生遺著專号》。这些著作多半是他早年的講义。1927年黃氏到东北大学之后，因受曾运乾先生的影响，对他的这些学說有所修正，不过沒有成系統地整理过。

② 本文所述黃氏行誼，主要根据章炳麟《黃季剛墓銘志》、汪东《蘄春黃季剛先生墓表》、黃念田《先府君行述》。

③ 七十二韵类表，詳《音略》，文繁不录。

④ "今变韵"，意思是从"古本韵"發展出来的韵。

⑤ 章氏《菿汉微言》："黃侃云：'歌部音本为元音，观《广韵》歌戈二韵音切，可以証知古紐消息，如非、敷、奉、微、知、徹、澄、娘、照、穿、牀、审、禪、喩日諸紐，歌戈部中皆無之，卽知是古音矣。'此亦一發明。"

⑥ 黃氏認为歌部的音是最基本的音，故單列一类。其实歌、曷、寒三韵的主要元音相同，只曷部帶塞尾，寒部帶鼻尾。并起来是十一組。

⑦ 黃氏曾举出例外字（十之九为生僻字）十五个，并作了解釋："…凡此变音，杂在本音中，大氐后人增加，綴于部末，非陆君之旧。不可执是以譏鄙言之不驗也。"（与人論治小学書）

是以声求韵，以韵考声，反复証明，得出古韵三十二部。其中歌戈、曷末、寒桓、痕魂本是四韵，在《广韵》里因为它們兼有开合而分立，兩兩合幷，就是二十八部了。

这二十八部的考定，在方法上，固然与过去主要分析古韵文和《說文》声类的傳統方法迥然不同；而在处理旧有成績上，更是擇善而从，吸收了諸家的合理部分。他說：

> 古韵部类，自唐以前，未尝昧也。唐以后始漸茫然。宋郑庠肇分古韵为六部，得其通轉之大界；而古韵究不若是之疏。爰迨清朝，有顧、江、戴、段諸人，畢世勤劬，各有啓發；而戴君所得为独优。本师章氏論古韵二十三部，最憭憭矣，余复益以戴君所論，成为二十八部。（音略）

拿它和章氏的二十三部比較，多出的入声錫、鐸、屋、沃、德五部，都是本于戴氏的。其中蕭部的入声仍应按陰陽入三分法分出外，① 大抵应分者尽分，应合者尽合，清代三百年的古韵分部，以这个方案最为完密了。其讀法如下表（附章氏二十三部对照）：

陰　　声	入　　声	陽　　声
歌开戈合洪（章氏歌部）	曷开末合洪（章氏泰部）	寒开桓合洪（章氏寒部）
	屑开合細（章氏至部）	先开合細（章氏眞部）
灰合洪（章氏脂部）	沒合洪（章氏队部）	痕开魂合洪（章氏諄部）
齐开合細（章氏支部）	錫开合細（章氏与支不分）	青开合細（章氏青部）
模合洪（章氏魚部）	鐸开合洪（章氏与魚不分）	唐开合洪（章氏陽部）
侯开洪（章氏侯部）	屋合洪（章氏与侯不分）	东合洪（章氏东部）
蕭开細（章氏幽部）		
豪开洪（章氏宵部）	沃合洪（章氏与宵不分）	冬合洪（章氏冬部）
咍开洪（章氏之部）	德开合洪（章氏与之不分）	登开合洪（章氏蒸部）
	合洪（章氏緝部）	覃洪（章氏侵部）
	怗細（章氏盖部）	添細（章氏談部）

这二十八部的韵目，都是《广韵》所固有的，②而立为古韵韵部，又都有他的根据，其中齐、模、豪、先、东、覃六部，本于郑庠；歌、青、唐、登、四部，本于顧炎武；蕭、寒、添三部，本于江永；灰、痕、侯、咍四部，本于段玉裁；曷部本于王念孙；冬部本于孔广森；剩下的九部入声都本于戴震。所以他說："此二十八部之立，皆本昔人，曾未以臆見加入"（音略）。可見是比較客观的。

黃氏通过后出的反切去考先秦旧音，有些地方不可能完全准确。但《广韵》一書，本是兼包古今南北之音的；我們旣然承認汉語是一个系統，又知道語言的發展是通过新質的逐漸积累和旧質的逐漸衰亡来实現的，那末，中古之世用反切記下来的語音，就不能說和古音全不相干，也不能說通过韵書考出来的古音和前人用其他方法考出来的只是一种巧合。

至于有人說，以古本韵証古本声，又以古本声証古本韵，在邏輯上犯了"乞貸論証"(begging the question)的毛病，这里不打算討論这問題。可是我們知道，事物是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而汉語音节由声韵拼成，声变会影响韵，韵变也会影响声，正如黃氏所說，"古声旣变为今声，則古韵不得不变为今韵，以此二物相挾而变。"（音略，略例）是不是也可以互証呢？我們还不宜很輕率地断定他这方法根本錯了。

当然，这个古声韵方案，不能令人無疑的地方是有的，比如喉音为、喻二紐究竟是不是影紐的变声，③又如《广韵》先韵的"狗"字（林紐）、灰韵上声的"俉"字（为紐）等，是否果为"后人增加"，如此之类，都是值得研究的。而更重要的問題，莫过于韵母音值的假定。黃氏尽管說明了开合洪細，也描写过部分的音值，④ 但要把十一組韵的主要元音全部用音标标出仍然很难。过去錢玄同曾企圖解决这个問題，而个别的音，就連他自己也犹夷不定，⑤ 不过能够显示差别罢了。

关于古声調的問題，向来有各种不

---

① 蕭部的入声，黃氏以有变声而未析出，和他主張陰陽入三分的原則不合。其弟子黃永鎭已别立为肅部，詳所著《古韵学源流》。

② 黃氏反对不用現成的《广韵》韵目而另搞一套，他說："或欲去《广韵》韵名别为古音立号，如朱君允倩以《易》卦名为古韵部名，此不悟託名標幟之理，又不审古本音卽在《广韵》二百六部中。《广韵》所收，乃包举周汉至陳隋之音，非别有所謂古本音也。"（与人論治小学書）

③ "荣怀"与"杌陧"均为双声，錢大昕已說，見《潛研堂文集，答問》十二。后来曾运乾引申錢說作《喻母古讀考》，証明为紐古归匣紐，喻紐古归定紐。

④ 例如他描写支、脂、之三部的本音說："'支'之本音在齐韵，当讀如鞮；'脂'之本音在灰韵，当讀如磓（自注：脂韵古皆合口，前人已多言之）；'之'之本音在咍韵，当讀如鼜。今音所以溷者，以'支'由本声为变声，遂成变韵，'脂'由本声为变声，复由合口为开口，由洪音为細音；'之'由本声为变声，复由洪音为細音，于是支、脂、之皆同为开口細音，斯其分界不憭矣"。（与人論治小学書）

⑤ 如模、鐸、唐这一組的主要元音，錢氏起先拟ɔ，后来拟ɑ。

同的說法。黃氏早年就認定"古無上去，惟有平入"，后来又作一篇《詩音上作平証》，从全部《詩經》用韵里举出他的証据。看来，也不过和許多学者的說法一样，不能据为定論。①这个問題太复杂，还只提到調类，已糾纏不清；如果問調値，就更無从談起了。

总之，汉語古今音的变化是很大的，古書里可能利用以进行研究的資料清人都注意到了，可靠性有多大都很难說。近时学者又注意到外語对音，也仍然不是很古的材料。所以任何的古音学說，都不可能完美無疵。

近二三十年以来，古音学因受了西方語言学方法的影响，得到不少超过清代学者的收获，这是可喜的；但古音学上的許多重大問題要更好地解决的話，还有賴于汉藏語系历史比較法的建立。这是我們今后的努力方向之一。

三

清儒研究古音学，目的是在通經。他們知道只有通曉古音，才能給古書的通借現象作出解釋；而詞义又是和語音密切相关的，也只有掌握了語音規律，詞义的理解才有可能。本来，任何学問都是要講实用的，語言学家从复杂的語言材料中找出規律，反过来，还要运用这些規律解釋問題。所以在介紹黃氏古音学說的同时，再附帶說說他对古音通轉的意見和运用規律以說明具体問題的态度。

古音通轉規律，主要的不外兩条：一条是韵腹（即主要元音）不变，只韵尾变化的"对轉"；另一条是韵腹变化或腹尾俱变的"旁轉"。黃氏說：

> 凡陰声陽声互相轉曰"对轉"，陰声陽声自类音近相轉者曰"旁轉"，由旁轉以得对轉者曰"旁对轉"。（声韵通例）

又补充說明道：

> 陽声之先痕寒三部同收 n 为同列，青唐东冬登五部同收 ŋ 为同列，覃添二部同收 m 为同列。凡陽声同列者，其相对之陰声、入声亦为同列；灰歌同列，齐模侯蕭豪咍同列，屑沒曷同列，錫鐸屋沃德同列，合怗同列。凡同列之韵皆得通轉为"旁轉"；凡陰声与陽声相对者得相通轉为"对轉"；凡自旁轉而成对轉者为"旁对轉"；凡此列与彼列相比之韵亦得旁轉。（与人論治小学書）

这說明他是承認通轉規律合乎音理的。然而又說：

> 古音通轉之理，前人多立对轉、旁轉之名。今謂"对轉"于音理实有，其余名目，皆可不立，以双声、迭韵二理可赅括而無余也。（音略）

兩說似乎自相矛盾，其实他并不認为"旁轉"为音理所無，而是因为"对轉"好掌握，"旁轉"不好掌握；至于拐弯子的"旁对轉"就更难掌握了。本来，韵变絕大部分是因为双声引起的，能看出一組相鄰近的音节是双声关系已够說明問題，一定要鬧清楚后边的韵变，难免不發生穿鑿傅会的毛病，何况立例太繁，像章氏拟訂的那些"次对轉、次旁轉、交紐轉、隔越轉"，②就越發使初学者胡涂了。所以他認为这种名目，不如不立的好。

这是他治学态度謹严的又一表現。巧立名目既不贊成，濫用規律尤其是反对的。比如他很佩服清儒王氏父子和郝懿行諸家的訓詁学，但偶尔碰到他們随意破字，或順口說說"一声之轉"，也心不謂然。至于末流憑臆改字，如胡元玉說春秋楚公子貞的"貞"字是"騰"字的假借，他就批評是"穿鑿傅会，徒以破字为郵"③了。

黃氏善于通过事物的联系去观察問題，研究語音是这样，研究語言学的其他部分也是这样的。他主張以語音为綱，結合文字詞彙作总的研究。这种高度綜合的学問。他定名叫"小学"。④他在《声韵略說》里說，

> 小学徒識字形，不足以究言語文字之根本已。

又在介紹章氏《小学答問》时說：

> 提其精义，無过数言：一曰不通今音，不知古音分合之故；二曰不明古音，不知声义同依之理；三曰不解形体声音，不知本字通假字、本义引申义之別。（与人論治小学書）

他知道有声語言的詞义是通过語音来表达的，只有抓住語音这个重要环节，文字的發展变化才有条理可寻。所以他又說：

> 声义同条之理，清儒多能明之，而未有应用以完全解說造字之理者。侃以愚陋，蓋尝陈說于我本师，本师采焉以造《文始》，于是轉注、假借之义大明。令諸夏之文，少則九千，多或数万，皆可繩穿条貫，得其統紀（自注：除名詞之字，偷有少数难知）。（声韵略說）

如何做到这一步，他又認为首先要綜合研究汉語声音文字最基本的書。他說：

> 是故字書之作，蕭然独立，而群籍皆就正焉。辭書之作，苟無字書为之樞紐，則蕩蕩乎如系風捕影，不得归宿。欲治《尔雅》者，安可不以《說文》为先入之主哉！（尔雅略說）
>
> 《尔雅》总絕代之离詞，其中蘊蓄先世遺言，异国殊語。当时九服声音相离未远，縱以声音比方假借，而聆音知义，不至淆譌。迨世远声迁，文字之著于竹帛者不能相逐而同軌，于是睹文而不知义，音从世讀而不諧于古初。治《尔雅》者不明乎此，上之不过如邢叔明之守文，次乃儕于陆佃、王雱，舍望文生义無复他技。（同上書）

这种方法，是綜合的，不是孤立的。所以他也常說"有条理系統之謂学"。 （下轉 240 頁）

---

① 关于古四声問題，明陈第《毛詩古音考》，清顧炎武《音論》卷中，段玉裁《六書音韵表，古四声說》，孔广森《詩声类》卷一，王念孙《石臞遺文》卷四，江有誥《唐韵四声正》，刘逢祿《詩声衍》，近世陈汉章《綴学齋初稿》卷三，王国維《观堂集林，古五声說》都提出过看法。

② 这些名目，見章氏《成均圖》。

③ 詳《春秋名字解詁补义》。

④ 他講的"小学"，比《周礼》上提到的意义要广得多。

语文短评

451 緬甸联邦副总理吳覚迎…在李大章省長的陪同下，游覽了成都名胜古迹武侯祠、望江楼和杜甫草堂。（**四川日报** 1958年1月4日1版）

“在…的陪同下”宜改为“由…陪同”；而且后一句最好改为“游覽了成都的武侯祠…等名胜古迹”。（**王若瞻**）

452 从我們下来的第一天，当地农業社員即帮助我們安置吃的地方、住的地方。（**文汇报** 1958年1月12日3版）

“从”字有什么作用呢？是不是說从那天开始每天都帮助我們安置呢？大約不是的。那末必須把“从”字删去。（**徐允**）

453 在这次整風运动中，大家向我提了很多的意見，帮助分析了許多錯誤的思想，我深深地感到这做法的不对。（**青年报** 上海1958年1月14日5版）

“这做法”，看句子結構好象指的“…提了很多意見”，和“帮助分析了許多錯誤思想”，但这些都是好事，不会感到不对。根据原意应改为：“…感到过去这种做法的不对。”（**仲和**）

454 关于中、小学畢業生安排工作的总結和今后工作的意見。（**教师报** 1958年1月17日2版标題）

这句話乍看起来，倒像是中、小学畢業生安排他們自已的工作和他們对今后工作的意見；但文章的內容說的是各級党、政、学校等組織对中、小学畢業生的安排工作。因此，应將“安排”提到“中、小学”前面。（**黄世瑚**）

455 曾經有过这样的事：从前，在靠近北極的地方，常常降一种紅色的雪。（**人民日报** 1958年1月19日8版）

“曾經有过”的事当然是“从前”的事，“从前”二字应删；否則，应删去开头的八个字。（**恒平**）

456 可是不知为什么，因領导上突然决定不繼續訓練了，把有三十多年飼馬經驗的飼养員也辞退了。（**光明日报** 1958年1月20日2版）

辞退飼养員的原因，句子里已經說明是“領导上突然决定不繼續訓練了”，“不知为什么”显然是指領导上的决定。在形式上这个句子已經因果分明，更無可問，应删去“因”。（**罗忠新**）

457 近几天上海經受了十五年来最冷的一天——攝氏零下十度的襲击下，不但沒有冻死人…。（**新聞日报** 1958年1月20日1版）

1）既是“几天”，当然不会是“一天”；2）“經受”什么“襲击”？3）只有“在…下”的格式，沒有“經受…下”的說法。全句可以改成：“近几天上海經受了十五年来最冷的一次低溫——攝氏零下十度——的襲击，不但…”或“近几天上海在十五年来最冷的一次低溫——攝氏零下十度——的襲击下，不但…”。（**王璞之**）

458 我們帶来的咸鹽和烟草受到热烈的欢迎，由年老的長者一份份地把它分开，一視同仁地送給部落里每一个人，連在怀孕中的孩子也得到同样的一份。（**人民日报** 1958年1月30日8版）

語意含混，孩子怎能怀孕呢？应改为“尙在孕中的孩子也得到同样的一份”。（**高山嶺**）

459 我們有理由認为这篇是他官居長安时候的作品，正是他少年得志，进取心切的时候。（**語文学習** 1958年1月号16頁）

“正是…的时候”的主語是什么？就句子来看应該是“这篇”，可是“这篇”怎能“是…时候”呢？应該在句末加“写的”。（**罗忠新**）

460 “文艺学習”創刊將近四年以来。（**人民文学** 1958年1月号126頁“編者的話”）

把“將近四年”、“四年以来”縮成“將近四年以来”，不妥，可删去“以来”。（**王璞之**）

461 他（列宁）非常关心…流放者的一切事情…，并且表示願意完成他們的要求。（**中国青年** 1958年2期16頁）

这里“完成”二字是生硬地从俄文“выполнять”一字譯过来的。“要求”只能“滿足”，不能“完成”。（**蔡德梁**）

462 立鶴…做教員，他是我的啓蒙老师，回家后与童养媳成了亲，第二年碰巧是老于头六十得了个兒子，取名阿寿，便是这站在我对面的年青人。（**中国青年**1958年2期22頁）

阿寿是誰的兒子？从“第二年碰巧是老于头六十得了个兒子”这句話看，是老于头的兒子。其实是立鶴的兒子，老于头的孙子。所以这句話应該分开說：“第二年得了个兒子，碰巧是老于头六十，取名阿寿，…”这样就不至于誤会了。（**舒市丙**）

463 为了提前到七一通車，十多万工人和干部們，不分白天黑夜紧張地劳动着…。(**文艺报** 1958年1期29頁)

"們"表示多数，但不能和具体数字同时并用。这里"工人和干部"前面既有数詞"十多万"，应把后面的"們"字删去。(向群)

464 中国共产党員，前东北抗日联軍第一路軍总指揮楊靖宇將軍，訂于二月二十三日即殉国十八周年之际，在吉林省通化市新建陵园举行公祭安葬大会…。(**人民日报** 1958年2月7日8版)

这句話从語法的角度看来，好像是楊靖宇將軍自己为自己举行公祭安葬大会，这当然不合邏輯，应当改为："中国共产党員，…楊靖宇將軍的公祭安葬大会，訂于二月二十三日即殉国十八周年之际，在吉林省通化市新建陵园举行…"(李中和)

465 他們对新生事物热烈欢迎，对新生事物的小毛病滿怀热情去帮助。(**人民日报** 1958年2月19日8版)

后一分句被帮助的是"小毛病"而不是"新生事物"了。改为："他們对新生事物热烈欢迎，对新生事物的小毛病滿怀热情去帮助糾正。"(喬申生)

466 經西藏的搬运工人証明，脚印是一种象人的怪物，就是"雪人"。(**光明日报** 1958年2月27日3版)

"脚印"只能是"怪物"、"雪人"或其他动物的脚印，而决不可能是"怪物"或"雪人"。試改为："脚印是一种象人的怪物即'雪人'所踏的"。(符景恒)

467 如果包括副詞、形容詞的一些詞放在一起，如"徒然、忽然、竟然、公然、泰然、坦然、昏昏然、茫茫然"，試問我們怎能辨别它是副詞，还是形容詞？(**中国語文** 1958年2月号86頁)

在第一个分句里"包括"前漏用了一个"把"字。"(把)包括副詞、形容詞(在内)的一些詞"，意味着其中还有副詞、形容詞以外的詞，但作者列出的只有副詞和形容詞。应改为："如果把副詞和形容詞放在一起，…"。(蕭天柱)

468 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献身到英雄的建設事業上。(**新观察** 1958年2期6頁)

"献身"指献出个人的一切，包括生命，不仅指"精力和智慧"。再說，"献身"不能再帶宾語，这里的"精力和智慧"虽用"把"字提前，在意义上仍为"献"的宾語。可改"献身到"为"献給"，并去掉"上"。(罗忠新)

469 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識破。(**文艺报** 1958年2期"編者按語")

"鼻子灵的"只是嗅覺好，与"一眼就能識破"配搭不上，可以改为"鼻子灵的一下就能嗅出来"，或"眼睛亮的一眼就能識破"。(溫应时)

470 火車开动了，在"听吧！战斗的号角發出警报…拿起武器…再見吧媽媽…"进行曲声中，揮手和欢呼声交織成一片。(**新观察** 1958年3期9頁)

"揮手和欢呼声"一个是看得見的动作，一个是看不見的声音，不能"交織"，更不宜說"成一片"，只能說"大家揮动着手，歌声和欢呼声交織在一起。(高光烈)

471 林則徐的电影文学剧本，曾在"人民文学"杂志發表过，这次搬上銀幕，已由导演郑君里会同剧本的原作者商討研究，丰富了若干情节，因此將来拍成影片后，可較原剧更有所提高。(**电影故事** 1958年2期34頁)

1) 看起来，好像林則徐写了电影文学剧本，而导演也和作者林則徐商討过。"林則徐"三字应加上引号，删掉"的"字。2) "原剧"应改为"原剧本"。3) "更有所提高"的意思是原来提高过一次，现在更提它一下，但是从文内看不出这層意思，作者的意思不过說"可較原剧本更好"。(小公)

472 市四十中学在积極执行大躍进規划的同时，目前，已向武汉一师及江岸区所有兄弟学校，提出了友誼的挑战。(**長江日报** 1958年3月11日1版)

句子中的"…的同时，目前，已向…"显得不协調。全句应改为："市四十中学目前正在积極执行大躍进規划，同时还向武汉一师及江岸区所有兄弟学校提出了友誼的挑战。"(韓策)

473 現在已拖帶十三只駁船，9963吨的先进紀录，并縮短行駛时間一点十五分。(**新聞日报** 1958年3月14日2版)

全句没有可和先进紀录搭配的动詞，应在"拖帶"前加动詞"創造"，意思才明确。(仲和)

474 目前全厂工人都干勁十足，生产情緒高漲，产量一般提高到20—30%，質量也相应提高，廢品从1.5%降低到0.1%。(**解放日报** 1958年3月18日2版)

"提高"和"提高到"意义不同，前者不包括原来的数字，后者应該包括原来的百分数，这句应該删去"到"，不然，"20—30%就得改为"120—130%"。(仲和)

475 魯瑞明想，农民都这么爱国，自己还是个領导阶級呢！(**人民日报** 1958年3月22日3版)

"自己"怎么能是領导阶級呢？可改为"自己还屬于領导阶級呢！"(賈双虎)

信箱

对王力先生兩本著作的意見

张欣山

王了一(王力)先生是国內有数的几位語言学家之一，对汉語的語法、声韵以及文字都有很深的研究，他的著作流行很广，影响很大；如果著作在某一方面有着严重的缺点，自然也就会發生不良影响。我很希望王先生能糾正一些不应有的，至少也是可以避免的缺点，所以謹向王先生提一点可能是不正确的意見。

我要談的只限于王先生关于声韵方面的著作，特别是«汉語音韵学»。«汉語音韵学»原名«中国音韵学»，解放前以大学叢書的性質出版，裝成兩巨册。从表面看，我以为一定校对得很細致，誰知买来一讀，其錯字之多使人万分失望。旧社会里一些專家学者，有时做事也是不負責任的，錯誤無論怎么多，可不必去管它；但解放以后，这种現象就不应該繼續存在了。王先生在其改名为«汉語音韵学»的新版自序中說：“旣然重印了，小小的修訂总是应該的，至少也应該校正一些錯字。”这是很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这是著作者对讀者应該尽的最起碼的責任。但这部校正了的新版本，却使我們更加失望，甚至使我們有些气憤，它不是沒有錯字，而是錯字更多了。最离奇的是24頁第一行一联串重复了上頁的五个字。这种現象，大概是出版此書的中华書局怕麻煩，为迁就旧紙型产生的；但王先生却不能辞其咎。我們想底样排好以后，王先生总該看过吧？如果看漏了至少第二版也应該校正，可是第二版却依然照旧。这是極不应該的。这种不負責任的态度也和王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以及人們对他的信任和景仰極不相称。研究語言的書籍和一般文学作品的書籍不同，后者有一兩个錯字关系不大，而前者一字之差，可能就有天淵之別。所以語言学書籍，尤其应該認眞校对，尽可能地减少錯誤。这本書的錯字比任何書都多，書里的圖表几乎沒有一个沒有錯誤的，就連戴震的“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也有錯誤。这就大大地减低了本書的使用价值。本来这本書对于那些在声韵方面有研究的人沒有太大的用处（不是說沒有用处），而对于一些初学的人却很有用处，因为它材料丰富；但因其錯誤太多，初学者不能辨别，也就只有望而兴歎了。

王先生的第二种声韵学書籍是«汉語史稿»(上册)。这本書比起«汉語音韵学»来錯字少多了，但在同类的書中还是錯誤最多的一本(这拿罗莘田先生的«汉語音韵学导論»和«普通語音学綱要»来比較，就很明显地看得出来，虽然罗先生的書也还是有錯字的)，而且也还是多得令人感到遺憾，例如，几乎所有“江有誥”的“誥”字都錯成“浩”字。

最后，还有一点是我百思不得其解，而希望王先生加以說明的；因为这一点光說成印刷上的錯誤是解释不通的，而除了印刷上的錯誤以外，又别無其他道理。就是关于等呼的問題。王先生說：“江永說‘开口至三等則为齐齿，合口至三等則为撮口’。”其实江永說的是“开口至三等則为齐齿，合口至四等則为撮口。”江永在其«四声切韵表»和«音学辨微»兩書中都是說的“合口至四等則为撮口”，而王先生在«汉語音韵学»和«汉語史稿»中都說江永說“合口至三等則为撮口”。这就令人莫名其妙了。若說王先生的兩本書都是“四”字誤排为“三”字，也許不会这么凑巧；若說王先生有意竄改江永的話以就己見，似乎令人不可理解；若說王先生馬虎到把江永的兩本書的“四”字都誤为“三”字，也是不可思議的。不管原因如何，讀者对王先生的这本書頗怀戒心，那是很自然的事了。据王先生說，«汉語史稿»是他在北大講授汉語史的講义，不知他的学生对这个問題如何看法，我想也会象我們一样感到茫然吧！所以我很希望王先生能就这一点加以說明。

关于汉語語音，尤其关于古汉語語音的書籍，現在出版的还很少，王先生这兩本書是应时的著作，購买的人很多，但因其錯誤太多，遂使讀者拿在手里徒喚奈何。王先生在这兩本書的序言中都很虛心地請求大家提意見，关于內容，各人的看法不同，我不想談什么；我只就这看来是無关宏旨而其实是很关重要的錯字問題向王先生提点意見，請王先生为讀者的利益着想，再版时，認眞地、子細地校正一下。

編輯同志：

我誠恳地接受張欣山同志的意見，并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有严重的个人名利思想，所以在我的各种著作中表現了不严肃和对讀者不負責任的态度。往往是一部書才写完，就忙于写另一部新的著作，对旧的著作的缺点和錯誤不再放在心上。我以往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表現了我的粗疎，和我們先輩学者們对学术謹严的优良傳統是相反的。張欣山同志除了举出«汉語音韵学»和«汉語史稿»上册印刷上的錯誤的一些例子来証明我的对讀者不負責任的态度以外，还指出我的粗疎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把江永«音学辨微»的話引錯了。当初我是先有了一个成見，以为依常理推測，合口至三等則为撮口，于是我粗心地把江永的原意歪曲了。这虽是簡單的一个例子，它很能說明問題，那就是我做学問的極端不严肃的态度。由于我在語言学界有一定影响，我这种資产阶級个人名利思想指导下的科学态度和科学工作就有很大的危害性，給人民帶来了很大的損失。

在双反运动中，我的个人名利思想受到了批判，我的思想認識提高了一步。我下决心改正我的錯誤。我保証在三年內把我的主要著作如«汉語音韵学»、«汉語講話»、«中国現代語法»、«中国語法理論»、«汉語史稿»、«汉語詩律学»重新校訂一次，以期不辜負人民对我的期望。其他著作，如有再版机会，也要加以校訂。

王 力　1958,4,29.

“如果”新例

舟 丹

“如果”跟“要是、倘若、假設”等一样，是用来連接假設主从句的“假設連接詞”。用“如果”引进的从句是“假設句——即假定的原因句；或是本来确定的因果律，或是虛拟的条件，或是推想的預言，乃到浪漫的設想，都可以用假設的語气表出来，成一个从句。”（黎錦熙：新著国語文法，297頁）

这是“如果”的通常的用法。除此以外，“如果”还有另一种用法，是許多語法書上都沒提到过的。这种用法起源于西文，在譯文里常常可以遇到。例如：

> 如果人民与知識阶級的关系的傳統問題，是第一部中的主要論点之一的話，那末在以后的兩部中，人民本身的角色就愈显愈大了。（苦难的历程，1，第5頁）

在我国作者所写的文章里，这样用的“如果”也越来越多了。例如：

> 如果一九一八年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联合武裝干涉，一九三九年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圍發动的反苏反共逆流，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大举进攻苏联，都沒有能阻擋社会主义的胜利，沒有能挽救資本主义的失敗，那么今天帝国主义再一次地想利用匈牙利事件来动搖强大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基础，也只能是一种垂死的掙扎了。（中国青年报 1956年11月12日，第1版）

> 如果在四十年前，即一九一七年苏維埃政权初生的时候，人們还不能判断社会主义这股历史激流，究竟有多么大的冲击力，那末現在，事情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人民文学，1958年1月号，51頁）

这种假設句并不“假設”。从句“1918年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联合武裝干涉……沒有能挽救資本主义的失敗”并不是“虛拟的条件”、“推想的預言”或“浪漫的設想”，而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作者的意思也是肯定的。同时，主、从之間并沒有明显的条件、因果关系，主句的种种推断并不是立足在从句之上的。所以，这些用“如果…那末”来連接的复合句，其实是不“如果”、不“那末”的。只是用了“如果…那末”之后，使分句相互映襯，句意更加肯定，是一种修辞手段。

还有在“如果”之后加“說”的例子：

> 如果說在我上次訪問印度的时候，你們庄严的古代建筑給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末，在这一次的訪問中，你們的民族舞蹈和民族音乐又使我們每一个人都深为贊佩。（解放日报，1956年12月11日2版）

> 如果說老一輩的仰光大学学生的历史使命是爭取緬甸的独立，那末，在你們的身上就担負着保衛和巩固緬甸的独立并且把緬甸建設成为一个近代化的国家的責任。（文汇报，1956年12月20日，周总理講話）

> 如果說第一阶段的特点是革命鋒芒主要指向外国帝国主义，那末第二阶段的特点是革命的鋒芒主要指向国內的敌人，首先是指向封建主，指向封建制度。（斯大林全集，10卷，25頁）

> 如果說，我們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資产阶級的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現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資产阶級之外，还要加上一切其它阶級中願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毛澤东选集，153頁）

“如果說”中的“說”已失去作为动詞“說”的作用；沒有“說”字也無損原意。

每冊定价人民幣0.24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本刊上期4月22日出版

中国語文

月刊

1958年5月号

总第71期

1958年5月22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員会　北京海淀中关村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印刷者　北京京华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总發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代訂代銷处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定价：三个月0.72元，半年1.44元，全年2.88元；寄費1.平邮寄費不計，2.挂号邮費由訂戶負担。　1—17,172冊

代号2—44